当知识遇上信念

我们不应老想着让老祖宗为我们增光，应该多想想我们 怎样为老祖宗增光。从来只有"光宗耀祖"一说，自古未闻"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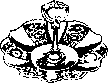
王彬彬著T耀孙”之论。



⑩租多大#出版社

当知识遇上信念

王彬彬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知识遇上信念/王彬彬著.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309-07350-8

I.当…D.王…瓜.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W.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3319号 当知识遇上信念

王彬彬著

责任编辑/陈军卢茗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门市零售:86-2145642857 团体订购:86-21名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890 x 1240 1/32 印张9.25字数205千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350-8/1 ■ 555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辑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3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 6杂文与相声 11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漫说批评 18作家的工匠化 23我曾经是上帝 26文学奖是……

1当知识遇上信念

29文学奖的内与外 32王朔.蹵致马路上来了 35知识与信含，过去与现在 38这一座文坛，这一桩富贵

第二辑与几种书的相遇

45其实汪曾祺也善写恶人 —-说《鸡毛》

48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 56《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

63对毘德拉的接受与拒绝 69比喻砌成的《围城》

——钱锺书对比喻的研究与运用 76 “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

——读昆德拉小说《无知》

79钱锺书两篇论文中的三个小问题 90 “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董晓《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 变》序

102革命与流氓

2当知识遇上信念

■读书札记 113我与几种书的相遇

第三辑还要荒谬多久

119学术规范与学术标准 123何谓“素质教育”

126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两个基本目的 130还要荒谬多久 134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 137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 140大学教师讲课好坏已不重要 143季广茂事件与学术界的“潜规则”

第四辑学者之怒，诗人之忧

149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156也说“动物上阵”

160骂鲁界里无高手 163胡适、鲁迅与陈德征 168鲁迅亲属与鲁迅 171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 186写出的与未写出的

——《潘旭澜文选》编后 190学者之怒与诗人之忧

^说说何满子与邵燕祥

194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第五辑今昔中国

3当知识遇上信念

229朱自清、闻一多与西安事变

233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237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

241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244 1949年以前中共的“统战工怍”

248为1989年版《辞海》送行 255 “文革”结束了吗

^—'与郝铁川先生商榷 261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271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 274中国人在日本 277禁欲时代的情色

——“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289后记

I第一辑I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呼唤权威对权威的批评

一种健康的商榷和驳难的风气，是学术界富有活力的表现， 也是学术的发展所必需的。但这种风气在今日学术界却堪称稀 薄。敢于与人商榷、敢于批评权威的，往往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 初生牛犊，至于多少有了一点名望地位的人，则都显得很老成持 重，对于自己明显不能同意的观点,对于那种自己认为非常荒谬 甚至有害的说法，他们通常只是止于腹诽，或充其量与二三好友 聊天时稍稍流露一点不同看法，要让他们公开著文与人商榷，那 是决不肯的。这样，便不难见到这样一种学术现象：一种观点、 一套理论、一番“创见”，尽管许多人都觉得很偏颇、很牵强、很不 通，但由于是出自某个在学术界很有头脸的人士之手，便能在很 长时间内畅行无阻，又由于很有头脸的人士总不乏吹捧者和追 随者，这种观点、这套理论、这番“创见”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被 大学生一类学术辨别能力尚不够强的人所信奉。这种观点、这 套理论、这番“创见”,虽然有时也会遭到初生牛犊的诘难，但这

3当知识遇上信念

种诘难毕竟因人微而言轻，难以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一个有头脸的人对另一个有头脸的人所发表的观点、理论、 “创见”，实在忍受不下去时，有时也会公开表达不同的看法。但 表达时却采取所谓“正面”的方式。尽管这种看法完全是由那自 己所不能同意的观点引发的，但在行文中却极力避免将其作为对 立面。换言之，这种“正面”的表达方式，就是尽量避免与不同的观 点发生“正面”的接触、交锋,尽量避免显露出批评、争辩的色彩，要 让人觉得他只是在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根本不知道还有另 一种看法存在。这种“正面”的方式，当然比缄默不语要好得多，但 其作用仍远不如在直接的批评、驳难中将自己的观点尽情表达。

4当知识遇上信念

权威的谬误最好由同时代的权威来纠正。倘若学术界的权 威与权威之间都能在学术上坦诚相见，无须顾及情面地相互商 榷、驳难，那对学术的发展真是莫大的幸事。这样的现象也曾有 过。例如胡适当年对蔡元培的批评和蔡元培对此表现出的雅量， 就永远具有示范意义。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对 “旧红学”进行了扫荡式的批判，而蔡元培正是“旧红学”的代表性 人物之一。胡适一开篇就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 路”。对蔡元培，胡适的批评也是指名道姓、直截了当的：“蔡先生 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 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蔡先生……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 没有道理。”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在宣告“新红学”诞生的同时，也为 “旧红学”举行了葬礼。倘若胡适当年没有毫不含糊地批驳蔡元培 等人的勇气，就没有红楼梦研究在当年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胡适有太多的理由在蔡元培的“谬 误”面前屏息敛声。从“利害关系”上说，其时的蔡元培是北大校 长，而胡适是北大的一名教授。在今天，倘有哪位教授公开地、 不客气地在学术上批评自己的校长，恐怕会成为一大新闻吧。从私人关系上说,胡适是蔡元培延入北大并予以“重用”的，倘若 没有在事业的起点上就遇上蔡元培这样的人，胡适恐怕也就不 是后来的胡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曾说胡先生在他纪念蔡 元培的文章里便把他成功的偶然性说得很清楚。他说他底青年 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底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 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在这种意义上，蔡元培对胡适可谓“恩重 如山”。但胡适既没有考虑“利害关系”，也没顾及私人情义，只 看重了学术上的是非。当然，胡适能这样做，既表现了他的学术 勇气，也表现了他对蔡元培胸襟、人格的信任。对于胡适的批 评，当时的蔡元培是并不接受的。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面 对自己的“属下”和晚辈(蔡长胡24岁）的挑战，蔡元培没有故作 沉默镇静以显示矜持和不屑，而是也公开著文与胡适争辩。这 表明，蔡元培也只看重了学术上的是非，并没有顾及自己的身 份、辈分和地位。这也表明，蔡元培确实是视学术为“天下之公 器”的。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对蔡元培红学研究的毁灭性的批 判，丝毫没有影响作为校长、师长和“恩人”的蔡元培对胡适的看 法和态度，丝毫没有损害二人之间的情谊。此后，蔡元培仍在不 同场合高度评价胡适的“旧学”和“新学”。胡适在辞世的前一 年，还满怀感慨地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 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不生气，他有 这种雅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今天，倘有这样 的事情发生，扮演胡适这种角色的人，不但要被对方视作“忘恩 负义”，也要被其他人说成是不知好歹吧。这说明，学术界的“生 态”确实已恶化得极不利于学术的生长了。

不知蔡、胡等先贤的风范何时得重见。

5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2年2月24日凌晨

杂文与相声

把杂文与相声扯到一起，实在因为两者有着某种相似性。 相声之不景气，久矣夫已非一日。现在，人们又在哀叹杂文的疲 软。而这两者的命运之不济，有着相同的原因。

6当知识遇上信念

讽刺是相声的生命。对广大民众所痛恨的事情，进行尽可 能巧妙同时又是尽可能辛辣的挖苦、嘲骂，是“相声艺术”之所以 有必要存在的主要理由。当广大民众觉得相声演员说出了他们 的心声时，当广大民众感到自己心中的某种恶气、鸟气通过相声 演员的表演得以抒发时，他们就会由衷地喜爱相声，就会对相声 演员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而相声自然也就景气了。相反，倘 若不能为广大民众代言，倘若总是逆广大民众的情感而动，广大 民众就会唾弃相声，就会对相声演员的表演报以“呸”声和“嘘” 声，相声之不景气也就自不待言。举个例子吧，今年中央电视台 春节晚会上，有一个相声是歌颂农民在今天的“幸福生活”的。 那农民“幸福”到何种程度呢？ “幸福”到住的是名副其实的“豪宅”，家里是全套最现代的设施;“幸福”到开着宝马车来给过去 接济过他的城里人送点“小意思”，而这“小意思”是一台笔记本 电脑……这样的相声，城里人看了莫名其妙，他们见惯了潮水般 涌到城里希图挣几个血汗钱的“农民工”，却没见过开着“宝马” 给城里人送“笔记本”的“农民”。这样的相声，广大农民看了就 更是满头雾水，不知是在说谁了。“三农”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今 天最严重的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算是说出 了“三农”的真相。而那两个相声演员，却仿佛是在存心气观众， 尤其是存心气农民。除夕之夜，这相声也看得我“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我最气的是，农民苦了一年、穷了一年、气了一 年，这相声却让农民连个“痩年”都过不好(近年有“肥年”一说， 不“肥”的年当然就是“瘦年”了），不可谓不缺德。舂节过后，在 《南方周末》上读到杂文家刘洪波先生质疑这相声的文章，才算 替我出了口恶气、鸟气。

相声倘若都去说农民怎样住豪宅、开宝马、把笔记本电脑当 “小意思”送，那要景气起来，才真是见了鬼了。当然，我这里并 无意把责任都推到相声编写者和表演者身上。我知道，他们自 有他们的难处，他们也有一肚子苦水^那么杂文呢？杂文无疑 也面临着和相声同样的问题。杂文的疲软，实在不能都怪杂文 的作者和编者。如果讽剌是相声的生命，那么，批判就是杂文的 灵魂。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对公共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 表现，予以不留情的批判，是杂文之所以必要存在的理由。换句 话说，杂文的批判空间有多大，杂文的生存空间就有多大。而如 今杂文的疲软，首先因为其批判空间限制了它的壮大，这也像相 声一样，自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在起作用。但由于 存在方式的不同，杂文的生存空间又无疑要比相声这类“表演艺 术”大。从我自己的“遭遇”可知，如今杂文的疲软，与在报刊实

7当知识遇上信念

际掌文权者的眼光、胆气也有相当关系。直白地说，那些能够最 终决定一篇杂文能否发表的人，对杂文的疲软现状也确实负有 相当责任。

我偶尔学着写篇把杂文。一次，外地一位写杂文的朋友来 电话，说是北方一家晚报要搞杂文大奖赛，那晚报副刊的一位编 辑是他的朋友，知道他与我相熟，便托他向我约稿。我的这位朋 友再三叮嘱，要我一定写几篇，支持一下。不久，这位编辑又亲 自来信催稿。我于是放下手头的“杂事”，去写杂文。先写了一 篇《城市的道路与政府的爰心》，说的是如今各城市，在机动车道 越来越宽阔平整的同时，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却越来越狭窄凹凸。 文章当然对这种机动车道侵占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现象进行了 批判。写完即寄出。几天后，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某个曾 任县委副书记的人，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进了监狱。在狱中，这名 前县委副书记“痛加忏悔”，说自己刚当上副书记的那几年，还是 “很廉洁”的，因为那时所收贿赂，“一年不过三五万元”。而这篇 报道的作者，也完全认同这种贪官的逻辑，说他本来是“廉洁” 的，一年受贿“不过三五万元”，只是后来“堕落”了，才一年受贿 数十万元。这报道看得我两眼冒火，我于是在心中迅速地算账。 我算出，三五万元相当于十个八个“农民工”一年流血流汗又流 泪挣得的钱，相当于农民卖出十多万斤粮食所得的钱。我也想 到我自己。我滥竽所谓教授之列，虽说如今“教授多如狗”，但好 歹也是一条“教授狗”。而我一年的工资，也不过两万来元。三 五万元，就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了。可一个县委副书记,一个副 处级干部，居然认为如果自己一年只收受贿赂三五万元，就堪称 “廉洁”！这账，我越算越气，真所谓“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心中 万古刀”。于是按捺不住地写了篇杂文，名曰《算账法》，也就是 把心中算过的账在文章中再算一遍。写完后又寄给了那家要搞

8当知识遇上信念

大奖赛的晚报。几天后，先寄去的那篇《城市的道路与政府的爱 心》退回来了，那位约稿的编辑附了一信，寥寥数语，说明“上头” 通不过。又过了几天，那篇《算账法》也退回来了，编辑仍附一 信，还是被“上头”枪毙。我将这两篇文章“左看，右看，上看，下 看”，觉得那“上头”的“心思真奇怪”。这样的文章都嫌犯忌，那 您那杂文大奖赛，会办成个什么玩意呢？俗云：“东方不亮西方 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要看看到底还有没有“亮”的地方。于 是将这两篇文章复印数份，不惜一稿多投，往北京、上海、安徽、 宁夏、新疆等地的报纸各寄一份。很快，这两篇文章在所寄各处 都在醒目位置登了出来。那篇《算账法》还被《杂文选刊》选载。 而杭州一家叫做《杭州工运》的刊物，又从《杂文选刊》上转载了 这篇《算账法》，并且通过《杂文选刊》寄来了稿费。这刊物是由 工会主办的，被这样的刊物转载，我分外高兴。

至今，也没有听说发表和转载这两篇文章的报刊出什么 “事”。可见，有时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每家报刊 都有自己的“上头”，但“上头”与“上头”之间确实往往有云泥 之别。有的报刊的“上头”，在办报办刊上，确实是十足的“庸 人”。这类惯于自缚手脚的“上头”，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把 做官和升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好容易熬到了一个正处或副 厅的官位，便十二分地珍惜，用鲁迅的话说，便“抖抖地把守饭 碗”，唯恐“出事”而丢了乌纱帽。如果他们还不满足于现有官 位而积极要求“进步”，那就更是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了。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国家兴亡”、什么“党的威信”，这 些，他们是从不考虑的，只考虑有生之年能爬到一个什么样的 职位。——当杂文必须通过这样的人认可才能发表时，又怎 能指望它不疲软呢？

9当知识遇上信念

所以，相声也好，杂文也好，它们的不景气，它们的疲软，都

首先不是一个相声和杂文自身的“理论问题”。这是仅凭常识就 能明白的道理，探讨其不景气和疲软的原因，其实是没有多少话 可说的。

10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3年6月17日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漫说批评

《南方文坛》开辟专栏讨论“批评”问题，并命我也来谈一谈。 说实话，我对这话题毫无兴趣。张燕玲主编问我为何无兴趣，我 说对如今的所谓“文学批评”，只感到无聊，无聊得根本就提不起 精神去说它。而张主编以为，这种无聊感也是对批评现状的一 种反应，说说感到无聊的原因，也算表达了对批评的一种看法。 并强调，只要是谈“文学问题”，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不妨 “骂”，不必有丝毫顾忌。张主编办刊物的热情和毅力一向为我 所钦佩，她既然把话说到这种程度，我也就一时冲动，应承了。

11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稍稍具体地谈论批评现状之前，我得说明一下，我对批评 现状感到无聊，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些年就没有一个不无聊的 批评家，没有一篇不无聊的批评文章。诚实、敏锐而又富有学养 的批评家还是有的，令人双目一亮的批评文章也还是偶尔能读 到的。例如，李建军近年的一系列文章，诸如对贾平凹的批评、对池莉的批评，等等，就不无振聋发聩的意味。再例如，吴俊和 李静对王安忆的批评，也给人以凿破混沌之感。但这样的批评 家、这样的批评文章，并不是批评界的主流。构成主流的“批评 家”，给我的基本感觉就是无聊。

下面说说我对“批评”感到无聊的理由。

所谓“文坛”也者，或许自古就是名利场。自从有了一个 “坛”，就免不了众人在上面争名逐利。这其实也正常不过。视 “文坛”为净土、视文学家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之士，大概只有 深山老林中的文学少女还会有这种想法。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批评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批评有何用，一直存在争议，我知 道，不少人心中，对批评的作用都是很怀疑的，一些创作家则公 然表示着对批评的鄙视。其实他们都大错特错。若没有批评家 忙前忙后地张罗，文坛上的名利分配又怎样进行？若问批评有 何用，我们至少可以回答：在文坛上的名利分配中，批评起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批评”，与创作家的 名利分配有密切关系，创作家的名声、创作家的获奖，等等，都在 相当程度上依赖着批评;如果意识到评奖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形 式的批评，那就可以说，一个创作家的获奖，直接就是批评的“赐 予”。另一方面，批评家也是文坛的一部分，也有自己的名利追 求。他们当然不是文坛上的“志愿者”和“义务工”，他们的批评 活动也要与名利挂钩。如果把文坛上的名利比作一块蛋糕，批 评家忙着为创作家切蛋糕，自己当然也要获取尽可能大的一份。 不过，在实际的文坛名利分配中，情形要复杂得多。并不仅仅是 作为“整体”的“批评”为创作切蛋糕，一个批评家能否分得一份 蛋糕和分得多大的一份蛋糕，也取决于别的批评家，同时，创作 家对批评家所得的蛋糕份额，也往往有着影响，所以，创作家为 批评家切蛋糕的事，也不鲜见……

12当知识遇上信念

或许有人对我用这种眼光观察文坛大为不满，但我敢说，如 今在文坛上活跃的批评家，他们中有些人，对文坛作为一种名利 场的性质，看得远比我透彻。他们或许并没有很逻辑地研究、分 析过作为名利场的文坛，但他们凭直觉便准确地把握了文坛的 名利关系，只要看看他们一言一行是那样符合“趋利避害”的人 类“天性”，便不难明白这一点。当然不是说，批评家就应该彻底 泯灭名利之心。但我以为，一个弄批评的人，他对名利的追求应 该是在不丧失批评之所以为批评的本性这一前提下进行的。用 更通俗的话说，批评家对名利的追求，不应该以完全放弃批评的 “操守”为代价。只要能大体守住这一底线，批评家不妨在争名 逐利上各显神通。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伦理”。文学批评 作为一种“职业”，也有着批评者必须遵守的“职业伦理”。可如 今一些号称“批评家”的人，看来看去，除了看到他们“坚守”着对 名利的追求，实在看不出他们还有别的“坚守'在这些人那里， 批评已完全被当作猎取名利的手段。这样，批评，也就成为一种 纯技术性的“操作”。在进行这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操 作”时，“操守”二字是从不会在他们的意识里冒头的。有许多活 动是需要联手进行的，换句话说，有些名利是必须多人协力争取 的。于是，批评家们呼朋引类、拉帮结派。远远望去，文坛上的 一个个山头隐然可见。在这些山头安营扎寨者，当然并不全是 批评家，也有一些创作家，也有些报纸杂志。——这道理也很简 单，文坛上“利益集团”的形成，仅有批评家当然是不够的。

如果这些“山头”意味着不同的批评“流派”，那是好事而不 是坏事。一个批评家，尤其是一个成熟的批评家，是应该有自己 的批评个性的，这种批评个性建立在对文学相对独特的理解上， 建立在对文学较为恒定的价值理想上。同时，对文学有着相同 的理解和相近的价值理想者，自然也可以形成某种“小圈子”。

13当知识遇上信念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批评家也完全可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但这种“小圈子”的形成，却必须是基于文学本身的理由，它对作 品的接受或拒绝、肯定或否定，都立足于对文学共同的理解和价 值理想。而如今的批评界，有几人是有着鲜明的批评个性的? 他们的“路数”都差不多。他们虽然十分活跃，文坛上到处都有 他们的身影，各种活动中都能见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面目却 是模糊的。一些面目模糊的人组成的“山头”，面目也必然是模 糊的。他们本就不是因为对某种文学理想的“坚守”而携手。他 们“啸聚”在一起的目的，本就是扎堆儿“操作”各种活动，诸如评 奖、编书、开研讨会，等等。说他们是文坛上的“黑恶势力”或许 言重了。但说他们“山头主义”、垄断资源、欺行霸市、欺世盗名 (利），总还有几分道理。

有人说，如今每年都有大量作品问世，光长篇小说就数量惊 人，因此需要有许多的批评家来批评研究。——这其实是昏话。 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够成为和有必要成为批评研究的对象。 绝大多数作品必然是过眼云烟，它们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 去。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并让批评家产生评 说的冲动。从总体上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有一项基本功能， 即为文学史进行第一轮筛选。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一个不失 “操守”的批评家，一个有起码的“职业伦理”意识的批评家，他选 择什么作品予以评说，总应该大体上是基于文学本身的理由。 一部作品在文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人际的意义上）引起了批评 家评说的兴趣，于是他对之品评一番。请注意，我说的是“大体 上”，并不认为批评家的每一次批评活动，都要源自内在的文学 性冲动。我知道，一个弄批评的人，有时难免要“应付”一些事 情，包括为一部自己毫不感兴趣的作品写评论。但我觉得一来 这种“应付”性评论不能多，在你的全部批评活动中只占很小的

14当知识遇上信念

比例;二来，你确实是迫不得已才痛苦地来“应付”的。可如今的 情形似乎有些相反。批评家们或许偶尔也会完全出于文学性冲 动而去评说一部作品，但更多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似乎都不是 被作品本身所触动、所感动，而是被写了这作品的人所触动、所 感动，才去评说这作品的。

毋庸讳言的是，批评是一种“资源”，文坛上总体的批评资源 必然是有限的；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这种批评资源对于创作者来 说是必要的。常见十分牛气的作家对批评公然表示不肩，宣称 自己并不在意是否被批评家注意，也从不阅读任何批评文章。 这种表态通常是当不得真的，至少不能全当真。说实话，在自古 至今的作家中，我还真未发现有谁完全不在意批评。一个创作 家完全不在意对他作品的评价，在逻辑上就说不通。有限的批 评资源不可能在所有创作者身上平均分配。有的创作者占有较 多的批评资源，有的则只能占有较少的批评资源，大多数创作者 则几乎不能占有批评资源。这种资源的配置权由谁掌握呢？确 实相当程度上由批评家掌握。批评家都能遵守“职业伦理”，都 能出于文学本身的原因而关注一部作品，是批评资源公正配置 的前提。而当批评家大多数时候都是根据作品以外的原因来选 择批评对象时，当批评家的批评热情不是源于作品本身而是源 于其他种种因素时，批评资源的配置就很不公正。有人说，如 今，一个尚未成名的创作者，倘若“不跟批评家搞好关系”，倘若 未能进入文坛上的某个“山头”，就是写得再好，批评家们也会视 而不见。不能说事情就绝对是这样，但“人情批评”、“关系批评” 在今天确实是突出存在的现象。将批评视作对被批评者的“恩 惠”甚至“恩宠”，将批评当作一种个人的名利“投资”，将批评当 作沽恩市义的手段，是最要不得的事情。——而这样的现象在 今天的批评界并不罕见。

15当知识遇上信念

西方有人下定义曰：“批评是艺术内部的敌人。”意思是说， 批评家的“天职”就是对创作家的创作百般挑剔，对创作家“横挑 鼻子竖挑眼”应该是批评家的常态行为。——这话至少有一半 道理。广义的“批评”包括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狭义的批评则 仅指否定。如果立足于狭义的“批评”来观察批评界，你便会发 现，有不少人是从不“批评”的“批评家”。这种“批评家”不是艺 术内部的“敌人”，而是“艺术内部”的“仆人”、“佣人”。不对创作 家发表否定性的看法，不对创作家进行质疑、追问，通常有两种 情况。一种是只说创作家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则不去触及， 但那好的一面确实是存在的，或者确实是他认为好的。在这种 时候，批评家虽没有说出全部的真话，但毕竟也算得上没有说假 话。——这样一种“批评策略”虽也不应该，但多少还可理解。 另一种情形，则是对创作家的一字一句都高声叫好。他们不是 内心也对创作家有非议而不公开说出，而是彻底丧失了发现创 作家不足的能力。坦率地说，他们合适的称号应该是“表扬家”。 他们已经成了•作家的“跟屁虫”。这种“跟屁虫”式的“表扬家”， 有意无意地认定，创作家的一切创作都是合理的存在，无论怎么 写都有充足的理由，而“批评”的使命就是极力去寻找创作的合 理性，就是跟在创作家后面为其提供“理论根据”。这种“跟屁” 式的“表扬”与其说是一种“策略”，毋宁说是一种“习性”。而这 种“习性”的养成，则是将“批评”当作名利“投资”的心态使然。 因为一开始就把“批评”当作广结善缘的手段，久而久之,对创作 家的“跟屁”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近乎本能的反应。——鲁 迅曾说，做文人做到这个地步，与婊子有什么差别？我不是鲁 迅，我只敢问：做“批评家”做到这个地步，与乞丐有什么不同？ 一个时代的创作界对批评界有怎样的态度，其实是检验这 个时代的批评有多大含金量的一种尺度。一个批评家的成功，

16当知识遇上信念

是赢得创作家广泛的敬重、敬畏，像别林斯基时代的创作家对别 林斯基，或者说，像刘西渭(李健吾)时代的创作家对刘西渭。而 准确、深刻地指出创作家的不足，是赢得创作家敬重、敬畏的必 要条件。如今的文坛上，创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如何呢？放眼 望去，那可是亲密到甜腻的程度，仿佛在度着永远也度不完的蜜 月。批评家的“保姆式”的服务，批评家的“跟屁虫式”的“表扬”, 令创作家感到被侍候得十分舒服。于是他们与批评家之间也就 亲如兄弟。他们会对批评家有真实的感谢，他们有时甚至公开 称那种把自己侍候得最舒服的人为最优秀的批评家，但要让他 们发自内心地对这样的批评家敬重、敬畏，那可就“难矣哉”了。 我敢说，如今的创作家对批评家最普遍的真实心态，是“瞧不 起”，别看他们与批评家酒桌上相互灌酒，牌桌上相互打趣，但内 心里，他们往往觉得这些吃批评饭的人一钱不值。

张燕玲主编给定的4 000字早就用过了头，可我一直在绕 来绕去，并没有把话说得很到位，而且一直拿捏着说话的分寸。 至于批评家们在评奖中的寡廉鲜耻，在那些所谓的“学会”改选 中的丑态百出，在某类创作家面前的“跪式服务”，我就不说 了。——可见，我也的确不配被称作“批评家”。

17当知识遇上信念

得罪了！弄批评的朋友和非朋友们。

2003年6月25曰

作家的工匠化

当我们说到某个作家的可持续写作时，前提应该是这个作 家曾经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因为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所以 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至少在所谓文坛上广为人知。写出过有影 响的作品，至少在文坛上广为人知后，仍能“继续”有作品问世， 仍能“不断”以新作支撑和证明自己的作家身份——这是可持续 写作的最基本的含义。

18当知识遇上信念

所谓“继续”、所谓“不断”，当然不意味着每月、每季度、每年 都必定推出新作。“十年磨一剑”也是在可持续写作，甚至还是 更值得信赖更值得尊敬的可持续写作。也许有人会说:“十年磨 一剑”算是可持续写作，那么，“一生磨一剑”算不算？ 一个人用 一生的时间写出一部优秀之作，难道不是比那种用一生的时间 制造大量平庸之作的人，更值得称道吗？也许的确有这样的人， 他用数十年的时间去经营一部作品。只要这数十年间他的确是 处于一种文学性的“经营”状态，就应该认为，这种状态也是一种

可持续写作状态。

但这毕竟是特例，是很少见的现象。我在这里谈论的是当代 的一般状况(这里的所谓“当代”，指“文革”结束后的时期，即20 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当代，曾经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曾经 广为人知，而很快难乎为继，这样的作家实在太多了。要举例的 话，那可真是举不胜举。正因为这种昙花一现的现象在当代文坛 十分普遍，才把当代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可持续写作可以是一种不考虑质量的写作，那所谓“可 持续”就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谈论这样的事情也就毫无意义。因 此，当我们谈论作家的可持续写作时，是把平庸和蹩脚的持续性 写作也作为一种问题来看待。曾经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而至少 在文坛上广为人知的作家，人们对其的期待是继续写出有影响 的作品；如果很快就销声匿迹，入们对其的反应是遗忘；如果不 断写出些平庸和蹩脚的作品，人们对其的反应是失望。

19当知识遇上信念

曾经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而很快就销声匿迹，或再也写不 出有影响的作品，这原因也不只一种。当我们从可持续写作的 角度考察这样的作家时，那最初产生影响的作品就会再度进入 我们的视野。而并不是所有曾经产生影响的作品都经得起时过 境迁的再度审视的。导致一部作品产生影响的原因，既可能是 文学性的，也可能是非文学性的。如果一部作品完全是，或主要 是因为非文学的原因产生影响的，那这个作家很快就销声匿迹， 或再也写不出有影响的作品，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文学的 意义上，当初的影响本就是一种“假性影响”。这部作品并没有 显示出这个作家有可持续写作的文学才华，而人们对之寄予的 可持续性写作的期待，本就是出于一种错觉。在当代，这种因 “假性影响”而让文坛内外人士对其抱有希望而终于又令众人失 望者，细数起来，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也确实有不少人，以成名作显 示了值得称道的文学才华，却未能将这最初显示的才华持续地 表现和充分地发挥。以某篇作品成名后，再写一两年，出版一两 本作品集，便从文坛上消失，或虽仍混迹文坛，但不再从事可称 之为“创作”的活动了——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以最 初的作品显示了值得称道的文学才华后，仍一直在写，仍不断有 长长短短的作品问世，但却再难写出那种很令人满意的作品，甚 至再也达不到成名作的水准。成名作始终是其代表作。——如 果一个作家持续写作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却仍 只能以最初令其成名的作品为代表作，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悲哀 的。这就像一个打了一辈子猎的人，到拿不动猎枪时仍只能以 最初打到的那头狼为荣，因为他此后打到的无非是些野兔野鸡。 这一类的作家，由于确有过人的文学才华，所以他们不断推出的 新作一般也不至于太差，不至于让人生出宁可服苦役也不愿读 完之心。这也可说是“痩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不断写出的作 品，给人的感觉常常是“不好不坏”、“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 到哪里”。这样一种写作，基本上是工匠式的，或者说得好听点， 是工艺式的。

工匠式或工艺式的写作，是可以不断有新作产生的，只要具 备两个条件：时间与体力。

20当知识遇上信念

影响一个作家持续性写作的因素，有外在和内在两类。纯 粹的外在（客观)原因，使得作家无法继续写作，这不在我们的考 虑之内。这里说的是内在原因，即作家自身的原因。影响一个 作家可持续写作的内在因素，我以为有这样四种：一、才华; 二、情怀;三、文化修养；四、与现实之间的文学性关系。

创作需要才华，这是毋庸多言的。当我们谈论一个作家的 可持续性写作时，前提就是他已经写出的作品，显示他具有进行

可持续性写作的起码才华。没有起码的才华，可持续性写作云 ，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最值得说的，是情怀。在影响一个作家可持续写作的诸因素 中，我以为，情怀是最关键的。那么，怎样解释一个作家的情怀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形：一个人内心安稳平静如一潭死 水;他在世俗生活中品尝到了无限的快乐，•沉溺于世俗生活中的 他，如浑身浸泡在一盆暖暖的水中，万分惬意;家门以外的一切， 都如秋风过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与他毫不相干;泰山 崩、黄河竭、长江决，充其量只成为他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样 的人，如果是一个作家，他凭借什么继续写作下去呢？驱使他写 作的动力何在呢？为了维持作家的身份，或被无止境的对名利 的追求所驱使，他也许还得不断地写下去。为了写下去，他就得 “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素材。于是，从历史上的奇闻异事到 街头的盗版碟片，都可能成为他创作的“资源”。但这样写出的 东西，充其量也就是不好不坏、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伦不类。

21当知识遇上信念

当然，作家也是人。人所具有的一切欲望，作家都可能有也 都可以有。但一个作家,如果心灵百分之百地世俗化，如果世俗 性的所得能令精神得到彻底的满足，如果心灵上、精神上没有哪 怕是百分之一的地方因不能被世俗占领而永远有着一种隐痛、 焦虑，甚至虚无、绝望，那么，他要以他的创作表达一种什么样的 情思呢？他又能以他的创作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思呢？

作家的情怀，内涵当然可以很丰富。但我以为，核心的一 点，是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如果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 融合无间的，一个作家如果与他置身其中的社会在精神上是相 安无事的，他的情怀当然也就无由产生。是否与现实始终保持 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是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起码的情怀 的标志。而在文学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像样的作家，不是与他所

生活的时代与社会有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的。

一个作家的才华只有通过情怀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情怀 虽然不能够产生才华，却能哺育、滋养才华。只有当深邃博大的 情怀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才华得以表现时，才华才能得到磅礴的 发挥。在《才华与情怀》一文中，我曾说，应将“江郎才尽”改为 “江郎情尽”。才华如果具有天赋的性质，那它就不会自行消失。 只有当才华失去了情怀的哺育、滋养时，才会萎缩、干枯。一个 本来颇有才华的作家，如果有一天变得很平庸了，那应该认为是 他丧失了起码的情怀。

才华、情怀之后，影响一个作家可持续写作的因素，是文化 修养。一个写作者，应该是一个不倦的思考者、探索者。而思考 和探索离不开读书。我们曾经把生活当作文艺创作的唯一源 泉，这应该是很偏颇的。生活和书本，都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一 个作家，用于读书的时间，应该数倍于用于写作的时间。必须读 了许许多多本书，才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

22当知识遇上信念

至于当代中国作家，我以为许多人都陷入了或正面临着可 持续写作的危机。每个人当然都会有着一些独特的原因。但如 从总体着眼，情怀的缺失，恐怕是一种根本性的因素。过去常 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种说法似乎已经“过时”。那么， 说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社会中最具有“飘零忧国”和“感寓伤时” 精神的人，能为大家认可吗？如果这说法能成立，那我想说，当 代中国作家，正在总体性地非知识分子化。在非知识分子化的 同时，是总体性地走向工匠化。这种工匠化的表现之一，是知识 界在面对一些公共性的问题和事件发言、表态时，已看不到作家 的身影。这无论与海外作家进行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历史上 的作家进行纵向比较，都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异现象。

今天的中国作家，越来越像一群手艺人。

我曾经是上帝

信奉基督教的朋友，看了这题目也许会在胸前连连画十字 吧，我自己也觉得实在有些亵渎神圣。但我确实被人当成过上 帝。不但是我，许许多多的人，都被人当成过上帝。被谁呢？—— 当年的“先锋小说家”马原也。

23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当年”，已快二十年了。近二十年前，马原以一批令人鬼 皆晕的“先锋小说”博得大名。在文坛上扔下些“叙述圈套”后， 马原便扬长而去了。此后，便一直享用着这“先锋小说家”的声 名。最近，在《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有影响的报纸上，又 读到马原在以“前先锋小说家”的身份答记者问。这让人感叹马 原当年挣得的名气真像一笔巨款，以至于二十年了还不断有款 可提。

在2004年10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文学”版上，马原 说:“我早年的小说不是给读者写的，是给自己写的，或者是给我 的上帝写的。”这话让我惶恐不已。当年，我虽是一个穷学生，但花钱买过刊有马原小说的刊物，也花钱买过马原的小说集。虽 然读马原的小说总让我如坠云雾，实在不知道批评家们为何对 之极尽称颂之能事，但觉得自己总也算马原小说的读者，哪怕是 不合格的读者。现在才知道，这原是一厢情愿。马原的那些小 说，根本就不是“给读者写的”，是给他“自己”或者给他的“上帝” 写的。我想了想，觉得自己实在不可能成为马原的“自己”，那就 只能成为马原的“上帝”了。

我连信奉上帝都自认为没有资格，却无意间成了上帝—— 这让我心惊肉跳、栗栗危惧。惊惧之余，不免对马原先生生出些 怨恨。您如果是“给自己写的”，那就应该塞进抽屉或装入麻袋; 您如果是“给我的上帝写的”，就应该以您知道的方式献给“我的 上帝”。刊物和出版社是以我等肉眼凡胎的“读者”为销售对象 的。“不是给读者写的”却又让刊物发表、让出版社出版，不是存 心诱人入罪吗？当初买刊物和书花去的钱，原可以多吃许多块 红烧大排和肉末蒸蛋的。假如真有所谓上帝，也该宽恕我的僭 妄之罪吧。想到这里，松了口气。但又瞥一眼书架：那里放着 的马原小说集，该如何处置呢？

24当知识遇上信念

马原现在崇拜克里斯蒂，“希望写永恒的畅销书”，但又宣称 并没有否定早年的自己没有否定，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只 不过你有创造力的时候，你希望自己能对你的前辈做的事情有 一点突破，有一点个人贡献，要不然你就被你的前辈压倒了，你 写什么前面都有无尽的大山压着你。”这口气，仿佛当年是独辟 了一条蹊径，因而对“前辈”有了“突破”，对文学作出了“个人贡 献”。这颇有点大言不惭。马原们应该知道，自己当年玩的那一 套，也不过是对罗伯一格里耶一类人的学步。独辟蹊径，丝毫谈 不上。只能说，在最有“仿造力”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合时宜的 “终南捷径”，从而一举成名。至于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我以为消极的远远大于积极的、负面的远远大于正面的，贡献云 乎哉。

读马原的答记者问，更坚定了我早已有之的一种想法文 学创作者要捉弄、玩弄、愚弄文学批评者，是极容易的；当批评者 一脸严肃地论说创作者的“创新”、“突破”、“超越”、“贡献”时，创 作者或许正在那里窃笑。

2004年11月7曰

25当知识遇上信念

文学奖是

在《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3日）上，读到一篇谈欧美 文学奖的文章，题目叫做《文学奖是出版商的盛宴》。文章主要 说的是法国的情况。说在法国，文学奖正在受到出版商的操纵， “出版商不仅有提名权，而且往往安插与自己关系密切，甚至有 合约关系的作家当评委。有些评委多年如一，甚至80多岁了还 不肯引退，罔顾自己的阅读口味有脱离社会大众的危险”。出版 商积极介入文学评奖活动，打出的招牌虽是为了繁荣文学和促 进“读书文化”，实际的目的则是为了卖书。倘若自己出版的书 获了大奖，立即就会销量大增，哪怕原本销量平平甚至无人问津 者，也会热卖一阵。因此，在那边，文学奖是“出版商的盛宴”。 文章中说，这种情况也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和批判，认为“出版社 对评委的控制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破坏性的”，其后果之一便 是“作家任由编辑摆布已成文坛的普遍现象”。

26当知识遇上信念

读了这篇文章，我不免有了几秒钟的阿Q式的精神快慰:

原来“外国也有臭虫”，原来那边的文学奖也不那么干净，原来 “天下乌鸦一般黑”，原来……

但稍细一想，又气馁起来，觉得那边的情形毕竟与这边不 同。文学奖固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出版商左右，但影响评奖 的，毕竟只有出版商，还算较为单纯；而获奖能立竿见影地导致 畅销，则说明文学奖，尤其是那种所谓的“大奖”，毕竟还有极大 的权威性，说明公众还是很信赖评委的，说明文学奖还是一件广 大读者普遍关心的事，是一件有社会影响的事。

文学奖既受出版商操纵又能有如此效果，原因何在呢？我 想，应该在于出版商和评委毕竟都守住了“底线”。出版商虽努 力影响评委，想让自己出版的书获奖，但他们推荐给评委的书， 一定是他们认为确实不错的书。他们绝对不会因为作者是自己 的“大哥”或“小蜜”，便把那种不入流的东西塞给评委。不入流 的东西不获奖还好，真获了奖，那出版商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招牌”和“饭碗”了。评委这一方，既各各受到不同出版商的 左右，其实也就有了一种互相监督和制衡，而且除出版商外，也 不会再有什么人能影响评委，不会有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来迫 使评委绝对保证何人获奖和绝对保证何人不获奖。正因为“底 线”并没被突破，所以，文学奖在那边还能成为“出版商的盛宴”。 如若“底线”突破了，那出版商不但吃不成“盛宴”上的牛排，恐怕 连“简餐”中的鸡腿也啃不成了。

27当知识遇上信念

而咱们这边，影响文学奖的非文学因素，可就太多了。在咱 们的评奖过程中，有显规则，有潜规则，有半显半潜的规则，有二 分显八分潜的规则，有四分潜六分显的规则，有不显不潜似显似 潜的规则，有看得见摸不着的规则，有摸得着看不见的规则，有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则，有只可言传不可意会的规则……这 种种“规则”，首先决定着谁能当评委谁不能当评委，首先保证着

谁“必须是”评委谁“绝不能”是评委;其次，才决定着谁能获奖谁 不能获奖，才保证着谁“必须”获奖谁“绝不”获奖……其结果呢?

当知识遇上信念

其结果，就是文学奖非但在社会上毫无影响，即便在文坛 上，也少有人关心。许多人听说谁获了奖，哪怕是“大奖”，也像 听说邻居的猫下了崽一样漠然。

所以，在咱们这边，文学奖是组织者、评委和获奖者的一次 自助餐。

文学奖的内与外

最近十几年来，每当有那种全国性的“文学大奖”揭晓，在媒 体上，在人们或正经或随意的私下谈论中，总会有许多质疑，有 许多非议。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大 奖”，并想到那年代的一篇关于“文学大奖”的批评文章。

29当知识遇上信念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应该是1985年前后吧，那一次的“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出的是十五篇作品。评选结果公布后，陕 西的批评家王愚先生，写了一篇《十五篇之外》。文章强调，在这 期间，优秀的短篇小说并不只有这十五篇，在这十五篇之外，还 有不少堪称优秀的作品。我记得，作者一一列举了他所读到的 十五篇之外的好作品，每篇都做了简短的评说，好像也有数十篇 之多。

那时候，我刚开始读研究生，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对那时 候的全国性“文学大奖”，是很信服的。换句话说，那时候，这种 “文学大奖”，在文坛内，在社会上，都是颇具权威性的。但王愚先生的文章，却使我眼睛一亮，使我开始换一种眼光看待“文学 大奖”了。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也很优秀，甚至更为优秀的作品 并未获奖，那么，这奖，还能说是公正合理的吗？还应该具有那 么大的权威吗？

但90年代以来，我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90年代以来， “文学大奖”的评选理念、评选方式、评选结果，都让我怀念80年 代的“文学大奖”。我意识到，王愚先生那样的文章，与其说是对 那次评奖的质疑、非议，毋宁说是对那次评奖的肯定、赞美。当 你强调在获奖作品“之外”，还有同样优秀的作品存在时，你实际 上是认可了那“之内”的作品，的确篇篇都是优秀的，篇篇都是应 该获奖的。认可“之内”，是谈论“之外”的前提。“内”之不存， “外”将焉附？——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免觉得当时的自己，是 很浅薄的。王愚先生的文章，并未否定那次评奖的公正合理，并 未挑战那时“文学大奖”的权威性。这篇批评文章的价值，仅仅 在于提醒我们，不要把眼光只盯着那少数获了大奖的作品而忽 视了其他优秀作品的存在。

30当知识遇上信念

一种全国性的“文学大奖”，必然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只有当这种“大奖” 是基本公正合理的，是具有起码的文学意义上而非行政意义上 的权威时，正面的影响才能产生。而一个“文学大奖”是否基本 公正合理，是否具有起码的文学意义上的权威性，不在于是否有 好作品和有多少好作品未获奖，而在于获奖作品是否篇篇都是 好的。人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好作品都获“大奖”，却有理由 要求所有获“大奖”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尽管我们不能说，在20 世纪80年代，“文学大奖”就不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但这种干 扰还没有扭曲“大奖”、使“大奖”发生畸变的力量。因而，在那时 候，“文学大奖”对文学创作是产生了明显的良性作用的。

那么，怎样判定一种“文学大奖”被扭曲和发生畸变了呢? 如果获奖作品大部分都平庸甚至低劣，如果人们能轻而易举地 在获奖作品“之外”举出一大堆远甚于“之内”的作品，那这样的 “大奖”就被扭曲了，就发生畸变了。如果这样的“大奖”又因为 权力的介入而具有一种非文学的权威性，那它对文学的恶性影 响就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大奖”存在，本身就是文 学的耻辱。

今天已没有人写当年王愚先生那样的文章了，因为写这种 文章的前提已不存在。

2007年12月19曰

31当知识遇上信念

王朔：蹵到马路上来了

关于“大院子弟”王朔及其小说，我在数年前出版的《文坛三 户：金庸•王朔•余秋雨》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分析。本来不打 算再就这个人说什么话了。但这两天，有朋友来电话，说王朔 “复出”了，在一个什么周刊上发表谈话，并且“骂”到了我。又说 在网上或许可搜索到。打开电脑，果然在网上找到了那篇题为 “王朔：我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的文章。其中关于我的话是这 样的：“王彬彬为了城市户口和就业，博士生毕业又去拉关系，混 进南京军区，这是对人民军队的玷污，我觉得非常卑鄙。”

32当知识遇上信念

读这段话，我既有真实的愤怒，又有啼笑皆非之感。令我啼 笑皆非的，是“对人民军队的玷污”这句话。这样的话，是让人如 鲠在喉，却又无法一吐为快的，即使我有胆写出来，也一定会被 编辑删去。这其实是王朔骂人的惯用招数。他虽然总以在“体 制外”自傲，但他非常清楚他倚仗着的是什么。与王朔争辩，谈 论王朔小说，其实都不能把想说的话尽情说出来。我那本书中关于王朔的部分，就有许多欲言又止、欲言又不得不止之处。俗 话说:“家门口三尺硬地”;又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王朔其实 正是站在“家门口”骂人的，正是那种有强大后盾的“地头 蛇”。——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认为王朔是流氓。

令我愤怒的，则是“为了城市户口”这几个字，这体现了作为 “大院子弟”的王朔，对农民的那种流淌在血液里的歧视。王朔 此番“复出”，大言不惭地谈到了“平等”。而把人先天地分为“城 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两类，这叫什么“平等”？王朔们生下来就 有的身份，农村人“博士生毕业又去拉关系”才能得到，这“平等” 又在哪里？而这样的拼搏、挣扎，却要被“大院子弟”王朔骂为 “卑鄙”,这“天理”又在哪里？王朔以“体制外”自傲。请问：五 六十年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 贡献的农民，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

33当知识遇上信念

至于我，虽从农村走出，却因为父母都是教师，是所谓“国家 干部”，所以也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的。1978年夏，我参加高 考，被部队院校洛阳外语学院录取，成了“人民军队”的一员。这 真是我做梦也不曾想过的。1982年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军区。 在度日如年中热切地盼望着换个环境，却是“求天天不应，求地 地不灵”。1985年冬，天上掉下了馅饼——现役军人可以报考 地方院校研究生。我激动地报考了复旦大学。但上面很快又 说，考上地方院校者，不得转业，毕业后仍须回部队。从1986年 到1992年，我从硕士读到博士，复旦大学决定我留校。为了让 部队开绿灯，我给其时的南京军区有关领导写了封信。这位领 导却在我的信上做了将我调入南京军区创作室的批示。这样， 我就又回到了南京军区。经连续几年的争取，1999年，我终于 转业到了南京大学。

我个人的经历并不重要。王朔对我个人的侮蔑也大可一笑了之。我之所以在这里写一份自己的简历，是想说明王朔说话 有着怎样的方式。一个人，如果总以这样的方式说话，不是流ig 又是什么呢？

王朔现在读佛经了。如果能“立地成佛”，那当然是大好事。 法朗士小说《黛依丝》中的黛依丝，就是从一个娼妓变为虔诚的 教徒的。但从王朔“复出”后的言论看，真是毫无长进。中国向 来有“吃教”的传统。而“吃教”在今天，也正成一种时尚。前些 时候，与几个朋友聊天，谈到一位信了上帝且不时把《圣经》挂在 嘴上的教授。有人说，他信教后做起恶来似乎更心安理得了。 每星期去一次教堂，就像是每星期去一次澡堂。于是乎，每星期 都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其实也是“吃教”之 一种。王朔的读佛经，也逃不出一个“吃”字。看来，他把《毛泽 东选集》和《华严经》《金刚经》《六袓坛经》等，做成一个拼盘了。

34当知识遇上信念

王朔本是小说家。他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复出”。现在举着 佛经“复出”，让人想到鲁迅用过的一个比喻：“但其实是正如烟 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 里蹵到马路上来了。”

2007年1月24日夜匆就

知识与信念，过去与现在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是几代中国人最初获得的知 识之一。这种知识与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相 纠缠，因而早已成为一种信念。当知识成为一种信念后，便是拒 绝质疑、不容否定、难以改变的。因此，当有人撰文认为“四大文 明古国”之说本身便不严谨，而中国更是应该“出局”时，他挑战 的便不是一种“历史知识”，而是几代中国人的一种信念，甚至是 许多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支柱。这样，他遭到义愤填膺的抗议、义 正词严的驳斥和义形于色的谩骂，就是十分正常的了。——这 些抗议、驳斥和谩骂者，认为对这种“异端邪说”予以迎头痛击, 是义不容辞的。

35当知识遇上信念

当这些人“义”字当头时，有关中国是否应该“出局”的争论， 便不是一种知识之争，而是一种信念之争。而在信念面前，知识 往往是苍白无力的。“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培根的名言。然而， 当知识成为信念后，就如玉米被膨化成爆米花一般，会膨大许多倍。就是几何的公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信念，也可能被踩在脚 下。如果说，真理有可能越辩越明，那信念则可能越辩越乱，越 辩越糊涂。那么，如果压根儿不想真正在知识的意义上弄清楚 中华文明是否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则罢;如想真正在知识的 意义上弄清楚这一问题，就必须把信念还原为知识，把信念之争 还原为知识之争。这也正如要想真正弄清玉米的大小、形状、色 彩，就必须把爆米花还原为玉米。

如果把中华文明是否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还原为一 个纯知识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深、复杂的 学术问题，非研究人类文明史的专门家，是无由置喙的。例如我 吧，就毫无在“是”与“否”的问题上发言的资格。关于人类的文 明史，我懂得些什么呢？懂得些破碎到极点也肤浅到极点的“常 识”，这点可怜的“常识”，很可能还是似是而非的。用九牛一毛、 沧海一粟来形容我的那点人类文明史知识，是毫不过分的—— 既然如此，我如果在这一极其专业的问题上说短道长，不是太没 有自知之明了吗？

36当知识遇上信念

我不但没有资格谈论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兴趣谈论这 一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应该让这方面的 专门家去研究、去探讨、去争论〇如果专n家们长期达不成共 识，就让他们长期研究、探讨、争论下去好了，即便永远达不成共 识，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果有一天专门家们达成了共识，不 管是怎样的共识，那就让这种共识成为我们的知识。

至于有人因“出局”之说而痛不欲生，那实在大可不必。使 那么猛的劲、发那么大的狠、动那么真的情去与人比过去，不如 冷冷静静、老老实实、方方面面地与人比现在。我们不应老想着 让老袓宗为我们增光，应该多想想我们怎样为老袓宗増光。从 来只有“光宗耀袓”一说，自古未闻“光子耀孙”之论。如果我们的老祖宗确实十分了得，确实赢了别人，而我们却只是在老袓宗 的“光耀”下才能有一分自豪、半分自信，那我们也实在是太没出 息的不肖子孙了，也太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了。听听阿Q是 怎样说的吧:“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2008年3月7日凌晨

37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一座文坛，这一桩富贵

几年前，青年作家韩寒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文 坛来了一番痛骂。在痛骂文坛的同时，韩寒也对文学应该如 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有许多人读韩寒的文章而眉 头大皱，但我却开心地笑了。韩寒对文学应该如何的看法，当 然还过于简单，还不无偏颇，但韩寒对文学不应如何的看法则 无疑是正确的。至于韩寒对文坛现状的抨击，就可谓一针见 血了。也正是那顺着针尖流出的血，引发了我开心的笑。固 然，韩寒的话语方式很粗俗很鄙劣；文坛再脏，批评文坛的话 却不必也脏。但韩寒的脏话，与前些时候成为学界事件的某 位教授的脏话，不可等量齐观。以韩寒“尚未被文坛认可”的 身份，如果以文质彬彬的方式批评文坛，那就如拿着一根草棍 敲击厚厚的城墙，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那就如一缕阳光照 进万丈深坑，连一点反应也不会发生。所以，韩寒的话语方式 虽然不值得肯定，但也应看到，这是韩寒所采取的一种批评策

38当知识遇上信念

略。或许，正是为了让自己的批评能刺痛文坛麻木的神经，韩 寒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在谴责韩寒出此怪招的同时，也应想 到，文坛的皮比城墙还厚，要做到一针见血，这针非有点“怪” 不可。

韩寒的脏话，让文坛皱了一下眉头，但也仅仅皱了一下眉 头。很快便风平浪静。文坛依然故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 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文坛真是韩寒所说的那令人掩鼻的 东西，就仍然是那东西。这真是“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我 曾希望韩寒的骂，能引起文坛中人严肃的思考、认真的反省。我 也曾希望韩寒的骂，能引起文坛热烈的讨论，辩一辩文坛到底是 不是韩寒所说的那东西，如果是，怎样令其不是。但我很快意识 到自己的天真。文坛对韩寒之骂的对策，终于令我想到《红楼 梦》中凤姐和贾蓉对焦大之骂的态度。“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 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醉酒的焦 大，竟骂出了如此难听的话。而“凤姐和贾蓉也遥遥的听见了， 都装作没听见”。坐在车中的凤姐和贾蓉,听见焦大那些骂语， 应该也皱了皱眉头吧，但终于“装作没听见”。面对这样的骂语， “装作没听见”是最聪明的做法。以凤姐的“脸酸心硬”，要做到 这样其实很不容易。当焦大尚未骂到这一步时，凤姐是何等泼 辣，责怪宁府对焦大“太软弱”，责问宁府“何不远远的打发他到 庄子上去就完了”。然而，当焦大终于骂到了这一步时，连凤姐 也只得“裝作没听见”了。凤姐深知，如果对焦大认真追究，那荣 宁两府的丑事就都包不住，自己藏在褂子里的断臂，也只好露出 来了。只有未更世事、不通世故的宝玉，认真对待焦大的骂语， 他试图与凤姐讨论一下:“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这是什 么话？”这一问，当然令凤妲尴尬，令凤姐恼怒，于是“连忙喝道”：

39当知识遇上信念

“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的胡嗄，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 还倒细问！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捶你不捶你！”对焦大的这种毫 不留情面的“批评”，理应“装作没听见”，如若“细问”，那就是 罪过。

而文坛对韩寒的毫不留情面的骂，也采取了“装作没听见” 的方式。但韩寒比焦大幸运。焦大虽大有功于贾府，却毕竟是 府中奴才，他须得在府中讨生活，所以还是被别的奴才塞了一嘴 马粪。既然韩寒被文坛中人认为只进入了市场而没有“登”上文 坛，那就是文坛外边的人，不在文坛上混吃、混喝、混穿、混住，不 在文坛上争风吃醋、争名夺利。文坛奈何不了他。文坛有自己 的规则，更有自己的潜规则。如果韩寒也已在文坛上混，也想从 这坛上得到那些香香辣辣的东西，那这番连荤带素的骂，可就真 有点“自杀式袭击”的味道了。不会有人打着旗帜、吹着军号来 兴师问罪，但你在文坛上时时会觉得遇上了鬼打墙;没有人会宣 称要对你进行这样那样的报复、制裁，但会有许多看不见、摸不 着的陷阱、路障在寻找你的双脚。那个人，他与你热情地握手， 他对你和蔼地微笑，他甚至言很由衷地夸奖你，但你不知道， 他内心对你反感极了，一旦有机会对你使絆了时，他决不犹 豫。那个人，你与他素不相识，你与他不曾有过任何瓜葛，你 甚至对他不无好感，但你绝对想不到，在某个时刻、某种场合， 正是他对你使了个绊子。文坛是一个整体。文坛又有许多圈 子、山头。骂了一个人，有时就等于骂了整个文坛。骂了文 坛，就等于骂了坛上的所有人。至于圈子、山头，就更是相互 帮衬的利益集团了。同一圈子内、山头上的人，在文坛上肩并 肩地抢这夺那，背靠背地对付外敌。圈子内、山头上，没有是 非，只有以名利为支撑的“义气”。如果骂了圈子、山头上的一 个人，当然就等于与整个圈子、山头结仇，于是便会对你全圈

40当知识遇上信念

共讨之、全山共诛z。

韩寒对文坛的骂，虽算不上“自杀式袭击”，也还是需要很大 勇气的，因为这意味着主动放弃某些东西，例如，“茅盾文学奖”， 恐怕就难得与他结缘，因为这个奖，也被他说成了那闻之令人掩 鼻的臭东西。“茅盾文学奖”，这可是文坛上最大的一桩名利。 用商场上的话说，“茅奖”是最大的一笔生意;用《水浒传》中的话 说，“茅奖”是最大的“一套富贵”。《水浒传》中，赤发鬼刘唐得知 今年又有十万贯生辰纲要送进京时，便来找本不相识的晁盖，密 谋劫取，说是“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因了这十万贯 生辰纲，晁盖、刘唐、吴用、三阮、公孙胜这些人聚在一起。他们 策划于后堂深处，打劫于黄泥冈上。文坛中人，对“茅奖”的态 度，往往与刘唐、晁盖、吴用等人对那生辰纲的态度相似。每一 次“茅奖”的评选，其实都意味着文坛上力量的重新分化与整合。 “茅奖”往往会让一些本来紧密团结的人团结得更加紧密；“茅 奖”会让一些本来不相干的人纠集在一起;“茅奖”会让一些本来 携手并肩的人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茅奖”也会让一些本来 属于不同圈子和山头的人抱成一团。“茅奖”的评选，与其说是 作品质量的竞争,毋宁说是人脉、关系的较量，是文学之外各种 力量的搏杀。一个作家，敢不敢对这套“富贵”动欲念，作品质 量如何是并不重要的。他需要估量的，是自己在文坛上的人 脉和关系，是自己在文坛上能调动的资源，是能发动多少人为 自己造势，是能否把那些“含金量”高的人都搞定。如果他这 些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他就可能来一次“智取茅盾奖”。新的 一届“茅奖”评选据说已经启动，又一套大“富贵”浮出水面。 你留心看看吧，许多人都有着晁盖、刘唐、吴用、三阮们刚纠集 到一起时的表情。

41当知识遇上信念

也许有文坛之外的人说文坛原来这么无聊呀！文坛原来

这么有江湖气呀！文坛原来有点像黑社会呀! ”我想说：如今这 文坛，本来就这么无聊呀！本来就这么有江湖气呀！本来就有 点像黑社会呀！

42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8年6月22曰

I第二辑丨

与几种书的相遇

其实汪曾祺也善写恶人

说《鸡毛》

对已故作家汪曾祺先生，人们有一些“定论”般的看法，其中 之一，是认为汪曾祺先生总是写那种特别善良的人，且特别善于 写善良的人，而这里重新发表的《鸡毛》，则可谓主要是写“恶 人”，或曰主要写了人性的一种邪恶。当然，重新发表这篇小说， 并不仅仅因为它在汪先生的创作中显得有些“另类”，还基于这 样的理由：这其实也是一篇艺术上相当成熟和有特色的小说; 这样一篇颇值得注意的小说却几乎长期处于被《受戒》《大淖记 事》等作品所遮蔽的状态;重新发表它，则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 意、让它产生应有的影响；让人们知道汪先生不只写过《受戒》 《大淖记事》这类好作品，也写过《鸡毛》这样的好作品;从而丰富 人们对汪先生的理解，也让汪先生的文学面貌更全面地显现。

45当知识遇上信念

谈到汪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我们当然会首先想到那些特别 忠厚、温厚、淳厚的人，那些特别知仁知义、知情知理、知足知趣的人,那些朴实善良得近乎木近乎痴近乎儍的人。《受戒》中英 子的爹娘是这一类的人;《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雜 甫是这一类的人;《金大力》中的金大力是这一类的人;《钓鱼的 医生》中的王淡人是这一类的人……当然，并不是说汪先生在 《鸡毛》以外的作品中，就根本不写恶之人或人之恶。实际上，在 《大淖记事》里也写到过刘号长怎样欺压良善;在《岁寒三友》里 也写到了王伯韬、宋保长、驻军连长一类“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 么钱也敢拿”的人;在《陈小手》里也写了那个驻军团长的恩将仇 报还“觉得怪委屈”;在《钓人的孩子》中也写了那个用钞票玩钓 人游戏的“小魔鬼”般的孩子……但在这些作品中，恶人之恶通 常只是作为善人之善得以表现的机缘而出现，或者，只是作为善 人之善的陪衬而被叙述，因而总是写得很简略，几句话交代清楚 了，让下面的故事有发展的理由即可。《钓人的孩子》固然有些 例外，算是“主要”写人之恶，但毕竟通篇不过几百字，谈不上对 人之恶的细致描绘。

这篇《鸡毛》则不同。我一直认为《鸡毛》也是汪先生特别重 要的作品之一，其重要性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受戒》《大淖记 事》这样的名篇。这首先是因为《鸡毛》显示了汪先生其实也很 善于写人之恶，也具有很高超的讽刺才能。——而这一点是一 直被忽视、被埋没的。小说主要写的是西南联大一个叫金昌焕 的学生。此人最大的恶行，当然是偷了可怜的文嫂赖以为生的 三只母鸡，又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等鸡吃完后洗也不洗就把鼎 罐还给文嫂。但在掲示这最大的恶行之前，汪先生已以一系列 精彩的细节描绘，把这个人内心的鄙吝、恶俗，把这个人的自私、 卑下，把这个人的无聊、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写他“从不 买纸”，每天晚上带着一把剪刀，把校园里各种启事、告白的空白 处剪下，“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

46当知识遇上信念

处”，•例如写他每天要吃一块肉，“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 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例如 写他对女同学“动情”的原因、“求爱”的方式，以及“求爱”被拒绝 后的表现，都可谓讽刺得入木三分。我们本来已经对这个人厌 恶得无以复加了，然而汪先生还要告诉我们此人偷鸡这件最让 人恶心的事，终于让我们对他掩鼻作呕……

但汪先生毕竟是擅写人之善的。在《鸡毛》里，他也写了文 嫂的善良，写了她的乐于助人，写了她的“洁身自好，不贪小便 宜”。但文嫂的善良，毕竟不是汪先生所要着力表现的。写出文 嫂的善良，是为了让金昌焕的不善和丑恶更加彰显，更加令人不 能容忍。除了写文嫂的善良，汪先生还写了她的苦难，写了她的 无依无靠和无告。同时，汪先生还写了文嫂对金昌焕这类“要做 大事”的“先生”的敬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唤起读者对金 昌焕的更强烈的鄙视、憎恶。——欺侮这样一个善良而不幸，却 又对大学生满怀敬仰的老人，金某真可谓狗彘不如了。

47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结构上，《鸡毛》则有着汪先生一贯的大巧若拙的特色，表 现出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语言上，也淡而有味，例如，“鸡转 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地那么转”，“进窝时还故意 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 些鸡还都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然后向前一跳……进窝以 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真让人感叹汪先生观察的仔细 和描写的传神。还有，文嫂最后的哭诉，也真非平庸作家所能 写出。

2002年11月15曰

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

《受戒》是汪曾祺先生的名篇，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名 篇。如果要问哪一部作品最能代表汪曾祺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成 就，恐怕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答以《受戒》。我喜欢汪曾祺，但我 却并不很喜欢《受戒》，或者说，我对《受戒》中的某些部分十分喜 爱，但对其中的有些部分则颇有抵触。

48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说到我为何不太喜欢《受戒》之前，我还得先说说我对汪 曾祺的喜爱。

最近几年，我在大学开中国当代文学课，汪曾祺是我在课堂 上所花时间最多的作家，几乎每次都要用去两个课时。我同时 向学生说明，我并不认为汪曾祺是那种堪称“伟大”的作家，甚至 也不能断言汪曾祺就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实际上，多年 前，我还写文章对过分的“汪曾祺热”表示过异议。在任何一个 时代，如果仅有汪曾祺这样的作家，那肯定是不够的。但汪曾祺 对于我，却又的确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具有反复欣赏、品味的价值。任何时候 拿起汪曾祺的书，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上几篇。这些人物、情 节、故事早就很熟悉的作品，仍能读得津津有味，我欣赏的是什 么呢？是语言，是汪曾祺那炉火纯青的白话汉语。我们会对一 些京剧名段一遍又一遍地听，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听得如痴如醉， 是因为那唱腔已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脱离剧情而独立存在的审 美品格，也可以说，是因为那唱腔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纯形式 的美。而汪曾祺的作品，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作如是观。 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具有了某种纯形式的美。文学是语言的 艺术。对语言的文学性缺乏敏感的人，其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 力便是大可怀疑的。而要懂得什么是白话汉语之美，要品味白 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汪曾祺不可不读。——这是我在课堂上 用最多的时间讲解汪曾祺的主要原因。

汪曾祺对语言的基本看法也为我所认同。在《自报家门》 中，汪曾褀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 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 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象树，枝干内部 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象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 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于在一句中“炼”出一个光 彩的字，或者热衷于在一篇之中“炼”出几个耀眼的句，都不是一 种最高的追求，都难免失之于矫情、做作。好的文学语言，应该 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在作品整体中，在前后的 文气相接中，却读每一句都如嚼橄榄。汪曾祺所追求的，正是这 样一种语言境界。汪曾祺无意于“炼”出那种奇崛的字句，他字 字句句都那么寻常，甚至土气，但一句一句地读下来，却感到真 是“一句也不能少”。这当然不是说，在品味汪曾祺作品时，就没 有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实际上，我常常在汪曾祺的作品中

49当知识遇上信念

碰到这样的句子，并且每每要玩味再三。但汪曾祺作品中这类 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却并不具有“奇崛”的特性，也并不能脱离整 个作品而存在，如果把它从前后文中抽离，仍然是寡味的大白 话。不妨举上几例。汪曾祺有一篇很短小的小说《求雨》，写的 是大旱时节孩子们敲锣打鼓求雨的事。写到人们因大旱而望云 霓时，道:“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 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 雨呀，雨呀!”这后面的一句“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 呀!”既是很土气的大白话，又是“闲笔”，对于故事的叙述来说， 这样的句子可有可无。然而,在读了前面的叙述后再读这句话， 却感到那么富有意味，人们盼雨的心情也表现得更为真切。写 到孩子们求雨回来后，道：“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 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 了。”这最后的一句“一睡就睡着了”，是纯粹的口语，仿佛随时能 从野老村妪口中听到，但放在这里，却若有神助，令人回味不已。

诗人艾青曾大力强调过口语美。在《诗的散文美》一文中， 艾青说:“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 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在文章中，艾青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艾青在一家印刷厂墙上看到的一个工友写给同伴 的通知：

50当知识遇上信念

“安明！

你记着那车子！”

艾青评论道:“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禀赋。 这语言是生活的，然而，却又那么新鲜而单纯。这样的语言，能 比上最好的诗篇的最好的句子。”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电影里的 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是一个要和爱人离别的男人说的：

“不要当做是离别，只把我当做去寄信，或是去理

发就妤了。”

艾青评论道:“这也是属于生活的，却也是最艺术的语言，诗是以 这样的语言为生命，才能丰富的。”读汪曾祺小说，我总是想到艾 青对口语美的推崇。我以为，汪曾祺的语言追求，是十分符合艾 青的语言理想的。而用“新鲜而单纯”来评价汪曾祺的语言，也 极合适。具有新鲜而单纯的口语美，可谓汪曾祺作品的一大特 色。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再举一例。在《陈泥鳅》这篇小说中， 汪曾祺这样写陈泥鳅:“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 段叫清水潭。……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 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 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为 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这里的叙述语 言，整体上都很口语化，尤其那“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是纯 粹的口语，是随时可听到的说法，但出现在这里，又如此清新。 在《诗的散文美》中，艾青说:“有人写了很美的散文，却不知道那 就是诗。”这话用在汪曾祺身上，确切不过。

51当知识遇上信念

前面说，汪曾祺的语言，已具有一种纯形式的美，这当然是 在相对意义上说的。当汪曾祺用那富有口语美的语言表达的思 想情感、颂扬的人生态度也为我所认同时，我就有着更大的愉 悦。当他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颂扬的人生态度与我的接受心 理相抵触时，我也会感到不太舒服。而名篇《受戒》中就有令我 不太舒服之处。具体说来，就是小说中对那“荸荠庵”的叙述，每 次读来，都令我多多少少有些反感。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 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 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 尚。”在这地方人眼里，当和尚与劁猪、做婊子等是一回事，都是 一种谋生的手段。也许这是实情，然而，汪曾祺却是以极为欣赏 的语气来叙述这种实情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 也没人提起。”在一个完全没有“清规”的庙里，和尚们怎么生活 呢？“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 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 的方丈房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 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 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既然完全没有“清 规”，那就吃喝嫖赌、娶妻纳妾都可以，于是:“二师傅仁海。他是 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 快。……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 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于是：“三师傅……前 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二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 不止一个。”于是：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 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 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 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 叔念，神情很庄重：

52当知识遇上信念

“ 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

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傅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 沫子喷出来。

我完全相信汪曾祺这里写的，是一种民间实情。但也总想到鲁 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种概括——“做戏”。在《马上支日记》中， 鲁迅说:“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便吓得屁滚尿流，不 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 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有的……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 定一切传统的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 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 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 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 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 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 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 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 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中国有 俗语云:“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按鲁迅的观察，中国人往往 把“戏场”与“天地”相混淆，把“做戏”与“做事”相混淆。这种“劣 根性”在各种方面都表现出来，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很 明显。宗教在中国，往往并非“信”的对象，而是“吃”的对象。鲁 迅在《吃教》中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 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 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 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道释之流的信者， 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而“有宜于专吃的时 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于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 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汪曾祺在《受戒》中，以欣 赏的语气，把中国民间这种“吃教”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当 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

53当知识遇上信念

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 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庙 田也可以。”“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舅舅说……要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

在《“滑稽”例解》中，鲁迅说:“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 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受戒》中写到的 “荸荠庵”，当然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正经”所在。但这“庵”中的 事，甚至不需“想一想”，都能感到强烈的滑稽。这以大殿上杀年 猪最典型。一边是“神情庄重”地念“往生咒”，一边是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真是滑稽之至。中国的“正经事”之所以往往“想一 想”便感到“滑稽”，就因为“正经事”原本也不过是在“做戏”。

54当知识遇上信念

民间的“做戏”与官方的“做戏”往往有着同构性。鲁迅还写 过《现代史》一文，说的是街头的各种戏法，最后才说“到这里我 才记得写错了题目”。其实鲁迅想说，一部“现代史”，不过是政 坛上的各种戏法变换。按鲁迅的说法，《受戒》中的那些和尚，不 过都是“做戏的虚无党”。当然，并非因为鲁迅一再批判这种“做 戏”的“国民性”，我们才认为这种品性不必欣赏、不应歌颂。实 际上，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能时时感到这种上上下下的“做 戏”之风，仍然只要“想一想”便到处可见那种“庄严的滑稽”，仍 然随时可见到那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的行为。前些年 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 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这说的是政治生活中的“做戏”， 也是政治生活中的“滑稽”。这种把“做戏”与“做事”相混淆，把 “戏场”与“天地”相混淆的“国民性”，也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 明白其危害。

即便不从“做戏”的角度来认识“荸荠庵”中和尚的行状，我 也仍然无法接受《受戒》中对这些和尚行状的欣赏。例如，我任何时候也无法对一个在大殿上杀猪的和尚心存好感，这首先引 起我生理上的厌恶。

所以，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

2003年1月15日

55当知识遇上信念

《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

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成了当代文学的名篇。至少在 说到当代散文佳作时，人们不能遗漏《我与地坛》。但据王安忆 在复旦大学的讲台上透露，这篇作品当初是险些被作为小说发 表的：“我想我们今天就着重地说一下《我与地坛》，这是一篇非 常好的散文，我们看一看这位创作者的感情的面目，他感情的图 画是什么样的？《我与地坛》这篇东西怎么给它归类，也是经过 一番争论的。它当时在《上海文学》发表时，《上海文学》的编辑 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可是 史铁生自己不愿意，他说这一定是散文，而且他说为什么要把散 文看低呢？这就是散文，因此它后来还是作为散文发表了。我 也同意他的话，我觉得是一篇好散文。” ®因为《我与地坛》当初

56当知识遇上信念

①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362 页。

是作为散文发表的，所以现在成了当代散文名作。研究当代散 文的人不能忽略它的存在，而研究当代小说的人则不便将其纳 入视野。然而，要是当初史铁生不坚持“这一定是散文”而任其 以小说的名义问世，那情形就反过来了：研究小说者会用种种 或新或旧的小说理论对其大加谈论，而研究散文者则认为它不 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样说来，一篇作品被当作“散文”还是 被当作“小说”，有时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对于研究者来说， 这似乎是一种“捉弄”。

《上海文学》的编者最初打算把《我与地坛》作为小说发表， 也总有他们的理由。史铁生此前已是小说名家，因而编者把出 自史铁生之手的叙事性作品都习惯性地看作小说，这是一层原 因。但除此之外，《我与地坛》本身也确乎提供了一份让编者“误 认”其为小说的理由。一般说来，“散文”的手法比较单一，所表 达的思想、情感也比较单纯、清晰;小说则总会有比较多样的“叙 事手段”，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比较复杂、暧昧。而《我与地坛》 比起一般的“散文”来，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显然要斑驳、丰富得 多。王安忆明知《我与地坛》是“散文”而并非“小说"，却仍在专 门讲解小说的课堂上以《我与地坛》为“范文”，对其中的“心灵世 界”详做分析，也可证明这部作品确实具有“小说”的某些质素。

57当知识遇上信念

史铁生之所以坚持让《我与地坛》以“散文”的名义问世，我 想，是因为他当初本就是把它作为“散文”来写的。作品中的 “我”就是史铁生自己，作品中所思所感、所见所闻，不但都实有 其事而并没有丝毫“虚构”，而且可谓是在撕心裂肺、披肝沥胆， 因此史铁生不能接受“小说”这种称谓，他或许还多多少少以“小 说”这种称谓为亵渎和侮辱。没有着意的“虚构”，表达的是自己 十分真实和隐秘、轻易不肯示人的情思——在这个意义上，的确 可以说《我与地坛》是标准的“散文”。但写《我与地坛》时的史铁生，毕竟是已写惯了小说的人，他会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把一 些小说的常用手法用在“散文”的写作上。《我与地坛》虽然“散 文”的特色十分鲜明，但它的剪裁结构、布局谋篇，却显然是经过 精心权衡算计的，而这种权衡算计体现出的确实是一个“小说 家”的匠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地坛》这篇出自“小说家”之手 的“散文”，确实与出自“散文家”之手的“散文”有所不同，它带着 明显的“小说”的痕迹。这里且以《我与地坛》中人称的变化 为例。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抒胸臆，是“散文”的常见方式。小说， 尤其是现代小说，往往在人称上玩出一些花样，即以变换人称的 方式来丰富作品给读者的感受。这种小说家惯用的方式，也被 史铁生有效地用在了《我与地坛》的写作中。《我与地坛》总体上 是以第一人称完成叙述的，作品中的“我”就是史铁生本人。然 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叙述过程中，史铁生并不总是以“我” 的名义出现，有时史铁生成了“你”，有时则成了“他”，还有时竟 成了“您”。例如第二部分有这样的叙述：

58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那段日子里一—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曰 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 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 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 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 个……

在这番话里，史铁生先是以“我”的名义出现，但忽然又变成了 “她的儿子”和“他”。这里的“她的儿子”和“他”既是“我”又不是 “我”：是“我”，是因为“我”、“她的儿子”、“他”，这三者都是史铁 生的代称；不是“我”，是因为“我”是现在的、正在写作《我与地

坛》这篇“散文”的史铁生，而“她的儿子”和“他”则是当年那个以 自己的任性令母亲加倍伤心的史铁生。史铁生以人称变换的方 式把现在的“我”与当年的“我”区分开来，让现在的“我”回想、品 评和责备着当年的“我”。当然，人称不变换，“她的儿子”和“他” 一直以“我”的名义出现，语句仍然是通顺的，但语意却显然不 同。不变换人称，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就拉不开距离。而 没有了这种距离，意味就顿觉寡淡。

在《我与地坛》的第六部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更是频频 变换：

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 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 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p习在 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 写成了。而且发表了。……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 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 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D这一来你中 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 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 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 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 有点像个人却又过了头……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 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 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作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 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 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

59当知识遇上信念

你又想到了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

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 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 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 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 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 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 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 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 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 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 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 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 不怕死。有时候，-一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 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 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 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 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 如说，价值感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 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 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 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 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 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 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 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 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 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

60当知识遇上信念

份轻松？ 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 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 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 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 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 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

在这长长的一段话里，“我”与“你”不停地更换着，甚至常常没有 一点过渡，上一句还是“我”，下一句就成了“你”。这种人称的变 换不停，当然不是一种游戏。这不仅仅避免了语感的单调，更使 得自我质疑、自我审视的意味大大加强。史铁生写这番话，甚至 写这整篇文章，都可以说是为了叙述在“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 上自己与自己的争辩。在史铁生心中本就一直有着两个“史铁 生”，一个“史铁生”主张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并且为活着寻找理 由；一个“史铁生”主张不如死去，并且不断地质疑不死的借口。 这两个“史铁生”时时在对话、在辩论、在吵架。如果这两个“史 铁生”都以“我”出现，文意也仍然通畅。但当史铁生不停地变换 着作品中“史铁生”的人称时，他内心的那种矛盾冲突就表现得 更鲜明、更充分、更具有立体感，他的那种心路历程就更为感人。 紧接着上面那段话，史铁生又写道：

61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下好了，您不再恐慌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 了。算了吧你，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 名字是：欲望。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 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 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生？

在这里，不但有“我”与“你”的交替，甚至连“您”也出现了。当一 个“史铁生”对另一个“史铁生”以“您”相称时，我们听出了一种嘲讽的意味。这本来是史铁生在自嘲。但当自嘲以这样一种口 吻表达时，我们便更强烈地感觉到了史铁生的困惑和无奈，更强 烈地感觉到了他的欲罢不能和苦苦挣扎……

虽然史铁生不同意把《我与地坛》看成小说，但作为“散文” 的《我与地坛》之所以特别感人，特别成功，却与作者史铁生本是 一个“小说家”有着某种关系：不知不觉地把一些“小说手法”用 于《我与地坛》的写作，是《我与地坛》特别感人、特别成功的一种 原因。

当然不能认为，因为《我与地坛》用了一些在小说中更常见 的手法，便不再是“散文”而应称作“小说”。实际上，“散文”与 “小说”有无本质性的区分以及怎样界定这种区分，都是有争议 的，而且恐怕永远不会有一个“定论”。

62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3年3月

对昆德拉的接受与拒绝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昆德拉被韩少功、景凯旋等人译介到 中国后，掀起了一股“昆德拉热”。一时间，大有“开谈不说昆德 拉，读尽诗书也枉然”之势。不少此前从未对外国文学发表过看 法的人，也写起了研究昆德拉的“论文”。中国的读书人，似乎谁 都能被昆德拉以某种方式所触动，谁都能从某个角度对昆德拉 来一通评说。尽管谈论、研究昆德拉者甚多，但基本观点则颇一 致，即都是在热烈地肯定、赞美。前些年，青年言论家余杰发表 《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一文，提出 了“要昆德拉，还是要哈维尔”的问题，才算是有了一点不和谐 音。余杰把昆德拉和哈维尔作为知识分子可能的两种现实姿态 的代表，并明确主张应该拒绝毘德拉而效法哈维尔。余杰的文 章，引起了不只一人的质疑、驳斥。

63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当年议论和评说昆德拉的热潮中，我也曾是凑热闹者，并 且也表达的是肯定和赞颂性的意见。后来，余杰文章发表，我对他的基本观点是赞同的，但并未公开说出我的看法。现在，上海 译文出版社推出一套昆德拉作品的新译本。我重读了《不可承受 的生命之轻》(原译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玩笑》等几种，并 且借新译本出版的机会，把我现在对昆德拉的看法说一说。

首先我想说，昆德拉对于我是迷人的。他观察社会和人生 时的睿智与深刻，常令我再三玩味、赞叹不已；他关于小说艺术 的见解，也时常让我深受启发。如果要用一个现存的词语来概 括昆德拉，我觉得“益人神智”四个字是颇合适的。昆德拉的迷 人之处，细说起来当有很多。但最值得称道、对中国作家也最富 有教益的，是以小说的方式对极权体制下人的生存境遇作出了 独特而深刻的揭示。

64当知识遇上信念

昆德拉早已臝得了世界性声誉。使昆德拉臝得世界性声誉 的原因，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承认，无疑首先是“政治”。以艺术 的方式对极权政治的批判、控诉，是他引起世人注目的首要因 素。但同是对他的“政治”感兴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所产生 的感觉和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如果说，一个美国读者对毘德拉 作品中的“政治”再有兴趣也不过是一个旁观者的兴趣，他的感 觉和理解总难免有些隔膜，那么作为中国的读者，尤其是年岁稍 长者，读昆德拉小说，则常有身临其境之感，常发生不知“此地何 地”的恍惚。昆德拉小说的故事，有时只需将人名地名等稍作变 动,就完全可以视作在中国曾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例如，昆 德拉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小说成名作《玩 笑》，说的是一向喜欢开玩笑的在校大学生路德维克，因一句政 治玩笑而命运逆转，从此陷入苦难深渊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这 样的“悲剧”，在中国曾经发生得太多太多。而不能随便开玩笑， 尤其不能开政治性玩笑——这也曾是我们十分“习惯”的一种生 存境遇。当然不只是一部《玩笑》，昆德拉所有以捷克为背景的小说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让我们产生“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或者 说，都能在或多或少的方面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外国人在说我们 自己的事。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昆德拉的小说仅仅是让我们感到“亲 切”和熟悉，那其价值不是十分有限么？近几十年来，我们不是 也有许多小说写了与《玩笑》类似的故事，展示了与路德维克同 样的“悲剧”么？我说不然。昆德拉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在极 权政治下人性的共同表现，这对于拓宽我们的眼界、矫正我们在 政治和人性认识方面的某种谬误，有着明显的意义。捷克人，在 生理结构上与我们相差甚大，在文化传统和所谓“文化心理”上， 与我们也大相径庭，但在同样的政治条件下，他们与我们的表现 却惊人地相似。我们看着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简直就像看着 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父袓、我们的同事。而这对于被我们中不少 人所有意无意地信奉的“国民性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是一种 有力的冲击。“文革”结束后，当我们反思历史灾难时，“国民性” 是众口诘难的“罪魁”，似乎“文革”一类历史灾难的发生，以及在 所谓“极左”政治下人的软弱、妥协、卑劣，都源于我们“国民性” 和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昆德拉让我们看到，在文化传统和“国 民性”与我们迥然有异的地方，类似灾难也曾发生，人性的表现 也与我们大同小异。这使我们认识到，仅用“国民性”和文化传 统解释不了“文革”一类灾难何以在中国发生，也解释不了在这 一灾难中人们的种种表现。放弃了“国民性决定论”和“文化决 定论”之后，我们就能明白：只要有一定的条件，极权政治在任 何一个地方都能建立起来;而只要处于极权政治下，人性都会有 差不多的表现。这样的认识能使我们把目光从“国民性”和文化 传统上稍稍移开，更多地关注“制度”的改造和建设。

65当知识遇上信念

然而，对于这样的“解读”，昆德拉本人一定大为不满。在

“昆德拉现象”中，有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即人们总是执著地盯着 昆德拉小说世界中的“政治”，而昆德拉则千方百计地要把人们 的目光从他小说中的“政治”上引开。他要求人们在“美学”而不 是在“政治”上理解和接受他的小说。他认为小说家是“存在的 勘探者”，小说的使命是“发现”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处 境。他强调，“政治”在他的小说中不过是一件外衣，一块酵母， 甚至仅仅是一种点缀，他要揭示的是人类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 可能陷入其中的生存境遇。昆德拉对“政治”的说法暂且不论， 先想指出，他的小说的过人之处，确实在于着眼“政治”又能超越 “政治”。我们知道，同类“题材”的小说，近几十年在中国有许 多，但它们都难以望毘德拉项背。昆德拉小说之所以比中国同 类“题材”的小说高明，原因有二：一是昆德拉反思历史时的那 种“存在论”的眼光;二是昆德拉评价历史时的那种“个人主义” 的价值观念。昆德拉无意于写纯粹的“政治小说”或“问题小 说”，他总是从“政治”切入，而最终使小说的意味和意义大大地 撑破了“政治”，具有浓郁的形而上意旨。例如《玩笑》，虽然故事 表层是一个政治性悲剧，但读过全书，我们却感到这悲剧已丧失 了苦难性，或者说，我们感到毘德拉不是在写苦难，而是在写苦 难的“苦难性”丧失，在写悲剧的“悲剧性”失落，在展示苦难怎样 成为笑剧。这就让我们感到人的存在的某种荒诞性，这样一种 荒诞性确实并非只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才可能存在。昆德拉在 反思政治灾难时，那种坚定的个人主义立场，也是令他的小说迷 人的重要因素。毘德拉的个人主义往往体现为对个人自由和尊 严的强烈关注。在小说中，他往往是通过一些很微观、很具体的 角度传达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例如，“隐私”是他思考个人 自由和尊严时常用的一个立足点。他不厌其烦地让我们看到， 在极权政治下，一方面是“政治”的极为神秘、暧昧和不透明，另

66当知识遇上信念

一方面则是个人生活的极为透明，是个人“隐私”的彻底丧失，是 他人随时可以把鼻子伸进你的卧室里，是连内裤都那样整齐划 一。而在一个个人“私生活”被彻底消灭、个人“隐私”被彻底照 亮的社会，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当然无从谈起。与昆德拉相比，中 国的作家在反思政治灾难时，便大为逊色。他们能写出苦难的 “苦难性”，却写不出苦难的“苦难性”丧失;他们能透过政治层面 进入对文化的反思，却不能写出人类生存的某种荒诞意味;他们 能站在主流立场上总结“教训”，却不能以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名 义对“极左政治”进行控诉。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实在可以从昆 德拉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但我对昆德拉也有着很大的保留。昆德拉要求人们在“美 学”而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理解和接受他的小说，这是有相当 道理的。但他反复强调“政治”在他的小说里不过是一种背景， 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却是我无法认可的。毫无疑问，昆德拉小 说的内涵是远非“政治”所能概括的。他的确突破了特定政治制 度的拘囿而进入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形而上“勘探”。但这一对 “政治”的超越，在我看来，非但不构成对“政治”的抹杀，倒是使 得我们对极权政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昆德拉 正因为没有被揭露和控诉极权政治的功利目的所左右，所以能 对极权政治作出分外独特也分外有力的揭露和控诉。昆德拉把 我们的兴趣从“政治”引开的理由，是他所“发现”和“勘探”到的 那些人的生存“处境”，并不只在极权政治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才 会有，它们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而我以为，他所 “发现”和“勘探”到的那些人的生存境遇，虽然在任何政治条件 下都可能某种程度地存在，但在极权政治条件下，却必然存在、 普遍存在和最典型地存在。人的这些生存境遇虽然不一定以极 权政治为绝对必要的条件，但与极权政治也决非绝对无关。

67当知识遇上信念

正如有人指出过的那样，昆德拉其实陷入了一种极端怀疑 主义。他痛恨极权政治，却又怀疑民主政治;他深感在极权政治 下人的生存的荒诞，但又怀疑在民主政治下人的生存境遇会有 本质的改观;他揭示出在极权政治下人的软弱、妥协的可悲，但 又把反抗视为“媚俗”。在这种极端怀疑主义的驱使下，他有意 无意地忽视和抹平了一些重大差别。在《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中，我们看到，托马斯的儿子希望他在一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请 愿书上签名时，托马斯竟然想到了秘密警察要求他在一份告密 书上签名，并认为这两者本质上是同一回事。托马斯的儿子和 那个秃头编辑为反抗极权政治而从事的秘密活动，与秘密警察 为维护极权政治而从事的秘密活动，在托马斯眼里已没有什么 不同。也是在这部小说中，终生与“媚俗”为敌因而也终生反叛 和流浪着的萨宾娜，最后虽然在美国定居，但她并不感到在美国 的生活与在捷克的生活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她看来，美国参 议员向草坪上的孩子招手微笑，与捷克官员站在检阅台上向游 行队伍招手微笑，可以等量齐观。不能说毘德拉如此看问题丝 毫没有道理，但我坚信也有着极大的谬误。置身于西方世界的 昆德拉之所以如此睁眼说瞎话，我怀疑恰恰是出于“媚俗”的需 要。重读《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我对其中“伟大的进军”这一 部分已难以忍受。同时深感到，昆德拉书中，既有着许多深刻的 见解，也有着不少精致的谬论。而这些谬论，在中国，是足以把 一些人引向犬儒主义的。

对昆德拉，全盘接受和全盘拒绝，我以为都是不合理的。我 们固然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但也不能因为怜惜孩 子而大喝其洗澡水。

68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3年8月2日酷热中于南京

比喻砌成的《围城》

钱锺书对比喻的研究与运用

我不是“钱迷”，对“钱学”的发展状况也不了解。钱锺书的 著述，不求甚解地读过一点。当然也有一些肯定是粗浅的想法， 其中之一，就是钱锺书对比喻这种修辞手法情有独钟。在《谈艺 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中，钱锺书一再对比喻发表看法，并且 颇有些道人所未道之处。在自己的写作中，钱锺书也特别热衷 于运用比喻。在表达学术观点时是如此，在从事散文、小说这种 文学创作时，就更是如此。夸张一点说，钱锺书是三句话不离比 喻。一般人在写作时，会偶尔借助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感觉、思 考。但像钱锺书这样喜欢用比喻者，却很少见。至少在中国现 代以来的学者作家中，难以找到在比喻的运用上堪与钱锺书媲 美者。一般人笔下的比喻，是在写作中自然而然想到的，或者是 在不用一个比喻就无法传达自己的某种感觉和思考时，才去寻 求一个喻体。这样，在一般人笔下，比喻也就不会出现得太多。

69当知识遇上信念

而钱锺书不同。读钱锺书著述，可以明确感觉到他是在刻意运 用比喻，甚至让人觉得他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次可以运用比喻的 机会。当然，也让人感觉到钱锺书十分善于运用比喻。这种情 形，在长篇小说《围城》中表现得最充分。读《围城》，你能感到作 者时时刻刻在想着怎样为笔下的事情找到一个（或几个）喻体。 某种意义上，《围城》是钱锺书的一场比喻大表演，或者说，是钱 锺书在大过比喻瘾。如果把《围城》比作一座“围城”，那它几乎 是用比喻之砖砲成的。

陈子谦先生厚厚的《钱学论》（修订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共分上、中、下、末四编，其中下编即是“钱学比喻 论”，在结构上占了全书四分之一，对“钱学”中的“比喻学”可谓 论说甚详。田建民先生的论文《钱锺书比喻的特点》①对钱锺书 的比喻运用也作了系统的研究。我没能读到的对钱锺书比喻运 用的系统研究或许还有。而我在这里，只能联系钱锺书对比喻 的研究，对《围城》中的比喻运用谈一点零碎的看法。

70当知识遇上信念

品味《围城》中的比喻，我有时会想到钱锺书对比喻的某种 学理性论述，并觉得他是在创作中自觉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例 如，在《管锥编》中，钱锺书曾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描述心理，唯 有出以拟喻。”弗洛伊德认为，描写心理活动，尤其是要真切可感 地描写那种隐秘、微妙、暖昧的心理状态，只有运用比喻的手法。 弗洛伊德的这种说法是否偏颇，姑且不论。钱锺书看来是认同 这种看法的，不但在对比喻进行学术性研究时引弗洛伊德的话 为佐证，而且在自己从事文学创作时，也刻意借助了比喻。《围 城》中，写到了方鸿渐的失恋。钱锺书几番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①田建民：《钱锺书比喻的特点》，《钱锺书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年版。把方鸿渐失恋后的心理写得意味无穷。写到方鸿渐刚与唐晓芙 闹崩时，《围城》有这样的叙述:“方鸿渐把信还给唐小姐时，痴纯 并无感觉。过些时，他才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地心痛， 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刺痛。昨 天囫囵呑地忍受的整块痛苦，当时没工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 刍似的，零星断续，细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卧室窗外的树木和 草地，天天碰见的人，都跟往常一样，丝毫没变，对自己伤心丢脸 这种大事全不理会似的。奇怪的是，他同时又觉得天地惨淡，至 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 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 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这段叙述，忽而明喻， 忽而暗喻，总之是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表现方鸿渐失恋初始期 的心理状态。这些比喻当然是用得很精彩的，尤其说方鸿渐自 觉“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可谓极其准确妥帖。初失恋 的人，会觉得身外的世界一切如旧一切似乎又都变了。他觉得 自己的世界已经天崩地裂，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生活恢复原 样……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要写得好不容易。钱锺书把这种状 态中的方鸿渐比作在阳世游荡的孤鬼，也算别出心裁。

失恋初始期过去后，内心会趋于平静，但痛苦并未消失，而 是潜入了内心深处，一被触动，仍然痛如锥心。如果也用一个比 喻的话，不妨把失恋的痛苦比作一条蛇。一开始它在心的表层 剧烈地扭动、凶猛地撕咬;时间或长或短，它终于累了，于是便钻 入心的深处潜伏着，不惊动它，它或许能与你相安无事，但一被 惊动，它又会愤怒地扭动一番、撕咬一番。当方鸿渐与赵辛楣、 孙柔嘉们结伴赴三闾大学时，他心中的那条蛇已有些累了，开始 歇息。在船上，当赵辛楣说到在苏文纨的婚礼上见到唐晓芙，并 说没有提到方鸿渐时，钱锺书写道：

71当知识遇上信念

“那最好！不要提起我，不要提起我。”鸿渐嘴里机 械地说着，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 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 里。譬如黑夜里两船相迎檫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 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 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 的渺茫。鸿渐这时候只暗恨辛楣糊涂。

失恋者，尤其是失恋未久者，其实是非常渴望知道对方的情形 的。刚刚离开上海的方鸿渐，当然也非常想知道唐晓芙现在怎 样看待自己，是否还想着自己。当赵辛楣说不久前见过唐晓芙 时，方鸿渐大为兴奋;而当赵辛楣说并未提起自己时，方鸿渐又 大为失望。钱锺书连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方鸿渐始而兴奋继而失 望的心理。方鸿渐虽然未能得到想等到的信息，但心中那条本 在歇息的蛇却被惊动了。钱锺书这样写方鸿渐此刻的心理状 态鸿渐这时候，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 赶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话，仿佛抛掷些障碍物，能暂时拦阻这痛 的追赶，所以讲了一大堆出洋船上的光景。”方鸿渐想把被惊醒 的痛苦摆脱掉，所以拼命说闲话。钱锺书说方鸿渐的心像和心 里的痛在赛跑，这已属奇思妙想;接着又把方鸿渐的说闲话比作 抛掷拦阻痛苦的障碍物，就更让人拍案叫绝了。钱锺书借助种 种比喻来描绘方鸿渐失恋的心理，真可谓曲尽其妙。

72当知识遇上信念

对文艺作品中“通感”现象的揭示，算得上钱锺书的一大功 绩。所谓“通感”的文学表现，其实也是比喻手法的运用。在《通 感》这篇论文中，钱锺书说到了“通感”的一种表现:“听声类形。” 《乐记》中有“上如抗，下如坠”之说。用“抗”和“坠”来形容声音 的高低抑扬，便把声音视觉化了。钱锺书指出，对“抗、坠”的最

好描写，是《老残游记》中写王小玉说鼓书的那一段，并做了这样 的引用：“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根钢丝似 的，抛入天际。……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曲 折。……仿佛由傲来峰西面，攀登太山的景象……及至翻傲来 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慠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

更在扇子厓上，愈翻愈险。 唱到极局的二四叠后，陡然一

落……如一条飞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 愈唱愈低，愈低愈细。……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 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 火光，纵横散乱……”《老残游记》中这番对声音的描写，看来令 钱锺书十分欣赏，以至于影响到他自己的创作。在《围城》中，钱 锺书曾这样写方鸿渐的鼾声:“那声音哗啦哗啦，又像风涛澎湃， 又像狼呑虎咽，中间还夹着一丝又尖又细的声音，忽高忽低，袅 袅不绝。有时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得、细得像放足的风 筝线要断了，不知怎么像过一个峰尖，又降落安稳下来。赵辛楣 刺激得神经给它吊上去，掉下来……”这段话与《老残游记》中那 一段对声音之“抗、坠”的描写，应该说是很像的。

73当知识遇上信念

语法修辞类的教科书，在说到比喻的作用时，总首先强调化 抽象为具体这一点。陈子谦先生在《钱学论》中，也强调了比喻 “以具体表示抽象、化虚为实”的功能，“为什么用了比喻就有了 诗意？因为比喻具有形象化具体化的特征，有特定的形象，就有 特定的情境、意境、画面或境界，虚的变成了实的，死的变成了活 的。思想、情感、心态，往往不可捉摸，是抽象的，只有用语言文 字将它具像化：物化、情境化或画面具体化，才可见可触，可赏 可鉴”®。陈子谦先生自然要举例说明钱锺书是怎样以比喻的

方式化抽象为具体、化虚无为实有的。在《围城》中，钱锺书的大 量比喻确乎都遵循着修辞学所确立的原则，即化抽象为具体、化 虚无为实有。但偶尔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外，即以比喻的方 式化具体为抽象、化实有为虚无，并且也同样富有“诗意”。例 如，唐晓芙初次出场时，钱锺书写道:“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 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 当，“女人的大眼睛”是具体的，是实有的，政治家的“大话”则是 抽象的、是不可捉摸的，当钱锺书把“大眼睛”比作“大话”时，分 明是在化具体为抽象、化实有为虚无了。然而，要说明某类眼睛 的大而无神、“大而无当”，却又难以找到比这个比喻更好的方式 了。例如，《围城》中这样写到沈太太：“沈太太……嘴唇涂的浓 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 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牙齿上的“红痕”是具体可见的，侦 探小说中的“线索”则是抽象缥缈的，可钱锺书却用抽象缥缈的 小说“线索”来比喻牙上的“红痕”。例如，《围城》这样写“哲学 家”褚慎明：“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 谢林的‘绝对观念’。”我们记得，钱锺书曾把“大眼睛”比作政治 家的“大话”，这回，则把“大眼珠”比作谢林的“绝对观念”。比起 政治家的“大话”来，谢林的“绝对观念”是更为抽象虚无、更加难 以把握了。但这个比喻用于小说中的褚慎明这个人物，却既让 人忍俊不禁，又觉得讽刺得高明。例如，《围城》这样写方鸿渐们 去三闾大学途中遇到的那个妓女：“那女人……满嘴鲜红的牙根 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把抽象的“胸襟”作喻体，来说明 “牙根肉”的“块垒不平”，恐怕也只有钱锺书这样的人才想得 出。……举了这几个例子，是想指出，钱锺书在比喻的运用上， 确有过人之处。而修辞学关于比喻功能的界说，也不是绝对不 可违背的。（田建民先生在《钱锺书比喻的特点》一文中，指出钱

74当知识遇上信念

锺书有“用抽象的观念作喻体”的“特点”，我以为如此概括稍欠 准确。“政治家的大话”、“谋杀案的线索”、“侠客的胸襟”等都未 必是“抽象的观念”。）

《围城》中的许多比喻，表现了一种钱锺书式的“书卷气”。 《围城》中也有许多比喻，表现了一种钱锺书式的“刻薄”。有时 候，“书卷气”和“刻薄”是交融着的，便让人感到那种“书卷化的 刻薄”。“书卷气”当然没什么不好，“刻薄”也常常恰到好处。但 偶尔也让我觉得“刻薄”得有些“过”。例如，这样写沈先生：“沈 先生下唇肥厚倒垂，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像嘴里在泻肚子 下痢的人。”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些。这样的比喻，有些令人作 呕。当然也就不可能让人细细品味了。我以为，即便是写那种 十恶不赦之人，都不宜如此“刻薄”地写他们的生理特征。不知 研究“钱学”的专家们以为然否？

75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3年9月6日凌晨

“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

读昆德拉小说《无知》

去年，许钧先生从法文原文重译了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 命之轻》，使我们更真切准确地把握了作者的这部名作。现在， 昆德拉的小说新作《无知》又由许钧先生译出。小说不长，译成 汉语才九万多字，无须费心劳神才能理清头绪的纷乱线索，许钧 先生的译笔又那样流畅，我以一夜之功也就读完了。

76当知识遇上信念

小说写的是流亡者的故事，也可以说,写的是昆德拉自身那 一类人的故事。熟悉毘德拉的人都知道，毘德拉此前的小说，也 多写流亡者，例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和萨宾 娜，就曾有过流亡生涯。然而，《无知》中的流亡者却又与昆德拉 此前小说中的流亡者有了极大的不同——这是1989年以后的 捷克流亡者。而1989年，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政治变化，迫使昆德拉，或者迫使托马斯、萨宾娜这类人 流亡异国的斯大林主义土崩瓦解。应该说，在他们流亡的理由消失的同时，他们作为“流亡者”的身份也就消失了。所以，严格 地说，昆德拉这部新作写的不再是捷克流亡者的故事，而是捷克 “前流亡者”的处境和心态。

书中的伊莱娜和约瑟夫，都是在苏军1968年入侵捷克并于 翌年牢固建立占领政权后流亡异域的。伊莱娜流寓巴黎，约瑟 夫流寓丹麦。如果说，政治流亡的身份本来就不无尴尬，那么， 失去了政治流亡身份的流寓者，身份就不仅仅是尴尬，而是无从 确立了。当他们的故国还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时，他们的身 份是明确的，而且，斯大林主义对他们故国的统治越严酷，他们 的流亡身份便越明确，同时,他们在流寓国的人们眼里也就越具 有价值。当他们的流亡者身份明确时，流寓国的人们热情地接 纳他们，友善地对待他们。然而，当他们的故国发生政治巨变， 当他们逃离的地方与他们逃往的地方在政治经济上已然一体化 时，那些热情地接纳过他们、友善地对待过他们的人，就认为他 们应该欢天喜地地“大回归”;如果他们对“回归”并不表现出“应 有”的热情而打算“赖”着不走，流寓国的人便不再对他们表现出 热情和友善，而是报以疑惑和不解。这使伊莱娜、约瑟夫们悲哀 地意识到，流寓国人当初的那种热情、那份友善，并非是针对他 们个人的，而是针对他们身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当他们不再是 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时，当然也就不配再享受热情与友善。—— 失去了“流亡”身份的他们，成了过期的食品、卸装的演员、废弃 的电池。

77当知识遇上信念

本来，作为流亡者，当迫使他们流亡的因素在他们的袓国已 不存在时，他们是应该欢快地回归。然而，昆德拉笔下的流亡者 往往有些“另类”。他们无法忍受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而逃离袓 国，但对流寓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却又并不全面认同。《不能 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托马斯、萨宾娜是这样，《无知》中的伊莱娜、约瑟夫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换言之，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 捷克是他们无法生活的，而巨变后的捷克、与他们二十年流寓的 国家已在政治经济上打成一片的捷克，也并非他们所真心喜欢 的。伊莱娜、约瑟夫确实都回来了，然而，他们却找不到叶落归 根的感觉，这生于斯长于斯的袓国，也是精神上的异乡。流寓国 固然不是精神的家园，袓国却也并非灵魂的归宿地。既如此，从 流寓国回来定居，就毫无必要了。他们的流亡身份虽然结束了， 但他们的精神却仍在流浪着。

昆德拉笔下的这些流亡者和“前流亡者”，使我想到汤因比 在《历史研究》中描述过的“联络官”阶级:“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 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 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 而‘不属于’两个社会。”在一种类比的意义上，毘德拉塑造的托 马斯、萨宾娜、约瑟夫这些人物，也是“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 的人。

78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4年7月17日凌晨

钱锺书两篇论文中的三个小问题

读钱锺书，没法不惊叹他的渊博。谈论任何一个问题，钱鍾 书都能沿波讨源、旁征博引。对中外各种资料，他往往手挥目送、 驱遣自如。在资料的运用上，钱锺书常让人生出高山仰止之感。

79当知识遇上信念

不过，钱锺书对资料的运用，也未必每一次都十分准确、妥 帖。日本有一句谚语:“猴子也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中国则 有成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高明的人，也偶有犯错误的时 候;再神乎其技者，也难免失手。钱锺书应该也不例外。

钱锺书的《七缀集》，1985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收七篇论文。第一篇是《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二篇是《读 〈拉奥孔〉》。这两篇论文，谈论的都是诗歌与绘画的关系，或者 说，都是在论说诗歌与绘画的差异，都是在以某种方式反驳“诗 画本一律”这种美学观念，都是在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 样的命题提出质疑。但在这两篇论文中，有三处地方，我觉得在 资料运用上都有点问题，或者说，都有点不够准确、妥帖。

一、达•芬奇也许放错了地方

“诗画本一律”是苏东坡著名的美学观点。这观点在中国美 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是无形画、画乃有形诗，几乎成为 一种“常识”。而钱锺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则意在指出：在 中国美学史上，尽管人们时时强调“诗画本一律”，但在具体地评 价诗歌和绘画时，还是持有不同的标准的。论诗时是一套标准， 论画时又是一套标准。所以，诗与画其实并不“一律' 诗画本 相通，不仅在中国美学史上为许多人所认可，在西方美学史上也 是一种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这篇《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开始论 述中国古代评说诗画的标准之前，罗列了中西有关诗画一致性 的观点。文章第二部分，在列举了中国美学史上的这类观点后, 又列举西方美学史上的这类观点：

80当知识遇上信念

“无声诗”即“有形诗”和“有声画”即“无形画”的对 比，和西洋传统的诗画对比，用意差不多。古希腊诗人 (Simonides of Ceos)早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

嫁名于西塞罗的一部修词学里，论“互换句法” (commutatio)的第四例就是：“正如诗是说话的画，画应 该是静默的诗”（Item Poema Ioquens Pictura, Pictura taciturn Poema debet esse)。达文齐干跪说画是“嘴巴哑 的诗”（una poesia muta)，而诗是“眼睛睹的画”（una pittura cieca)。莱辛在他反对“诗画一律”的名著里，引了 “那个希腊伏尔太的使人眼花療乳的对照’’(die blendende Anti these des griechischen Voltaire),也正是那句希腊古 诗，顺手又把他所敌视的伏尔太扫上一笔。

在列举西方美学史上认为诗是“有声画”而画是“无声诗”的 观点时，钱锺书提到了达文齐。达文齐，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大画家达•芬奇。从钱锺书这番话的“语境”看，达•芬奇也 是认可诗歌与绘画的一致性和相通性的，他把画比作“嘴巴哑的 诗”，而把诗比作“眼睛瞎的画”。不过，这两个比喻总让人觉得 有些别扭，总让人感到有些“不怀好意”。如果说，把画比作“嘴 巴哑的诗”还谈不上是对画的贬低，那把诗比作“眼睛瞎的画”， 就绝不能说是对诗的恭维了。试想，一个眼睛瞎的人，能画出什 么样的画来呢？看来，有必要弄清楚达•芬奇是在怎样的“语 境”中使用这两个比喻的。

钱锺书对达•芬奇的话做了注释，说明这句话出自达\_芬 奇的《画论》。达•芬奇留下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在最近两百 年间陆续被后人发现。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说达•芬奇 “在笔记里详细记录了他在多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充分体现了当 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当 时许多‘巨人’的伟大成就是与这种新的理想和精神分不开 的” ®。而钱锺书在注释中所说的《画论》，则是后人从达•芬奇 留下的笔记中，将论画的部分抽取出来，单独成书的。1961年8 月号、9月号的《世界文学》，刊载了朱光潜翻译的达•芬奇笔记 的一部分，钱锺书所引用的那句话恰好在内。下面把包含这句 话的一段抄下来：

81当知识遇上信念

眼睛叫做心灵的窗子，它是知解力用来最完满最 大量地欣赏自然的无限的作品的主要工具；耳朵处在 其次，它就眼睛所见到的东西来听一遍，它的重要性也

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50页。

就在此。你们历史家，诗人或是数学家如果没有用眼 睛去看过事物，你们就很难描写它们。诗人啊，如果你 用笔去描绘一个故事，画家用笔把它画出来，就会更令 人满意而且也不那么难懂。你如果把绘画叫做“哑巴 诗”，画家也可以把诗人的艺术叫做“瞎子画”。究竟哪 个更倒霉，是瞎子还是聋子呢？虽然在选材上诗人也 有和画家的一样广阔的范围，诗人的作品却比不上绘 画那样使人满意，因为诗企图用文字来再现形状，动作 和景致，画家却直接用这些事物的准确的形象来再造 它们。试想一想，究竟哪一个对人是更基本的，他的名 字还是他的形象呢？名字随国家而变迁，形象是除死 亡之后不会变迁的。

达•芬奇这番话完全是在赞美“眼睛”，也即在赞美画家和 绘画，而贬低诗人和诗歌。“哑巴诗”和“瞎子画”这两个比喻，有 着明显的相互攻讦的意味。达•芬奇是在回击将绘画称作“哑 巴诗”时，才将诗歌称作“瞎子画”的。从达•芬奇对“眼睛”的推 崇来看，将诗人称作“瞎子”，是很刻毒的骂语。紧接着这番话， 达•芬奇又写道：

82当知识遇上信念

如果诗人通过耳朵来服务于知解力，画家就是通 过眼睛来服务于知解力，而眼睛是更高贵的感官。

推崇绘画而鄙视诗歌，认为诗歌不配与绘画相提并论的意 思，表达得很清楚。莱辛的《拉奥孔》，也是在强调诗歌与绘画的 差异性，并且也有明显的鄙视诗歌而赞颂绘画、雕塑的倾向。朱 光潜曾这样评说莱辛:“……但是‘艺术美模仿自然美’这个信条 逼得莱辛走到更奇怪的结论。美仅限于物体，而诗根本不能描写 物体，则诗中就不能有美。莱辛只看出造形艺术中有美，他讨论

诗，始终没有把诗和美联在一起讲，只推求诗如何可以驾驭物体 美。他的结论是：诗无法可以直接地表现物体美，因为物体美是 平面上形象的谐和配合，而诗因为用语言媒介，却须把这种平面 配合拆开，化成直线式配合，从头到尾地叙述下去，不免把原有的 美的形象弄得颠倒错乱。莱辛的鄙视诗歌而赞颂绘画，认为诗 与画不能相提并论，也正有着达•芬奇的影响。伍蠡甫主编的 《西方文论选》，收录了朱光潜翻译的达•芬奇笔记中的片断，编 者并做了这样的说明：“芬奇着重视觉，钻研事物外部形状，有扬 画抑诗的倾向，并预示了十八世纪关于文艺部门中界限和效果 的研究(如德国莱辛）。”®可以说，在诗歌与绘画的关系上，莱辛 与达•芬奇是一脉相承的，即都反对诗画同源说、诗画一致说。

在西方美学史上，关于诗与画的关系，向来有两种观点。一 种主张诗与画的同源性和一致性；一种则主张诗与画的异源性 和差异性。而主张诗与画的异源性和差异性者，又往往是扬画 抑诗的。在西方，本有着扬画抑诗的传统。达•芬奇正是这一 类人的代表，甚至也是这种观点的源头性人物。既如此，钱锺书 在列举西方美学史上主张诗画同源和一致的观点时，把达•芬 奇放进去，也许就是放错了地方。

83当知识遇上信念

二、沈括是否被曲解了

钱锺书的《读〈拉奥孔〉》虽是一篇书评，但其实是钱锺书借 莱辛之酒杯，浇自家心中之块垒。在这篇文章中，钱锺书细致地 论说了诗歌与绘画的差异性，实际上则是在强调绘画不及诗歌，

1. 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984年版，第150 —151页。
2.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页。

不配与诗歌并称。在文章第二部分，钱锺书写道:

茱辛不仅把“事”、“情”和“物”、“形”分别开来，他 还进一步把两者各和认识的两个基本范畴^——^时间与 空间——结合。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塑只能表现最 小限度的时间，所画出、塑造出的不能超过一刹那内的 物态的景象（nie mehr alseinen einzigen Augenblick)，绘 画更是这一刹那景物的一面观（nur aus einen einzigen Gesichtspunkte)。我联想起唐代的传说：“客有以按乐 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 引工按曲，乃信。”（《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引《国史补》， 卷二一四引《卢氏杂说》记“别画者”看“壁画音声’’一则 大同小异）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批驳了这个无 稽之谈：“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从 那简单一句话里，我们看出他已悟到时间（引按：此处 “时间”似为“空间”之误）艺术只限于一刹那内的景象 了。“止能画一声”五个字也帮助我们了解一首唐诗。 徐凝《观钓台图》：“一水寂寥青霭台，两崖崔啐白云残；

84当知识遇上信念

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 诗意是：画

家挖空心思，终画不出“三声”连续的猿啼，因为他“止 能画一声”。徐凝很可以写：“欲作悲声出树难”或“欲 作鸣声出树难”，那不过说图画只能绘形而不能“绘声”。 他写“三声”，寓意精微，“三”和“一”、“两”呼应，就是莱 辛所谓绘画只表达空间里的平列（neberxeinander)，不表 达时间上的后继（nacheinander)。所以，“画人”画“ 一水” 加“两崖”的排列易，他画“一”而“两”、“两”而“三”的“三 声”继续难。《拉奥孔》里的分析使我们回过头来，对徐

凝这首绝句和沈括那条笔记刮目相看。一向徐凝只以 《庐山瀑布》诗传名，不知道将来中国美学史家是否会带 上他一笔。

钱锺书在这里引用徐凝和沈括,意在说明绘画不能“再现” 诗歌的意思、意趣、意味、意韵。诗歌可以写一声接一声的“猿 啼”，而绘画充其量只能画出其中之一声。在钱锺书看来，这也 是诗画不“一律”的表现之一种。实际上，画家能否画出连续性 的“猿啼”，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达•芬奇能画出蒙娜丽莎那 谜一般的笑容，就不能说别的画家绝不可能画出一声以上的“猿 啼”。不过，这个问题姑且不论。这里想说的是：钱锺书对沈括 那条笔记，似乎有点断章取义。

85当知识遇上信念

从钱锺书对沈括的引用看，沈括之所以认为那则关于王维 的传说是“好奇者为之”，是因为“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因为 “止能画一声”，所以王维不可能从那幅《按乐图》上认出是“《霓 裳》第三叠第一拍”。“止能画一声”成为沈括否定那则传说的理 由。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沈括肯定失之于武断。要弄明白沈括 本意，还得看看《梦溪笔谈》中那则笔记的全文：

《国史（谱）[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 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桉）

[按]曲乃信。”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 不过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无此声？岂独《霓裳》

第三叠第一拍也？或疑舞节及他举动拍法中别有奇声 可验。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叠，前六叠无拍，至 第七叠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乐天诗 云：“中序擘驢初入拍”，“中序”即第七拍也。第三叠安 得有拍？但言“第三叠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说尝

有人观《画弹琴图》曰：“此弹《广陵散》也此或可信，

《广陵散》中有数声他曲皆无，如“泼欐声”之类是也。①

沈括之所以认为那则关于王维的传说是“好奇者为之”，最 有说服力的理由，还是《霓裳曲》第三叠本来没有“拍”。既根本 无“拍”，那说王维一眼认出那幅《按乐图》乃“《霓裳》第三叠第一 拍”，当然便很“妄”。至于钱锺书特别看重的“凡画奏乐，止能画 一声”，则并不能成为否定那则传说的坚实理由。如果画家高 明,把奏乐者某一瞬间动作神情的特征精细准确地描绘出来，而 观画者又恰好是深通音律和画理者，那就完全有可能认出这所 画的“一声”，是何曲之何声。实际上，沈括也举了一个正面的例 子。他认为，有人观《画弹琴图》而认出所弹为《广陵散》，这“或 可信”。同样是“止能画一声”，既然此种场合“或可信”，就不能 说别的场合绝不可信。

86当知识遇上信念

元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也说到了那则王维观《按乐 图》的故事：

维，字摩诘，太原人。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 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 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 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客有以《按乐图》示维者，

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对曲果然。

从这叙述中，我们知道，王维还是一位“闲音律”的音乐家。 既是大画家，又是“闲音律”的音乐家，如果《霓裳曲》第三叠有 “拍”，那就完全可能被王维从画中认出。所以，“止能画一声”， 与那则关于王维的传说是否“无稽之谈”，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①沈括：《梦溪笔谈》，侯真平校点，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20页。

钱锺书在《读〈拉奥孔〉》中，是要证明绘画不如诗歌，因此他 对沈括的那句“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分外感兴趣，但这也导 致他在两个层面都有所失误。一是他把“止能画一声”视作王维 不可能从《按乐图》中认出为《霓裳曲》第三叠第一拍的理由，并 且把这种看法强加于沈括;二是他把证明关于王维的那则传说 为“妄”，视作证明诗优于画的一种方式。

但关于王维的那则传说是否为“无稽之谈”，与诗画孰优孰 劣的问题毫无关系。钱锺书只需从沈括那条笔记中借取“凡画 奏乐,止能画一声”这一句就够了，实在不必拉扯上王维，并对沈 括断章取义。

87当知识遇上信念

三、董其昌想说什么

为了论证画不如诗，钱锺书在《读〈拉奥孔〉》中，找了许多中 国古代的“证据”。在文章第三部分，钱锺书写道：

诗中有画而又非画所能表达，中国古人常讲。…… 值得注意的是，画家自己也感到这种困难。嵇康《兄秀 才公穆入军赠诗》之一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画家 顾恺之说:“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世说新 语•巧艺》第二十一）董其昌说:“4水作罗浮磬，山鸣于 阒钟’，此太白诗，何必右丞诗中画也？画十欲收钟、磐 不可得！”(《容台集•别集》卷四，二句出僧灵一《静林 精舍》诗；参看邓椿《画继》卷六《王可训》论宋复古《八 景》中《烟寺晚钟》:“钟声固不可得”）……

这里所引董其昌那番话，以“画中欲收钟、磬不可得!”结束， 且最后用了惊叹号。我想，一般的读者读了钱锺书所引的董其昌这几句话，都会以为这是一段完整的话，都会以为董其昌在为 画中不能收钟、磬之声而遗憾。——其实并非如此。

伍蠡甫的《名画家论》中，收有《董其昌论》《再论董其昌》两 篇研究董其昌的论文^在《再论董其昌》中，伍蠡甫说：

以前所写《董其昌论》，关于他的论画尚多遗漏，这 里作些补充。

虚、静：董氏《画旨》有这么一段：“元晖（小米）未 尝以洞庭、北固之山为胜，而以其云物为胜，所谓天闲 万马皆吾师也。但不知云物何以独于两地可以入画。

88当知识遇上信念

或以江上诸名山，所凭空阔，四天无遮，得穷其朝暮之 变态耳。此非静者何由深解。故论书者曰，一须人品 高，，岂非品高则闲静无他好萦故耶？ ”江天辽阔，云物 舒展，重山叠嶂、景色拍塞，前者虚后者实，但对画家艺 术想象的活动范围来说，前者比后者要宽广得多。然 而这只是想象的外在因素，我们还须看到那内在因素， 即画家心领神会而频增审美与想象的深度，例如凭主 观之“静”以把握客观之“虚”，最后收入画图。米友仁 就曾做到这一步，欣赏米画的要看懂这一点，董其昌名 之曰“静者”的“深解”。而且不论是画得出或看得懂，

都决定于“无他好萦”的静的观照。……艺术创作、欣 赏中的虚、静之理，老子早就讲过。《老子•四十一 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希声”故静，“无形”故虚，

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正是通过虚、静，以观照、体现宇 宙万物的自身规律，表达了“道”之全美境界。……后 来苏轼讲得愈加明白易懂：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E故纳万境。

米友仁能“静”，所以领会客观现象的种种运动，能 “虚”，所以把握云山之趣，作为“万境”之一，形象地落 诸缣素。……

此外。董其昌还谈到画中写声亦寓虚静之理。“‘水 作罗浮磬，山鸣于阗钟，，此太白诗,何必右丞诗中画也。 画中欲收钟磬不可得，但众山之响，在定境时有耳圆通。

正自苋解人不易。”画家修养，亦有释氏所谓的心定止于 一境，有此定境，便不难领会钟磬的回声都在静穆的众山 中，也就是画中寓动（声波）于静(众山）之理了。①

89当知识遇上信念

钱锺书所引用的，并非董其昌的一段完整的话，而是把“但” 字前面的话取出来，且在后面加上惊叹号，“但”以后的话则都舍 去。董其昌这段话并不难懂，我们一眼就能明白，董氏的主旨在 “但”字以后。他想说的是：画中虽欲收钟磬不可得，但又何必 收钟磬！画面上虽无法直接画出钟磬之声，但只要画家画出了 虚静之境，而观画者又有着虚静之心，自能从画面上听到“众山 之响”，自能从画面上听到“希声”的“大音”。伍蠡甫的研究使我 们明白，董其昌是在谈论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虚”、“静”问题 时，是在“谈到画中写声亦寓虚静之理”时，说了这番话的。董其 昌的本意是强调绘画可以寓“声”于“静”，可以不画钟磬而让观 者听到钟磬之声。而钱锺书则截取“但”字以前的几句话，让董 其昌表达与本意截然相反的意思，以此作为自己的论据。

2007年3月25曰

①伍蠡甫；《再论董其昌》，见《名画家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版，第132—134页。

“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董晓《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序

董晓与我，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事。他是俄苏文学的专 家，在外国文学教研室；而我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混饭。 今日大学的学术体制，使得不同“专业”之间，在“学术”上是“鸡 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对董晓所研究的俄苏文学，我是 满怀崇敬的，但也仅有崇敬的资格，若是偶尔在闲谈中也对之说 长道短，那一刻一定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然而，前不久，董晓忽 然来电话，说他有一本研究苏联文学的专著即将由上海三联书 店出版，命我写一篇序。这令我大为惶惑。让我为一本研究苏 联文学的专著写序，这不等于是强迫一只乌鸦去指挥百灵唱歌 吗？但董晓却说，就是要找一个门外汉来写序。既如此，那就恭 敬不如从命，写一点门外汉的读后感。

90当知识遇上信念

董晓的书，副标题是“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所谓苏联文 学，一般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起点，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结

点，总共七十来年。董晓在这部专著中，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论述 了七十年间，苏联文学中闪光的一面。如果说，苏联文学如同地 震后的废墟，那董晓在这部专著中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废墟中搜 集仍有价值的东西。董晓是满载而归的。董晓所搜集到的，固 然在价值上有高下之别，有的是无价之珍，有的是连城之璧，有 的则瑕瑜互见，但都是未可轻率否定的东西。对于我这个苏联 文学的门外汉来说，董晓的书，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对苏联文 学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心中长期存在的关 于苏联文学的某种疑问。

为了能够准确地表达董晓专著的读后感，我应该先说说读 前感，即此前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作为一个门外汉，我对苏联文 学的印象当然一直是很朦胧和模糊的，但是，是一种复杂的朦 胧，一种矛盾着的模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文学，我有着强 烈的鄙视和憎恶。苏联文学，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学，总 体上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一种被极端扭曲了的文学， 一种假到极致、空到极致的文学，一种沦为强权之奴仆的文学， 一种极其不义、极其反人道的文学。而苏联文学，对20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 总体上是负面和消极的。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 以苏联文学为榜样的，从文学体制到文学观念，都是跟在苏联后 面亦步亦趋的。在50年代，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乃 至关于文学的文件、会议报告和决议，都被译介到中国，成为中 国“文学工作者”的“圣经”。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是20世纪50 年代初进入大学中文系的。去年，潘老师不幸病逝。在他清楚 地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后，我坐在他的病床边，与他有 过多次对话。一次，他语调平缓地说：“我年轻时就对死不太在 意。今年已虚岁七十五了，早超过了年轻时的预期。”停了一会，

91当知识遇上信念

又说:“我这一生是很努力的，但比起那些真正的大学者，还差得 远。”我说:“您这一生，真正用于读书做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在 您三四十岁的盛年时，遇上了‘文革’，不但耽误了您的时间，更 摧毁了您的身体。而在您二三十岁的青年时期，又把大量的时 间花在了苏联进来的那些垃圾上。”他点点头，黯然无语。潘老 师离去后，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书架上仍有着长长的一排 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书籍。我知道，潘老师之 所以不肯把这些东西清除掉，并不是因为喜爱，而是因为这些 书，每一本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在那个年代，一个中文系的 学生，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青年教师，读这些书，是一种 “绝对命令”。每顿少吃几口饭来买这些书，是为了以后长期有 饭可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蓝英年先生以一系列文章，介绍了苏 联作家的荣辱毁誉、生死沉浮。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有《被现实 撞碎的生命之舟》《回眸莫斯科》等多种。这些文章，每一篇谈论 的只是一两个作家一两桩事情，但合起来，却生动鲜活地展现了 苏联时期文学政策的荒谬，文学环境的严酷以及作家们命运的 坎坷、凄惨。例如，在《访法捷耶夫故居》一文中，蓝英年先生告 诉我们，从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到1954年作协第二次代 表大会召开，二十年间，有两千多名作家遭到迫害。长期担任作 协总书记的法捷耶夫，1956年也满怀悲愤和绝望而自杀。在遗 书中，法捷耶夫写道:“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 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 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地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 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优 秀文学人才过早夭亡，余下的多少能创作具有真正价值作品的 人，活不到四五十岁。”“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我极

92当知识遇上信念

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 的世间。”法捷耶夫参与过对作家的迫害，而他也终于在精神上 陷入绝境，可见苏联时期的文学界是怎样一种可怕和可悲的状 況了。

然而，苏联时期的文学，却又不只让人感到可怕和可悲，不 只有假、大、空，不只有谎言和欺骗，不只有愚昧和凶残。苏联时 期也还有一系列闪光的作家或作品。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 四十一》曾深深地打动过我;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 格利特》也已是公认的巨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感动 过、感动着世界上无数的人，并且还将有更多的人被感动；高尔 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和随笔集《不合时宜的 思想》也放射着耀眼的光芒；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 的遭遇》有着醉人的艺术魅力；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 生》、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 格群岛》，也早已蜚声世界、交口称誉了。还有瓦西里耶夫的《这 里的黎明静悄悄》，还有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还有……尽管 苏联时期的文学界，有着那样多的虚假和丑恶，那样多的污浊和 暴戾，但同时也有了这样一些作品，就足以让我对苏联文学也怀 有崇敬了。

93当知识遇上信念

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有两个苏联时期的作家值得一提。一 个是西蒙诺夫，一个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西蒙诺夫也曾是斯大 林的红人，也曾在苏联作协中占据高位，一定也做过值得谴责的 事情。但他写于卫国战争时期的那首《等着我吧》，却让我始终 对他保有一份敬意。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所谓的“文学青 年”时，我读到了这首诗，并且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能够背诵。在 后来的岁月里，诗中的一些句子有时会不期然地浮上心头。在 幽静的湖边，我会想到这样的诗句：“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的忧伤 满怀/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挨/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 盼望/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等到那遥远的他乡/不再有 家书传来/等到一起等待的人/心灰意懒——都已倦怠。”在喧 闹的街头，我会想到这样的诗句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他们口口声声地说——/算了吧，等下去 也是枉然!/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我已不在人间/纵然朋 友们等得厌倦/在炉火旁围坐/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你 可要等下去啊！千万/不要同他们一起/忙着举起酒盏。”在飞 机上，在火车中，我会想到这样的诗句：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94当知识遇上信念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一- 只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我还记得这首诗的译者叫苏杭。译得是否忠实原文，我自然无 从判断。但就译诗本身来说，可谓是十分高明的。在许多年前， 令作为“文学青年”的我爱不释手的另一种苏联作品，是巴乌斯 托夫斯金的《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虽然初衷只是想写一本“创作谈”，但所“谈”的，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写作技巧”范围。书 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安徒生的那篇《夜行驿车》。在从威尼 斯到维罗纳的夜行驿车上，安徒生以他的善良、幽默和睿智，臝 得了同车几位女性的喜爱。家住维罗纳的一位夫人还深深地爱 上了安徒生，同样，爱情也在安徒生的心中滋生。但安徒生为了 能继续写出美丽的童话，又一次决定扼杀心中的爱情。在离开 维罗纳前，安徒生去了一趟这位夫人的家，是应邀去拜访，也是 去辞别。夫人为不能留住安徒生、为自己的爱情得不到回应而 流泪。这时，巴乌斯托夫斯基写道：

他扑到她身旁，跪了下来，把脸紧贴在她那双温 暖、有力而娇嫩的脚上，她没睁开眼睛，伸出双手，紧紧 地抱住他的头，俯下身去，吻了他的嘴唇。

95当知识遇上信念

第二颗热泪落到了他的脸上。他闻到泪水的咸味。

“去吧！ ”她悄声地说，“愿诗神饶恕你的一切”。

他站起身，拿起帽子，匆匆地走了出去。

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最后的那句“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看似平平常常，但却 让我感受到无穷的意味。以至于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为这篇 文章取名时，竟自然地想到了这句话。

苏联时期虽然政治对文学有着全方位的侵害，虽然作家们 的写作环境那样恶劣，虽然产生了那样多的垃圾，但也毕竟出现 了为数不少的优秀、杰出之作，这原因何在呢？而被认为深受苏 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却连一部堪与《第四十一》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媲美的作品都没有呢？——这是长久存在 于我心中的疑问。而董晓的专著，某种意义上对这种疑问作出 了解答。

董晓认为，在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乌托邦精 神和反乌托邦精神两种力量的对抗。为政治牢牢控制的文学、成 为强权之奴仆的文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学体现的是一 种“国家乌托邦精神”。这种“国家乌托邦精神”虽然往往甚嚣尘 上、不可一世，但即便在其最猖獗的时候，也未能将每一个苏联作 家的每一寸精神空间都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董晓以细致的梳 理和分析告诉我们：在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历程中，始终有一部 分作家，程度不同地、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创作，或直接或间接地 表达着对“国家乌托邦精神”的怀疑、批判与对抗。在“前言”中， 董晓指出：“在苏联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乌托邦精神的表现形式 都有所不同，而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对抗亦体现 出不同的方式。但是,无论乌托邦精神的表现方式在各个历史时 期怎样不同，其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以非理性的幻想来取代 对现实的理性观照，取代对生活的苦难的审视，在对国家乌托邦 精神的依附中丧失了个体对人的苦难与不幸的人道主义关怀。 因此，无论作家个人主观动机如何，从客观上讲，这种乌托邦精 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作为人学，作为对 现实的形而上的、审美化的否定这一本性。而反乌托邦精神正 是体现了文学对其自身本性的追求。”正是因为在七十来年的文 学发展历程中，一直有着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反乌托邦精神在 与乌托邦精神共生着、对抗着，才使得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不 仅仅只有乌托邦精神的垃圾，也有反乌托邦精神的鲜花在开放、 在芬芳;才使得我们仍然不能不对苏联文学怀有一份崇敬。

被认为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相形之下就黯 然失色了。在表现乌托邦精神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或许毫不逊 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表现反乌托邦精神方面，中国当 代文学就望尘莫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常喜欢把中国当

%当知识遇上信念

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相比较，其实二者是既可比又不可比的。在 乌托邦精神横行无忌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毫无疑问可与苏联文 学比较;而在反乌托邦精神始终顽强地存在，并出现许多优秀、 杰出作品方面，中国当代文学难以与苏联文学比较。把中国当 代文学，尤其是所谓“十七年”间文学的凋敝、灾难归咎于苏联文 学的影响，固然很有道理，却必须同时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 苏联在乌托邦精神高歌猛进时，仍产生了那些优秀、杰出之作， 而同样的事情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且不说阿赫玛托娃和她的 《安魂曲》，也不说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大师与玛格利特》,更不必 说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仅就所谓“军事文学”来 说，我们有些什么呢？我们只有《保卫延安》《红日》《敌后武工 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黎明的河边》《老水牛 爷爷》《七根火柴》这样一些东西。中国当代那些所谓“军事文 学”与《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要 求中国当代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自己先就难为情了。但我 们是连勉强可与《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着我吧》相 比较的作品也没有的。原因何在？

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作家是否 可能创作出《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着我吧》这样的 作品，这是主观方面。“文革”前十七年间（“文革”期间就更不用 说了），中国文坛是否能容忍这样的作品，这是客观方面。姑且 假定在那时期，中国有作家写出了《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等着我吧》这样的作品，后果会是怎样呢？首先这样的作品 能否以铅字的面目公开问世，就是一个大问题。即便有那种既 有眼光又有肝胆的编辑让这种作品公开发表出版，也一定会在 问世后遭来杀气腾腾的批判，也一定会让作者惨遭迫害甚至家 破人亡。《第四十一》中，红军女战士虽然最终开枪打死了那名

97当知识遇上信念

白军士兵，但她毕竟曾经对那名白军士兵生出柔情蜜意，而这在 “十七年”期间的中国文坛，是绝对不可以的。作为“革命者”，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敌人有丝毫同情、怜悯，何况“爱情”? 谁要是胆敢写一点“革命者”对“敌人”的超阶级的情感，那就是 “资产阶级人性论”，那就是对“革命者”的污蔑，那就是自身“革 命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居然那样浓墨重 彩地渲染女战士的身体之美，又为这种美的毁灭而无限哀伤，又 视这种美的毁灭为绝大悲剧——这在“十七年”的中国语境中， 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十七年”期间的“军事文学”中，“女性革命 者”就意味着“无性革命者”，她们重重包裹着的身体都不能表 现，又岂能去表现她们“赤裸裸”的身体之“美”？“十七年”间的 “军事文学”，是拒绝悲剧的，以几个“小女子”身体的毁灭来渲染 战争的残酷、来表现一种人道情怀，那是近乎“疯狂”之举了。为 了“革命”、为了“袓国”、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最后 的胜利”，再大的牺牲都是不足道的，再多生命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几个女性身体的毁灭，哪还值得一提？西蒙诺夫的《等着我 吧》这样的诗歌，在“十七年”的语境中，也是无法合法地存在的。 一个“革命战士”之所以能一次次击败死神从战场上平安归来， 居然与党的领导、与领袖的教导、与领导的指挥、与人民的支持 等无关，而仅仅因为情人的“苦苦等待”，这不是十足的“笑话” 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样的“创作谈”，在中国“十七 年”的语境中，也是不可想象的，那里面有多少“资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的情感、观念，有多少“不健康”的东西啊！……这是 否意味着，苏联时期的文学界比中国当代文学界有更大的自由 度，是否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的处境比苏联作家的处境更严酷 呢？当然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这只是在提醒我们：尽管中 国当代文学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

98当知识遇上信念

学以苏联文学为榜样，但由于两国精神传统、文学资源、民族性 格以及现实的政治文化的差异，为斯大林、法捷耶夫们所容忍的 东西，未必能为当时的中国容忍。

董晓的专著分为四章，每一章论述苏联文学的一个时期。 这四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章《后专制主义时代：乌托邦 与反乌托邦精神的转换与变异》。董晓借用哈维尔的说法，把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二十年间，称为“后专制主义时 期”。所谓“后专制主义”(又称“后极权主义”），不是指专制主义 之“后”，而是指“专制主义”之“后期”。“后专制主义时代”，专制 主义的意识形态已充分显现出其空洞、虚伪和欺骗的面目，因而 已远远不能起到统摄人心的作用后专制主义时代”与“专制 主义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明显甚至巨大 的变化。在“后专制主义”时代，虽然官方仍然竭力维持传统的 意识形态，但全社会的乌托邦激情已呈虚脱状态，功利主义和实 用主义主宰着社会广大成员的日常言行，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急 遽下降，道德沦丧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了钱，人们什么伤天 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为富不仁”成为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 在“后专制主义时代”，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 感……“后专制主义时代”与“专制主义时代”相比，虽然似乎有 “不可同日而语”之感，但这种变化却又并非本质性的。“后专制 主义时代”是对“专制主义时代”的延续，两者之间并没有出现断 裂。尤其在政治体制方面，仍然是萧规曹随、一仍旧贯。董晓对 苏联的“后专制主义时期”有这样精彩的概括:“经历了 30至50 年代的恐怖岁月和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解冻’思潮的双 重洗礼之后，当代苏联人在6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专制时期里， 陷入了一种精神全面萎缩之境地。来自官方的神话再也无法使 他们信服，官方宣扬的崇高的神话已经在人们心中彻底破灭，而

99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这新的专制时期，即‘后专制时期’，人们自身又难有十多年前 勃发的探索精神。因此，来自官方的伪崇高的激昂高亢与人们 淡漠的苟且偷生相安同存于一个空间之中，共同枸成了当代苏 联社会特有的一种滑稽感和荒诞性，支撑着这种滑稽与荒诞性 的是人们共同的本质精神特征：虚伪与麻木。”董晓告诉我们， 在苏联的“后专制时期”，“艺术成就最显著的恰恰是所谓道德题 材作品”。我想，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所谓“后专制主义时 代”，道德问题成为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 诸问题的交汇点。

令我感兴趣的，还有苏联时期的“潜在写作”。有一些优秀 的作品，在写作之初，也是不能在苏联公开问世的，它们或者在 国外发表，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 病房》;或者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在苏联公开出现，如雷巴科 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格罗斯曼的《一切都在流动》。这 自然让我们想到中国当代的所谓“潜在写作”。苏联时期的“潜 在写作”与中国当代的“潜在写作”，在精神品格上，在艺术价值 上，自有不可比之处，我也不想做这种比较。我只想说出我的一 点感觉。我觉得，苏联时期的“潜在写作”，只是在尽情地揭示苦 难，却并不热衷于表现受难者对苦难的反抗，并不热衷于表现受 难者昂扬的斗志、不屈的意志。例如，《日瓦戈医生》就在这方面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部杰作刚有译本时我就读了，好像快 二十年了吧，书中所写的具体事情都忘记了，甚至男女主人公的 名字也记不住了，却记住了书中着力表现的“软弱”。帕斯捷尔 纳克让我们看到，在政治强权面前，在黑格尔式的“历史理性”面 前，在历史的血与火面前，在滚滚的时代车轮面前，个体是怎样 的渺小、无力和无助。而个体的这种渺小、无力和无助，则形成 对强权、对那种凶残的历史力量的最有力的控诉。如果说《日瓦

o当知识遇上信念

戈医生》也表现了某种力量的话，那就是“软弱”的力量，是毫无 力量者的力量，——正因为毫无力量，所以首先便有了道义的力 量。中国当代的“潜在写作”，则往往热衷于表现与苦难的抗争， 热衷于表现受难的个体在政治强权、“历史理性”和时代车轮面 前的强大，热衷于表现受难的个体对苦难的蔑视。例如，大受推 崇的黄翔的《野兽》、牛汉的《半棵树》等作品就是如此。这当然 只是我的一种浮泛的感觉。两国的所谓“潜在写作”的这种差异 如果能够成立，那么，这种差异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论述苏联时期的反乌托邦文学和文学中的反乌托邦精神 时，董晓多次言及“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毫无疑问，苏联时期文 学中的反乌托邦精神，正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或者说，强 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是使得苏联时期仍然出现了众多优秀、杰 出之作的重要原因。所谓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就是那种强烈的 人道主义精神，就是那种博大而深邃的爱，就是那种浓郁的苦难 意识。正是这种传统，使得苏联时期“国家乌托邦主义”的铁蹄 始终没有踏遍每一个作家的每一寸精神空间；正是这种传统，使 得阿赫玛托娃、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仍 为世界文学贡献了杰作。这种传统，也影响了法捷耶夫这样的 人，不然他就不会绝望地自杀。我甚至想说，强大的俄罗斯文学 的传统，对斯大林、日丹诺夫这样的人也未尝没有丝毫影响。 《等着我吧》《第四十一》《金蔷薇》这样的作品能在苏联时期存 在，或许正因为强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保护”。而在中国当 代作家背后，却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传统。在中国当代作家背后， 没有站着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 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在毛泽东和周扬们背后，也没有。

o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7年6月9曰

革命与流堪

读书札记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有一本萨孟武的《水浒传 与中国社会》(2005年4月，下文所引此书内容，皆出此版本，不 一一注明）。萨孟武，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所长为政治学与社会 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最初出版于抗战之前。20世纪60年 代,作者在台湾做了较大的增删。北京出版社所印的，应该是增 删后的版本。

02当知识遇上信念

1J

萨孟武将宋江们所盘踞的梁山泊，视作一流氓社会;将梁山 泊“好汉”们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视作流氓革命。“梁山泊所 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最初投到 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 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漂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 三阮打渔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为闲汉。梁山泊的好汉大率 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江湖‘揩 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 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 身。”(第6—7页）

其实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中国历史上任 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在打家劫舍、杀 人越货中，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 氓精神，还真不行。中国有古语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仅有 “秀才”的革命，那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是,要革命，要造反， 完全没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在中国历史上，略有声色 的革命、造反，大抵是“秀才”与流氓共同完成的。不过，这革命 和造反中的“秀才”，却必须是流氓化了的“秀才”，或是甘愿与流 氓为伍、认同了流氓的价值观念的“秀才”。在“秀才”与流氓共 同进行的革命、造反的活动中，“秀才”与流氓的关系有两种。一 种是“秀才”发动、领导流氓革命、造反。梁山泊就属这种形式。 宋江本是刀笔吏，“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浔阳楼的“反诗”虽然 写得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会做诗的人。总之，宋江好歹也算个读 书人。梁山泊如果没有李逵、刘唐、白胜、三阮这些流氓，固然不 成;但如果没有宋江、吴用这样的读书人，也决不能那样轰轰烈 烈。“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历史上很多。所 谓“太平天国”的革命和造反，也是一例。洪秀全、冯云山，都是 多次考秀才而不售。虽然未售，但毕竟有考秀才的资格，毕竟多 次进入考秀才的考场，勉强也算得个准秀才。没有杨秀清一类 流氓，这场革命和造反，固然闹腾不起来;但如果没有洪秀全、冯

o当知识遇上信念

云山一类人的筹谋，没有他们弄出一种邪教作为意识形态，也不 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秀才”与流氓的另一种关系，是流氓借助、利用“秀才”而发 动和领导革命、造反。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或一群）大 流氓，发动和领导许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而在这过程中，却注 意借助和利用“秀才”：刘邦和朱元璋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过，“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也好，“秀才”被发 动和领导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借助和利用也好，作为“秀才”， 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场“转变立场”的革命，都要在“身份认同”上 完成一次造反。必须放弃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必须改变读书人 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而向革命和造反队伍中的流氓看齐。 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是需要“秀才”的知识、眼光，而 并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属于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 感。换句话说，革命和造反，只需要“秀才”的技能，而并不需要 那种“知识分子精神”。在革命和造反中，无论是作为发动和领 导者的“秀才”，还是作为被借助和被利用的“秀才”，都必须在保 留“秀才”技能的同时，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最大限度地 与李逵、刘唐、白胜、三阮们“打成一片”。

o当知识遇上信念

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中国历 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 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 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第1页）萨孟武 指出：

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

舌U 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

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

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 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 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

绅士们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 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第 5—6 页）

o当知识遇上信念

社会动乱的年代盛产流氓。在这样的年代，要进行革命和造反， 也不可能拒绝流氓，不可能不广泛地依赖流氓。1925年至1926 年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以这 样的话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 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名言之一。我们今 天读到的这篇文章，临近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 土地的 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 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 “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 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 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 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 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 力量。

这里说的，其实就是萨孟武所谓的流氓。萨孟武对中国流氓的看法是:“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 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 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 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第4页）而毛泽东在这里，虽然也指 出了他们“有破坏性”，但对他们的同情、肯定、欣赏却表现得很 分明。说这些大家熟知的江湖帮会，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 业的手工业工人组成，显然不合实情。在分析“谁是我们的敌 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毛泽东强调了“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 斗”，强调了他们“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也就是在强调：这 一批人应是“我们的朋友”而不应是“我们的敌人”。

伦敦大学的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是国际上研究毛泽 东的著名专家，有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的著作问世。其中，政治传 记《毛泽东》影响尤其大。施拉姆对毛泽东是很有好感的，对毛 泽东颇多积极的评价。他的《毛泽东》一书的中文译本，早由红 旗出版社出版。在谈到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时，施拉姆写道：

o当知识遇上信念

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 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 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 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 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 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 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 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一一都有生动的 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 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

“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 同情的。无疑，他在井岡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 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 意收容的……①

施拉姆的叙述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从《毛泽东选集》中读到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不是最初的版本。最初的版本中， 并没有“但有破坏性”这样的评价。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与其时在大城市的中共中央之间很 不和谐，这是中小学生学习中国现代史时都要学到的。其时的 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所作所为，是很不赞同的，是忧 心忡忡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四册，收录了 1928年6月4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 前委的信》，信中说:“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 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 份，减少流氓的成份。”

o当知'识遇上信念

美国学者R.特里尔，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世界级权威。他 的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毛泽东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3月出版了中译本。特里尔在肯定毛泽东时更有热情。中译本 “出版者的话”中说特里尔先生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和评 论家特有的深度对毛泽东的一生作了追述。他的观点基本上与 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相一致。”特里尔写到井冈山时期的

①〔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叩5年第2版，第116— 117 页。毛泽东时，有这样的表述：

毛采取了灵活机智的策略，他隐藏着的“猴精”又 开始出笼了。中共的合法“妻子”无产阶级远在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

毛结识了两个臭名昭著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六 百人和一百二十支步枪。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 到他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 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

毛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他无其他路可 选择。然而，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 都是人”，他谈及游民时曾说，“他们也有五官和四肢”。

o当知识遇上信念

游民也属无产者，毛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他们。①

按照特里尔的理解，只是因为远离城市，才不得不大量吸纳流 氓——这说法肯定是片面的。乡村有乡村的流氓，而城市也有 城市的流氓。要在城市从事革命和造反活动，就免不了也要吸 纳城市流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告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要“减 少流氓的成份”,但当他们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也难免要发 挥流氓的作用。——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顾顺章，上海吴淞人，本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 也是“青帮”的活跃分子。“五卅运动”时便是工人领袖。1927 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他都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恩来曾经是 他的副队长。中共六大后，顾顺章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 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特科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从上海

①〔美〕罗斯•持里尔：《毛泽东传》，刘路新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版，第110—111页。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在武汉送走张国焘后，被叛徒认 出并被捕，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他所知事情太多，他的叛变令 周恩来和整个中共中央极其狼狈，也给中共带来惨重损失。顾 顺章在中共党内，曾是传奇式人物，黑道白道都玩得转，神通之 广大超出常人想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这次由顾顺 章护送赴鄂豫皖时，对他仍有这样的描述顾顺章一直主持中 共中央的特务部，归周恩来指挥，是周的得力助手，这时，顾顺章 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的交通网。……我还是 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 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 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

其实，顾顺章是上海滩上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他的才华、 他的神通，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流氓所具有的才华和神通。在 当时的上海，顾顺章的才华和神通，对革命是非常有用的。正因 为如此，他在革命阵营内被极度重用。

o当知识遇上信念

早期共产党人，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 录》中，对顾顺章事件有这样的“反思顾顺章给我们讲秘密工 作，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 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 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 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 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 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 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 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们无数次的亏，顾顺章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 ®

早被清除出局的王凡西，是作为中共的局外人对“革命与流 氓”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他的“反思”，在毛泽东们看来，一 定也表现了一种托派立场和托派观点。在“正作用”与“反作用” 的问题上，作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与毛泽东们本就有着不同的 认识。按照托派的观点，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毛泽东在农 村进行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都是错误 的。所以，毛泽东决不能认同王凡西在“革命与流氓”问题上的 “反思”。

四

1当知识遇上信念

流氓应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的流氓自有“中国 特色”，因而，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流氓之间，也会表现出一种具 有“中国特色”的关系。

在中国生活过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 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专门谈论了中国的“乡村地痞”：

可以说，不充分了解乡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 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准确了解了中国地 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

如我们所知，地痞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并不是 说别的国家就完全没有或不常有独霸一方的人，而只 是说中国地痞运用权力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模 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即渴望和

①王凡西：《双小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觅。

平，不愿卷入争端。我们的祖先曾经野蛮而好战，他们 之中也有地痞，但其特点与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中产 生出来的地癌有着本质的区别。①

按明恩溥的理解，中国地痞的存在是以其他人的胆小怕事、 苟且偷安、能忍则忍为前提的。当然，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地 痞往往是最贫穷的人，他们无所失去，因而也就无所畏惧。而良 民百姓则往往上有几片瓦、下有几寸土，令他们深为牵挂。中国 有一句俗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把流氓地痞与良民百姓的 关系说得十分生动和深刻。

1当知识遇上信念

1948年，赵树理发表了小说《邪不压正》，一定程度上掲示 了乡村的流氓地痞在“土改”中的活跃，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意识 到乡村政权怎样被流氓地痞所掌握。小说发表后自然招来非 议。1950年1月15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 〈邪不压正 >》一文，为自己辩护。其中说：

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

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容易和贫农混淆。在土改初 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 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 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亳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 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 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 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 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

①〔美〕明思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年版，第 213 页。

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 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 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前面说，王凡西是托派，他对“革命与流氓”问题的“反思”不 会被毛泽东们认可。赵树理不是托派，但他对“土改与流氓”问 题的忧思，也没有被主流政治接受。从《邪不压正》开始，赵树理 就不断被批判，“文革”中更是在批斗中被打断肋骨、摔断髋骨， 最终惨死。——我不知道，仅仅思考过“土改与流氓”问题的赵 树理，在“文革”中是否又思考过“文革”与流氓的关系;我也不知 道，如果赵树理能在“文革”中熬过来，在“文革”后仍然能够思 考，他是否会思考整个这场革命与流氓的关系。

1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这方面，值得探究和思考的问题的确很多很多。明恩溥 说，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 中国社会。那当然也可以说，准确了解了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 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反过来说就是.•不了 解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国的革命。

记不起在哪本书上看到，江湖帮会中的一条“道德准则”是: “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帮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让我想 到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那句话:“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 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句“江湖话语”与我们整个社会数十年 间奉为圭臬的话语之间，显然有着亲缘关系。这样的情形应该 并非个别。

2007年7月21曰

我与几种书的相遇

对于一个所谓的“读书人”，一般意义上的“好书”当然是很 多的。但是，那种能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你的人格、改造你的心灵 的书，那种能使你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的 书，那种能使你的价值观念变得更为明确的书，却不会太多。由 于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文化修养和精神性情的差异，这种意义上 的书，又没有普适性。一个人读得如痴如醉、思想受到强烈冲击 的书，另一个人也许根本就读不下去。所以，这种意义上的书, 是可遇不可求的。读这种意义上的书，是生命中重大的“相遇”。

1当知识遇上信念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在很早的时候，就与鲁迅的书相遇。 20世纪80年代初，《鲁迅全集》出版，我立即买了一套。关于鲁 迅的意义，许多人说了许多话，我不想多说什么。有很长一段时 间，我的确认为鲁迅的话“句句是真理”。如今人到中年，我已能 冷静地面对那种合理的鲁迅批判。但我的“长进”还有限。那种 对鲁迅的低劣而恶毒的攻讦，仍令我极为反感。所以，我有时会

骂骂那些乱骂鲁迅者。鲁迅使我与许多人结仇，鲁迅使我与许 多人许多事格格不入，鲁迅使我无法突破为人为文的某种底线， 这当然也就使我失去了好些名利。但我至今没有后悔。以后是 否会后悔，我不知道。

克莱夫•贝尔的《艺术》一书，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 曾非常走红，“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观点影响了那时的好 多人。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书《文明》。这本 薄薄的《文明》似乎不大有人注意，但我对它的喜爱却远远超过 《艺术》。克莱夫•贝尔写作此书时的“问题意识”来自第一次世 114 界大战。战争双方都宣称是为“文明”而战，这促使反战的贝尔

1. 思考什么是“文明”。贝尔认为，“文明是达到美好的一种特殊手

p

1. 段”，它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东西，相反，“它和人类最近获

| 得的东西即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有联系。我们应当认识到它是

石 教育产生的结果，文明是人为的东西”。而“无论是产权观念、坦

诚、清洁、信仰上帝和来世以及永恒的正义，还是豪侠仗义、作风 正派，甚至爱国主义等等，一概不能算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社会 的特征”。因而也都不能算是“文明”。贝尔强调，文明的两大特 征是“价值观念”和“理性精神”。他所谓的“价值观念”是指对非 功利的价值的肯定，是指对“无用之用”的认可，是指对精神价值 的推崇。《文明》告诉世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参战者，都并 非是为“文明”而战。因为，“在文明人看来，再没有任何群体划 分比按照地理位置或人种假说划分更缺乏真实性，其共同点也 更少、更模糊了'贝尔指出，一个高度文明的人，必定是一个世 界主义者，而“民族主义是文明的凶恶的敌人”。“在民族主义形 成对文明的威胁的时候，世界主义往往就成了文明用以自卫的 武器。”

与贝尔的《文明》一样，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也把民族主

义比作残害文明的“瘟疫”，也热烈地歌颂了那种世界主义的情 怀和精神。如果说是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贝尔写了《文 明》，那么，是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茨威格的《昨日的世 界》。茨威格在接近中年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接近老 年时，欧洲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烈 时，茨威格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开始写这本《昨日的世界在当 时致友人信中，他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写完 这部书，茨威格就以自杀的方式离幵了这个令他绝望的世界。 茨威格认为，对个人尊严、自由和权利的肯定和尊重，是欧洲文 明的精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目睹了欧洲文明的精华怎样 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摧毁，这使他决定对这个世界永远闭上眼 睛。贝尔的《文明》和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使我更好地懂得 了什么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更使我懂得：一个真正的个人 主义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

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在不少问题上令我有茅塞顿开之 感，这真是一种益人神智的书。有许多书强调了改造社会的必 要，而哈耶克则强调了人改造社会的限度。哈耶克指出，文明的 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延续，都具有某种“自发 性”，都是“累积性发展”的结果，都有着内在的理路和生命。没 有任何人能洞察其中的全部奥秘，没有任何人能拥有社会所需 要的全部知识。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知识面前，任何人都是无 知的，最博学的人和最无知的人之间的差别都显得没有意义。 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个人、任何群体，都没有资格为文明的发展 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为社会的进步设计一个严密的蓝图。换 言之，任何个人、任何群体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从这里 又引出了自由为何必要：因为每个人都是“无知”的，所以没有 人有资格对他人进行“强制”，没有人有资格为他人设计生活目

1当知识遇上信念

标，所以自由是必要的，简言之，因为人类的“无知”，所以人类需 要自由。有许多人解释过自由为何必要。哈耶克的解释则既平 实又与众不同。

2006年6月

116

当

知

识

遇

上

信

念

I第三辑I

还要荒谬多久

学术规范与学术标准

前些年，有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 的书，出版后在读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同许多人一样，我也从 这本书中获益匪浅。读这本书，不少本不知其然的事，现在知其 然了，而许多原本仅知其然的事也知其所以然了。在我的心目 中，这无疑是一本好书，在当代学术著作中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者。后来，在一次颇有“轰动效应”的全国性学术评奖中，这本书 由读者推荐获得大奖，可见这本书给了为数众多的人以启示和 教益。然而，就在这本书好评如潮时，有一位经济学界的“大腕” 级人士对之发难，指责其不合“学术规范”。对经济学的“规范” 我自然无由置喙，但对这种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做出的责难，却 大有腹诽。我想，即便这本书不合这位“大腕”级人士心目中的 规范，就能说明它一钱不值么？比起那无数虽严守“学术规范” 却无声无息，出了印刷厂就只配进造纸厂的专著来，这本书难道 更没有价值么？

1当知识遇上信念

当然，并不是只有这位经济学界的“大腕”级人士在强调“学 术规范”。近些年来，类似的呼吁不时地从学术界响起。认为学 术研究应该遵守一定的规范，这本身并没有错。各行各业都有 自身的规范，学术研究也没有理由例外。但如果不知不觉间把 “学术规范”当作学术标准，以至于判断学术论著时，不是看它有 多少新意、多少创见，以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何种影响， 而是看它是否遵守了 “学术规范”，那就是买椟还珠、本末倒置 了。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所谓的“学术规范”与体育比赛的规 则相似。一个严守规则、从不犯规的运动员，未必就是一个好的 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最重要的，是进球，是得分，而不是规则 表演。同样，在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对真问题的发现和阐 释，是言之成理并产生良性影响的独特见解。正像偶有犯规的 运动员不妨同时也是大受体育迷们崇拜的明星一样，未必十分 合乎“规范”的学术著作，也可以同时是优秀甚至经典之作，这样 的例子，其实可以举出许多。而那种在“学术规范”上无可挑剔 但却毫无真意和新见，因而也不能进入时代的学术流程的著作， 如果说也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在于参与了时代的学术氛围的 营造，充当了培育鲜花的泥土，如此而已。因为“学术规范”并不 等于学术价值，也不产生学术价值。

之所以说所谓“学术规范”与体育比赛的规则只在有限的意 义上相似，是因为“学术规范”还有着模糊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这 样几种特征。即使是极力强调“学术规范”的人，也无法像解放 军官兵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背诵出他们心目中的“学 术规范”，而且，两个同样强调“学术规范”的人，他们理解的“规 范”很可能并不完全同样，这说明，所谓“学术规范”，其实是模模 糊糊地存在着的。至于“学术规范”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则更是 一目了然的事。用今天的“学术规范”去衡量中国的先秦诸子或

2当知识遇上信念

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则他们的著述、言论，或许根本就不能 算“学术”。同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也有着对 “学术规范”的不同理解。今天中国学术界那些极力强调“学术 规范”的人，他们心目中的“学术规范”，基本上是西方现代学术 的规范。但即使是这些人自己，也并没有严格按西方学术的规 范做学问。他们充其量只是对西方规范的有限度的移植。他们 那些自以为很合规范的著作，如若严格按照西方的“学术规范” 来衡量，恐怕也是不够规范的。

在强调“学术规范”时，人们常常要提到剽窃问题，把剽窃他 人成果当作违背“学术规范”的典型表现。但在我看来,剽窃问 题并不属于“学术规范”的范畴。“摩西十诫”里就有不准偷盗一 条。不偷不窃也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反对学术研究中的 剽窃行为，当然是十分合理的，也是极其必要的，但实在没有必 要在捍卫“学术规范”的旗号下反剽窃，因为剽窃行为所违反的， 并不是“学术规范”，而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学术规范” 有模糊性、时代性、民族性，而“不准偷盗”作为一种规则，则是十 分明确的，是超时代和超民族的。在强调“学术规范”时，人们又 常常要抨击“学术腐败”，把所谓的“学术腐败”也视作对“学术规 范”的违反。对于把“腐败”一词用于政治以外的领域，我是一直 不以为然的。但也确实有着与学术有关的腐败,这通常存在于 政治与学术的交叉地带。这实际上是政治腐败在学术界的延 伸，根子还在于政治上的腐败。所以，所谓“学术腐败”，不过是 政治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有人说，“学术腐败”是比政治 腐败更可怕的，因为学术是最后一块“净土”，这块“土”也“腐败” 了，那就彻底没希望了——这真是十足的昏话。再说，多少年 来，学术这块“土”，何曾“净”过？

2当知识遇上信念

我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对“学术规范”的强调。但我们应

该同时意识到，所谓“学术规范”，始终只是一种外部的制约，因 此，一本粗制滥造甚至文理不通、逻辑混乱的书，也可以是极其 符合“学术规范”的。在学术研究中，比失范更可怕的，永远是平 庸。倘若一个学者仅凭严守规范便可以傲视群伦，那这个时代 的学术，真是不可救药了。

2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1年9月24曰夜

何谓“素质教育”

前几天，在南京市内的一所中学校园内溜达了一圈，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墙上隔几米就嵌着一块的语录牌。牌子上的话，大 多出自古今中外的名人之口。这些名人，有的是著名科学家，也 有的是已故或当红的政要。语录牌上，不少还配有名人头像。 其中有两块挨在一起的牌子，令我不禁多生出些感慨。一块牌 子上的文字是:“不要问祖国能为我做什么，只要问我能为袓国 做什么”；另一块上则写着：“大力加强素质教育。”

23当知识遇上信念

“素质教育”如今已成了一个被使用得几近滥俗的概念了。 但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似乎少有人认真想过。从这些遍布 墙上的语录牌，便可看出，这所学校的领导，是并不懂得“素质教 育”的真义的。

按我的理解，“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现代公民意识 的养育。公民意识虽然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其核心无非是相 互依存的两种，一是权利意识，一是义务意识。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懂得什么是一个现代公民应享的权利，什么是他应尽的义 务，这是“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换句话说，“素质教育”的 一个基本目的，是把孩子们教育成合格的现代公民。不但要让 孩子们明白什么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还要让他们明白这些 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公民的权利问题，也就是国家应该 “为我做什么”的问题。当然，仅有权利意识是不够的，还同时要 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一个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也就 是“我”应为国家和社会“做什么”。还要让孩子们明白，权利和 义务是紧紧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上面说到的那两块挨在 一起的语录牌，是互相冲突的。尽管“袓国”和“国家”是两个有 着重大差别的概念，但当这所中学以“袓国”的名义这样教育学 生时，显然是把“袓国”与“国家”混为一谈了。要求学生“不要问 国家能为我做什么”，也就从小抑制和泯灭了孩子们的权利意 识。这样的教育，是从根本上反“素质教育”的，也是从根本上反 现代文明的。

这样的教育，其危害不仅在于从小就抑制和泯灭了孩子们 的权利意识，也实际上从小就抑制和泯灭了孩子们的义务意识。 不是具体明确地告诉孩子们去做那人人可做也人人应做的事， 而是用这种大而无当、空泛模糊、富有煽情意味的文学性语言来 教育孩子，也就使得他们长大成人后，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 民，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到底有哪些。这样的教育，非但没 有培养出大批甘愿为国家奉献一切的“圣人”，倒是造就了几代 连基本的社会公德都不能遵守的国民。腐败现象如此严重，某 种意义上不也是已有的“教育”的失败吗？中国争取加入WTO 过程中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最近在央视的“实话实说” 中，说起他在瑞士遇上的一件小事。一次，龙先生在瑞士的一处 公园如厕时，听见相邻的那一间里响个不停，龙先生好奇地推门

2当知识遇上信念

一看，原来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满头大汗地修理抽水马桶。 当他上完厕所冲水时，发现马桶坏了，于是便手忙脚乱地修理起 来。是什么促使这个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是一种现代公民意 识。这种现代公民意识在此时此地的表现，就是上完公厕要冲 水这样一种义务观念。这当然也是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并不 要求人们遇上坏了的抽水马桶都要想法修好，只要求自己上完 公厕要冲水。冲水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修马桶却不是。 但当这个孩子发现抽水马桶坏了令他无法尽冲水这种应尽的义 务时，他就自然地想先修好马桶。其结果,很可能是马桶也修好 了，水也冲了。而我们的教育，往往是要求人们遇上坏了的马桶 都要修好，其结果，是使得人们非但不去修那与己无关的马桶， 甚至上完公厕后连水也不冲。龙永图先生说，这个孩子遵守公 共规范的举动令他非常感动。他说，加入WTO以后，中国人必 须学会遵守公共规范，“如果从小就学会了坑蒙拐骗，那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永远建立不起来”。

用“不要问祖国能为我做什么，只要问我能为祖国做什么” 这类大而无当、空泛模糊、富有煽情意味的文学性语言实施的 “教育”，到头来是使得孩子们长大后，既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 利，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义务。更有甚者，是从小就学会了弄 虚作假、行贿受贿和坑蒙拐骗。如果要问什么才是“素质教育” 的对立面，这样的教育便是。

2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1年11月17曰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两个基本目的

最近几年，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成为议论颇多的一个话题。 这首先是因为此前数十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太成问题。我是这 个话题的关注者之一。我注意到，此前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文学 性”的缺失，是众多文章非议和批判的焦点。此前数十年间的中 小学语文，从教材编选到教师讲授，都不具有应有的“文学性”， 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甚至说，这种语文教育，不是在培育而是 在扼杀学生对文学的感受力；不是在让学生靠近文学而是在令 学生远离文学。我身受过这种语文教育，深知这种指责决非无 的放矢。别的且不说，就说那些年的语文课文吧，如今想来，真 是不堪回首。那些赖在课本上几十年甚至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 “名篇”，哪有什么“文学性”可言呢！所以，加强中小学语文教育 中的“文学性”，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26当知识遇上信念

不过，在强调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文学性”的同时，我们也要 意识到，“文学性”毕竟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全部目的。除了识字(扫盲)外，我以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 使得学生说话、作文符合语法规范,也就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让学生成为一个说话、作文讲逻辑的人；二是使得学生具 有初步的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也就是培养学生的文学感受力， 让本来具有文学潜能的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让本来没 有多少文学潜能的学生也不至于对文学毫无感觉。这两个基本 目的，也可以概括为“逻辑性”和“文学性”。这两者是不可偏废 的。某种意义上，“逻辑性”是比“文学性”更为基本的追求。要 让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对文学有良好的欣赏能力和强烈的兴 趣，其实不太可能，也不必把这一点作为必达的目标。然而，让 每一个领到了高中毕业证书的学生都具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 力，都能够说出基本符合逻辑的话、写出基本符合逻辑的文章， 却是中小学教育应该做到的。胡适在1920年曾写过《中学国文 的教授》一文，首先论述的就是“中学国文的目的是什么”，其中 引述了中华民国元年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国文 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 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而所谓“能自由发表思 想”，其实也就是能符合逻辑地思维。胡适认为这标准并不错， 并参照这一条，为中学国文的教授定了四条“理想标准”，其中首 要的一条便是“人人都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 演说，谈话——都能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胡适这一 首要目标，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人人都具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是一个人最必需的能力之一，其重要性或许 还在文学欣赏能力之上。而一般说来，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是与他所受教育程度成正比的。使学生具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 力，实在是基础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

然而，在近些年反思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过程中，我隐隐感到

2当知识遇上信念

有一种一味强调“文学性”而全然忽视“逻辑性”的倾向。几次看 到有人举这样一个例子：某次语文考试中，有一道试题是“雪化 了是什么”,有学生答“雪化了是春天”，老师判错，因为正确答案 是“雪化了是水”。人们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老师的判 卷是怎样的荒谬，这样的语文教育是怎样扼杀学生的文学天赋。 应该说，对这道题，老师认定的“正确答案”与这个学生的答案， 是对问题的两种方式的回答。老师是以逻辑的方式思考这个问 题，虽然这个答案“质木无文”,却是天衣无缝的：雪化了只能是 水，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学生是以文学的方式感受这个问题，虽 然这个回答“诗意盎然”，却是不合逻辑的，因为“雪化”与“春天” 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抓一把雪到温暖的屋里，弄一些雪到 炉上的锅里，雪后天晴、艳阳高照……这时候雪都会化，但只能 化成“水”，而不可能化成“春天”；另一方面，以文学的方式回答 这道题，答案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雪化了是春天，也可 以说雪化了是蝴蝶，是蜜蜂，是花朵，是青草，是蓝天白云，是大 雁归来，是柳头鹅黄……在具体的考试场合，我们可以对答“雪 化了是春天”的学生所表现出的文学天赋表示欣赏，并判其答案 为正确，但却不宜把“雪化了是春天”这种感受和思考问题的方 式作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基本方向甚至全部目的。如若这样， 也许培养出的学生能写出看起来还满像回事的“朦胧诗”，却写 不出一篇“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的说明文和议论 文。——而我也的确接触过这样的青年人。在这里，我还想对 近些年颇热门的“脑筋急转弯”这种“智力游戏”表示一点憎恶。 所谓“脑筋急转弯”，通常是以逻辑的方式提出问题，而要求一个 完全非逻辑的回答。这种游戏既践踏逻辑，也毫无诗意。许多 幼儿园的小朋友、刚进校门的小学生，都很热衷于“脑筋急转 弯”，他们的“脑筋”还没有接受逻辑的训练，就在接受这种非逻

2当知识遇上信念

辑的熏染，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体的逻辑思维能力，是这个国家和 民族总体素质的重要内容。过去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不仅仅是 缺乏“文学性”，同时也缺乏“逻辑性”;那些所谓的“名篇”，其实 是既没有足够的文学意味，也不讲起码的道理的，往往通篇充斥 着假话、空话、自相矛盾的话、毫不讲理的话。在对语文教育进 行反思和改革时，我们不要只盯着“文学性”而放过了“逻辑性”。

2002年11月19曰

129

当知识遇上信念

还要荒谬多久

有许多事，主其事者、与其事者以及旁观者，都早觉其荒谬， 但就是长期得不到改变。别的地方且不论，在我较为熟悉的大 学里，荒谬并且大家都觉其荒谬的事就很多，但改变起来似乎非 常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领导、教师和学生，都怀着一种荒谬 感在做着一些荒谬的事。例如，在研究生培养上，荒谬之事就并 不少。这里只说说其中的一件。

3当知识遇上信念

植树造林、绿化环境，无疑是大好事;政府号召公民多多栽 树，也自有必要。但如果国家以法令的方式要求每个公民每年 都在适合栽树的地方栽树若干株，完不成任务便取消公民资 格，那无疑是十分荒谬的。且不说是否每个公民都具有栽树 的能力，单是那可供栽树的地方，便大成问题。即便每人每年 只栽一株吧，那也只好栽到房顶上或栽到月球上去。而如果 国家同时又提倡多生多育并导致人口快速增长，这法令之荒 谬就更甚了。——幸好国家并没有发布这样的法令，不然地

皮比现在还要值钱许多倍。但类似的法令在研究生培养中却 普遍存在：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所 谓“学术论文”，否则不得毕业，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条荒谬 的“法令”。

提倡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鼓励他们在校期间即做出成果, 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硬性规定必须在特定的刊物 上发表论文，在目前则可谓荒谬之极。许多学校要求硕士生至 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博士生则至少发表三篇，方可 拿到学位证书。但每一专业的所谓“核心期刊”，都只有屈指可 数的几家，即便全部“核心期刊”的全部版面都用来发表在读研 究生的论文，哪怕这些“论文”每篇只有一千字，也远远不够。何 况，研究生招生规模近年在快速扩大。已有所谓“硕士点”和“博 士点”的学校，“导师”在逐年增加，当然被“导”的学生也在增加。 没有“点”的学校，则积极争取“设点”。“硕士点”已遍地开“花” 了，“博士点”也大有泛滥之势，而“核心期刊”则仍是那么寥寥几 家。现在的研究生愁的不是修不满学分、作不好学位论文，愁的 是不能完成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任务。这些所谓的“核 心期刊”真正成了研究生们的渡河之舟，“生”多“舟”少，以至于 有些本来打算考研究生的学生，望“舟”却步。

3当知识遇上信念

按过去的观念，研究生培养属“精英教育”，硕士生如此，博 士生当然更如此了。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即发表“像样”的“学 术论文”，仍是基于“精英教育”的理念，但实际上，研究生培养， 正在迅速地非精英化。硕士生本科化的现象已相当严重了，就 是博士生，也没有多少“精英”的色彩可言。目前的情况是，教育 主管部门和高校，在研究生培养的理念上很混乱。在“原始理 念”上，仍把研究生培养视作“精英教育”，并依据这理念制定一 些规则，要求研究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便是这样的规则之

一。而在一些“派生理念”上，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则已不把研究 生培养当作“精英教育”了，拼命扩大招生规模、让培养研究生的 “点”星罗棋布，则显然已违背“原始理念”了。这就像一个人，左 脚要向前走、右脚要向后退，于是便有了种种尴尬、种种荒谬。 说硕士生已趋于本科化，其实还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已出现 研究生总体质量低于本科生的状况。我敢负责任地说，那些国 内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总体水平不但高于二三流大学的硕士生， 也高于本校本系的硕士生;我甚至敢说，不但二三流大学的不少 博士生比不上一流大学中较优秀的本科生，就是一流大学招进 的博士生，有些人也比不上本校本系中的优秀本科生。这也并 不奇怪。一流大学的本科生都是以高分考入的，确实不同凡响。 而研究生，则真是鱼龙混杂、泥沙倶“上”了。

还是回到研究生的“核心期刊论文”上吧。一些“核心期刊” 已在向研究生大卖版面了。我知道西南有一家中国当代文学方 面的理论刊物，不知怎样混了一顶“核心期刊”的桂冠，数年来， 似乎把全部版面都用来赚研究生的钱。有的“核心期刊”还要维 持刊物的体面，不肯让研究生的“论文”在正刊上出现，于是便大 出增刊，以这种方式从研究生手里弄几个铜子。每当看到那些 贷款上学、大冬天也穿着单衣的研究生抠出数百元汇往“核心期 刊”，我都难免心酸。更让我心酸的是，学术的尊严一开始就在 研究生心中轰毁了。当他们看到被尊为“核心”的刊物原来只要 出钱便可将狗屁不通的东西变成“学术成果”时，当他们把自己 胡涂乱抹的东西连同一叠“百元大钞”一起寄往“核心期刊”时， “学术”在他们眼中还有多少价值可言？要求所有的研究生以后 都投身学术研究，不可能，也没必要。我以为，一个研究生，毕业 后完全可以从事与学术无关的工作，但他却应该终身对学术保 持一份敬意。而要求他们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则可能把他

3当知识遇上信念

们原本尚有的一丝对学术的敬意摧毁。——这或许是此种规则 的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

而这类荒谬的现象，还要荒谬多久呢？

2003年9月17日

3当知识遇上信念

高校收费与家长自杀

最近这些年，每当高考结束、分数线公布，总会传出家长自 杀的消息：孩子的考分上线了，家长却无钱供孩子上大学，于是 自杀了。

3当知识遇上信念

中国每年自杀者数十万人，都是默默地死去。但因无钱供 孩子上大学而自杀，却颇有“轰动效应”。媒体总是闻死而动，极 尽渲染之能事。在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表达满腔同情的同时，则 是对高校的“高收费”表达满腔的义愤。不久，则会有后续消息 出现：一些好心人为这个孩子捐足了学费，这个可怜的孩子虽 然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却能迈进大学的门槛了。——在这整个 过程中，大学被置于极为不义的境地。

高校的收费怎样才合理，应该是一个并不太简单的问题，它 牵涉到方方面面。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不敢瞎说。但我 敢肯定地说，如今的大学，问题成山，每当听到那种“创世界一流 大学”的豪语，我就想笑。我想，上帝也在笑。而在这成山的问

题中，收费即使成了“问题”，也绝不是那种足以令上帝发笑的 问题。

那么，那些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家长，就不值得同 情么？当然值得同情。但我想斗胆说一句，他们不仅仅应该被 同情，还多少应该受到谴责。人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比起 有些困境来，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无钱供孩 子上大学就一死了之,不能不说是过于不负责任的。至于这个 孩子，考上了大学却不能上，当然可惜。但家长和社会应该帮助 他们懂得，人生的路不只一条，人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既然有 能力考上大学，就也有能力做好别的事情。在别的人生之路上， 也有鲜花和欢笑，也有成功和幸福。说到底，在任何时代，都有 上不起大学的人。即使大学零收费，在校期间的吃、穿、住、用， 也是不小的开支，也一定有承受不起的家庭。

3当知识遇上信念

去年，我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特意了解了日本的大学收费 情况。日本大学的收费，按照两国的收入比例，并不比中国的大 学低。于是我问学生，是否也有那种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家庭。 学生的回答是：当然有，而且不少。我又问，他们不因为上不起 大学而心理失衡、痛不欲生吗？学生回答道：不，他们不会的 上不起大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并不成为怎样的问题。高中毕 业了，上不起大学就去谋一份工作，照样可以享受人生，照样可 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为什么日本人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上不起大学这一问题，而 中国人却不能？我想，重要的原因在于面对贫富差别的不同心 态。日本人能够比较平静地接受贫富差别，而中国人则不能。 而之所以如此，则又在于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不同。如果自己 的相对贫穷是因为不够勤奋、不够聪明，或者，因为没有及时地 抓住人生的机遇，而别人的相对富有则是因为更为勤奋、更为聪

明，或者，因为及时地抓住了人生的机遇，那一般说来，这种贫富 差别就是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这里虽有着贫富上的不平等， 但是，在这种不平等中，却有着公正。或者说，这是一种公正的 不平等。相反，如果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是不公正的，如果自己 与他人之间经济地位的悬殊体现的是一种不公正的不平等，那 当然就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所以，如果把这类家长自杀的悲 剧仅仅归咎于大学的所谓“高收费”，恐怕是很短视的。

平等与公正，并非同一回事。偶尔，平等即意味着公正。但 在更多的时候，平等即意味着不公正。如果父母干好干坏子女 都能够上大学，如果子女是否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与父母对社会 的贡献无关，这样的社会是否就很美好呢？恐怕未必。因为这 种巨大的平等是以巨大的不公正为基础的。再说，如果以这种 平等为社会理想，那得到的很可能是另一种平等，即所有的孩子 都不能上大学，所有的孩子都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应该 意识到，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让孩子能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 应该成为父母奋斗的一种重要动力。当所有的父母都为此而奋 斗时，社会就改善着、进步着。而当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大者的子 女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时，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小者的子女也能受 到比较好的教育。

3当知识遇上信念

仅仅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便自杀，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 原因决不像许多媒体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媒体在报道此类事情 时，如果只一味地对死者倾泻同情和对大学倾泻义愤，那在倡导 一些人捐款的同时，很可能也预约了明年同样的新闻素材。

2006年7月17曰

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

最近这些年，学术突然与大众亲近起来。不少具有“学者” 身份的人，在电视上以时髦的话语方式，谈先秦诸子，谈三国风 云,或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出版界自然也不甘落后，趁机大出这 类以浅显易懂而又充满噱头的方式谈论“学术问题”的书。有人 对之非议，也有人出而辩护。辩护的理由是：学术的通俗化是 必要的，学术走向大众是值得肯定的。

3当知识遇上信念

毫无疑问，使学术通俗化的努力，是正当和有益的，甚至是 不可或缺的。但是，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却是极易混淆却 又大不相同的两回事。这一点，在今天实有认真一辨之必要。

学术研究的目的，最终是要影响社会，影响大众的生活。实 际上，我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许多常识，当初都是高深的学术观 点。抽烟有害，如今尽人皆知，当初却不过是实验室里的结论; 人权的意识和观念，在中国也日渐普及，起先却仅仅是象牙塔里 的呼声。学术的通俗化，其实一直以各种方式在进行着。过去

的学者，是很注重这方面的工作的，他们往往一方面从事很专业 很艰深的研究，一方面又致力于将自己专业艰深的成果尽可能 向社会普及。这种普及性的著作，也能成为经典。我书架上有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有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就都是 民国时期的“通俗经典”。费孝通、萨孟武，都是在学术上颇有造 诣的学者，他们都另有多种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行世。至于 《乡土中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这样的著作，则是在非专业的 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结集。

在将学术通俗化时，必然要考虑到大众的接受水平，必然要 将那些最专业最难懂的部分牺牲掉。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迎合大 众、讨好大众。如果说，一个学者，在从事艰深的学术研究时，应 该心怀一种神圣感，应该有着对学术的敬畏;那他在从事将学术 通俗化的工作时，这种神圣感，这份敬畏之心，仍然是非常必要 的。学术通俗化，目的是在教育大众、启迪大众、唤醒大众，仍然 是以对大众启蒙为目的。它不是要强化而是要摧毁、改变大众 心中某些固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学术通俗化，不是为大众 搔痒，而是对大众棒喝。

3当知识遇上信念

以这种眼光来看今日学术与大众的“零距离接触”，就很难 说这是一种学术通俗化现象，称之为学术娱乐化或许更合适。 将学术娱乐化的目的，无非是名与利，迎合和讨好大众，就是他 们的基本策略。大众最想听什么，听了什么最开心，他们就说什 么。不妨以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为例。在这本通俗性 的学术著作中，萨孟武对梁山泊集团，予以坚决的批判和否定。 他一开始就强调，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造反集团，不过是一个 “流氓集团”，并进而指出，这种“流氓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屡屡起 着极其恶劣的作用。当然，他更从多方面分析了这种“流氓集 团”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这样一种对“梁山好汉”的评说，显然与

大众心目中原有的情感观念相冲突。而萨孟武的目的，就是要 摧毁改变大众长期以来对“梁山好汉”的仰慕崇拜，就是想清扫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水浒气”。如果让今天的那些热衷于将学 术娱乐化的“学者”来讲《水浒传》，他们绝不会这样讲。他们一 定会极力歌颂“梁山好汉”的“义”与“勇”，一定不敢对他们的滥 杀无辜、打家劫舍有半句微词。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名与利，他 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迎合社会上的“水浒气”。为了讨得大众更 多的喜爱，也不妨顺便称林冲为“帅哥”，说李逵是“猛男”。而大 众呢，大众自然乐得合不拢嘴。在这合不拢嘴的过程中，大众身 上原有的“水浒气”，就被进一步强化了。

学术通俗化与学术娱乐化，看似相似，实则薰莸不同器。

3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7年12月19日

大学教师讲课好坏已不重要

大学里也是新闻不断的地方。这些日子闹腾的是男教授与 女学生的“肢体冲突案”。京城某大学的某著名男教授因学生大 量逃课而恼怒、而失态，以至于去拉扯拂袖而去的某女同学。据 说该同学也不示弱，以脚报手——回踢了该教授几脚。这真是 斯文扫地。但我并不惊讶。毕竟，斯文扫地的事,在如今的大学 校园里，是司空见惯的。

4当知识遇上信念

事情闹大后，该大学的一名年轻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客里严 厉批评了这位在逃课问题上与学生发生冲突的教授。他强调， 在大学里，不应该以任何强制性的手段维持课堂“出席率”，并且 宣称:“逃课是自由的象征。”我是基本认同这位副教授的意见 的。但把逃课上升到“自由”的高度，却也不必。我更愿意说: 强制是教师的耻辱。当然，这是就大学而言，中小学另当别论。

不应以任何强制性手段维持课堂“出席率”，是否意味着大 学教师就不应该以任何手段维持课堂“出席率”呢？当然不是。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在意听课人数的教师也绝不 是好教师。那么，以什么手段吸引学生呢？答曰：尽量把课上 好。怎样才能把课上好呢？答曰：精心地准备，细心地揣摩，不 断总结课堂上的经验与教训，虚心向课上得好的老师学习，让自 己的讲授真正具有吸引学生的魅力，让学生觉得少上你一节课 就亏大了。——这才是大学教师用以维持课堂“出席率”的手 段，也是唯一不丢人的手段。

我在大学讲台上站了多年。我敢说，只要课上得还过得去， 学生人数就不会很少。固然有一类学生，再好的课对他也没有 吸引力，但这样的学生也并不多。大多数学生，只要老师的课还 差强人意，他们就愿意来听。学生的要求并不高。京城那大学 闹出“肢体冲突案”后，网上传出一张该大学学生占座的照片。 一个很大的教室，上课前所有的座位已被学生各色各样的书本 占据，连过道的水泥地上，也被书本占满。这是该校的学生在向 世人说明：这里的学生并非逃课成瘾。

4当知识遇上信念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大学教师，能在课堂上“站住”,他在 这学校也就“站住”了。课堂上能否“站住”，过去，对于一个大学 教师，是至关重要的。刚走上讲台的年轻人，念念不忘的，是怎 样让自己的课能被学生和同事认可。先师潘旭澜先生，闲谈中 曾向我说到，20世纪50年代，他刚留校任教，其时发表了几篇 论文，颇受学术界关注。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编辑特地从北 京赶到上海复旦，请他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个时候，京 城大牌出版社派编辑不远千里登门约书稿，对于一个刚留校的 青年教师，是天大的荣耀。我想，我的这位老师，未必没有动心。 但最终，他只请这位编辑在学校食堂吃了顿饭，写书一事，则婉 谢了。我问为什么,他答道.•“要写教案！”……但这种事，是老皇 历了。如今没有这样儍的青年教师，更没有这样傻的中老年教

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如今在大学里，教师能否把课上好，并 不重要。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尺度；课堂上能否 “站住”，与在学校里能否“站住”，没有什么关系。如今大学管理 教师的方式看似多种多样，但都不过是在分蛋糕。各种各样的 称号、岗位津贴的档次、教授的级别等，都是花色不同的蛋糕。 一个教师，能否在某块蛋糕上分得一份以及分得多大的一份，与 他的课上得好坏没有丝毫关系。从来未闻某块蛋糕的分配，将 课上得好坏作为一种硬性标准。即使是所谓“名师”称号的获 得，也未必与课上得好坏有什么必然联系。

既然这样，谁还会费心费力不断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呢? 而青年教师又怎么会努力让自己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讲课者呢? 我的那位老师，还说过一句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绝伦”的话：“要 用几十小时的时间准备一小时的课。”如今谁要这么做，谁恐怕 就真要“站不住”了。用这么多时间备课，又哪有时间以“精品” 的名义制造垃圾呢？当然，“工作量”仍然是评价教师的一种尺 度。但在这种尺度评价下，上得再好的课与上得再糟的课;精心 准备了的课与糊弄忽悠学生的课;连过道的地上都坐满了学生 的课与学生都逃光了的课，是等值的。

4当知识遇上信念

当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标准时，大学还能叫“学 校，，吗？

2008年1月15日

季广茂事件与学术界的“潜规则”

我不想在这里复述季广茂对钟华的谩骂，甚至只言片语的 引用，也让我觉得难堪，因为这会弄脏自己和自己的文章。季广 茂面对批评的姿态，季广茂那些污秽到极点的骂语，首先令我震 惊。我仿佛被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所击中，在电脑前愣了半天。 回过神后，我试图理解季广茂。毫无疑问，季广茂并非心智不正 常之人，不然就难以成为名校的教授、博导。一个本来心智健全 的人，忽然有此匪夷所思之举，这提醒我们不可对此事做过于简 单化的理解。

4当知识遇上信念

我找到钟华批评季广茂的文章，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我 以为，这是一篇在认真地谈论问题的文章，行文虽然有些尖锐， 但并没有超出学术探讨的范围。如果学术环境正常，如果学术 上的批评和争论形成一种风气，这其实就是一篇普普通通的书 评。而作为被批评者，如果心智正常，他所采取的态度无非两 种：沉默或反驳。沉默姑且不论。反驳则是据理力争，有理有

据地指出批评者的失误，以此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 术声誉，也只有以此种方式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 术声誉。但本来心智正常的季广茂，在这样一篇本来是普普通 通的书评面前，却似乎彻底丧失理智，大有操起粪帚“与你拼了” 的姿态。——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真正的原因，首先在于钟华的文章确实说得有理。其实，再 尖锐的学术批评，也不过如蒿杆打人。如果被打者浑身丝毫无 伤，那打人者蒿杆舞得再高、打得再狠，也只能让蒿杆折断，被打 者则毫无痛感。但如果被打者身上有伤，而且那伤口正在化脓、 红肿或溃烂，那蒿杆打在上面，就能让被打者痛得跳起来。季广 茂强调钟华文章对他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如果钟华文章真像季 广茂所说的那样毫无道理，心智正常的季广茂，一定不会感到真 正的伤害，也一定不会有如此不择手段的“反击”。实际上，正因 为钟华挥舞的蒿杆，打在季广茂的伤口上，季广茂才如此口不择 言地叫喊起来。换句话说，季广茂如此反应，不是因为钟华说得 没有理,而是因为钟华说得太有理。

44当知识遇上信念

既然人家说得有理，按“常理”，不好好反思并表示感谢，至 少也应该羞愧并默然。但季广茂却并不认可这“常理”。他认为 自己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委屈并表达这种委屈。这就涉及钟华文 章中这样一番话了 ：“坦率地说，我很少见过像《嬗变》那样读起 来如此让读者饱受磨难，如此让读者缺乏安全感，如此考验读者 忍耐力的所谓‘学术著作’。”我要说，钟华的这种说法，是欠斟酌 的。实际上，像季广茂的《嬗变》那样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术著 作”，在今日中国学术界，是大量存在的;我甚至想说，比季广茂 《嬗变》更文不对题、更逻辑混乱、更多常识性错误、更无价值的 “学术著作”，也比比皆是。所以，当钟华指出季广茂《嬗变》中的 许多问题时，他是对的。但当钟华强调季广茂《嬗变》是少见的

低劣时，却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季广茂的委屈，恐怕正由此而 生：分明经不起挑剔的“学术著作”成千累万而无人质疑，你钟 某偏偏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分明像我的《嬗变》一样问题多多 的“学术著作”每年都层见叠出，你钟某偏说“很少见过”;分明每 年都有比我的《嬗变》更更不像样的“学术著作”获大奖、受吹捧， 偏是我的《嬗变》却遭你钟某如此痛击。——你说我能不委屈、 能不愤怒得丧失理智吗？

那么，为什么今日学术界充斥着如此之多的低劣著作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术生产方式、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 这一点，是不待明眼人而后知的。当然，这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 说清，我在这里也难以细说。总之是，如今的这种学术生产方 式、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必然导致劣质论文和专著大 量出现，必然使得许多的所谓“学术著作”出了印刷厂便只配进 造纸厂;必然令黄钟毁弃而瓦釜雷鸣。更糟糕的是，这种学术生 产方式、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还使得学术界不知不觉 间形成了这样一种“潜规则”：一本“学术著作”，张冠李戴、别风 淮雨，是正常的•，东拼西凑、鲁鱼亥豕是合理的；指鹿为马、郢书 燕说，是不必在意的。而若有人去较真、去写文章批评，那就违 反了这种“潜规则”，就是不明事理，就是“不上路”，就是“拎不 清”，就是在“犯儍”。钟华直言批评季广茂的《嬗变》，就是无视 了学术界的“潜规则”;而季广茂作出如此反应，或许依据的正是 这种他认为钟华也应懂得的“潜规则”。

4当知识遇上信念

但既然是“潜规则”，那就是不能明言的。所以，季广茂除了 以污言秽语为武器，还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质疑钟华“批评的资 格”。坦率地说，我对这种居高临下姿态的厌恶，并不下于对那 些污言秽语的反感。在饭店吃饭时，如果每一道菜上来，不是拿 起筷子品尝，而是盯着服务员追问做这道菜的厨师有何种“资

格”，那将是十分可笑的。同样，面对批评时，不是辨析批评得是 否有理，而是去追究批评者的“资格”，也是极其滑稽的。如果你 的文章中有错别字，小学生也有资格批评你;如果你文章中有常 识性错误，任何一个常识丰富的人都有批评你的资格。其实，学 术界的“潜规则”再发展下去，恐怕就要“‘学’失而求诸野”了。

季广茂事件，是一件坏事。但如果能引发我们对学术界现 状的深刻反思，那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这是我衷心希望的。

46

3

月

3

年

当知识遇上信念

I第四辑I

学者之怒，诗人之忧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在大陆的读书界已颇有名气，这 主要得力于他的《胡适杂忆》和《晚清七十年》等几本书在此岸的 出版发行。唐先生勇于立论且涉笔成趣，虽托身学院，论学却没 有学院气，这是他的书拥有较多读者的原因之一。唐先生的几 本书，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有味，不仅因为书中那些令我叹赏的 议论，也因为书中那些令我疑虑和拒绝的观点。我觉得，唐先生 之所以有这些令我不能接受的观点，主要源于他作为一个在美 国讨生活的华人学者特有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是大堪玩味的。

4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里只说说唐先生对胡适的非议。作为胡适晚年过从甚密 的小友，作为一个对胡适的道德文章发自内心地敬仰的人，唐先 生并没有以感情代替学理。他不仅说了他所认为的胡适的伟大 功缋，也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胡适的重大缺陷。从遣词造句中，感 觉不到唐先生对胡适有丝毫的偏袒和讳饰。这是相当难能可贵 的，也是极值得大陆的文人学者效法的。唐先生对胡适的非议，有些是十分精辟深刻的。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指出胡适成 名太早，“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飞来飞去宰相家’”， 生活经验极其单纯，对民间疾苦所知甚少，更无切身的体验，所 以写不出那种字字血泪的文章，这种观察便很是准确。唐先生 又指出，胡适从在康乃尔大学读本科时起，就对经济学不感兴 趣，不曾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一生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 猎，而“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这也算击 中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要害。不知民间疾苦和不懂经济理 论，这两者其实是相连的。当时中国最广大民众的生存状况，算 是中国实际的经济，各种经济学说则是理论上的经济。只有既 对现代经济理论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经济 问题深为熟悉，谈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才更能搔到痒 处，也才能为当时的中国找到一种庶几可避免重大社会动荡和 历史悲剧的方略。而对中国的政治有极大兴趣的胡适，却既不 具备理论上的经济知识又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这 不仅是他“晚年”谈政治的致命伤，也是他一生谈政治的致命伤。 这种在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身上表现出的致命 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现代自 由主义者集体的缺陷。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之所以被认为软 弱无力，之所以以失败告终,这该是不应被忽视的原因。

但因为胡适有这种“致命伤”而否定他对政治的谈论，认为 他那些关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言论都没什么价值，则又是极为 偏颇的。唐先生强调胡适“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方面”，而“胡先 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 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唐先生显然认为胡适那众 多的文学以外的言论没有多少价值可言。我们知道，胡适在留 学期间，就经历过两次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以及自

5当知识遇上信念

由、人权观念有很深的了解。胡适坚信他在美国懂得的自由、民 主和人权，是普世性的，是能够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把在美国懂 得的政治价值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移植到中国，是胡适一生梦 寐以求的，他所有的政治言论都围着这一点打转。而唐德刚先 生所不满于胡适的，也正是这一点。唐先生一再指出胡适在政 治上“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并为此遗憾不已。唐 先生认为，胡适要在中国谈政治，就应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属于 自己的理论，而不应该跟在美国人后面跑。为何不应该跟在美 国后面跑呢，就因为美国的那一套价值观念并不可取。至于胡 适为何把本不可取的美国价值奉若神明，唐先生认为，这是因为 胡适对美国并不了解。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屡屡强调胡适 未曾与美国人“共过事”，未曾与美国人深切地打过交道，因而对 美国人始终是雾里看花。真实的美国是什么样呢，唐先生认为， 是“小人国”，是“绝情寡义”的“鬼吃鬼”的社会。《胡适杂忆》虽 并不是一本谈美国的书，但从唐先生偶尔谈及美国的片言只语 中，可感到一种对美国的刻骨仇恨。

胡适前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几年。留学期间不但积极参与 美国的政治活动，而且经常出入美国家庭，并与唐德刚先生所谓 的“洋婆子”谈过准恋爱，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干的则是专与美国 人打交道的事，说胡适不了解美国，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的。当然，唐先生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也不短，并且已成了“美国 人”。在他写《胡适杂忆》时，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已经比胡适多出 数年了。不过，唐先生对美国的感受和理解之所以与胡适相差 很大甚至尖锐对立，或许并不能解释为唐先生比胡适更了解美 国，而应该把原因归之于唐先生这类人在美国的生存境遇和生 存体验与胡适很不相同。胡适虽热爱美国，但从未想过要加入 美国籍，最终也算是叶落归根。唐先生这类人，却是以在美国生

5当知识遇上信念

根并最终成为美国人为目的的。在为此目的而奋斗的过程中， 唐先生们饱尝了艰辛，有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屈辱，有过多次打落 门牙往肚里咽的经历。这种情形，唐先生在《胡适杂忆》中也多 次谈及。例如，他曾谈到，当从史料中得知早先的华人在美国的 “排华法案”下所受的虐待而“每为之掩卷流涕读起这些血淋 淋的史实，真为之怒发冲冠。加以笔者本人亦以打工关系—— 从‘蓝领’到‘白领’——加入华侨苦力行列有年，目睹那时美国 移民官吏之横暴；白种流氓歧视华人之无理；以及华裔苦力猪狗 不如之惨状，真是触目惊心!”唐先生并“自恨无杜子美百一之 才，否则我把这些血泪的故事谱入诗篇，直比4三吏’、‘三别’不 知要惨痛多少倍！”唐先生还特意提到，在胡适、梅光迪、陈衡哲 等留美的“中国少爷小姐”在校园内诗酒唱和、其乐陶陶之日，也 正是“美国排华最高潮之时”，而这也是“最令”唐先生“感觉遗 憾”的。从史料中得知在美国排华最高潮时胡适一类留学生以 外的华人在美国的悲惨遭遇，是唐先生这类人仇视美国并在政 治和文化价值上“排美”的一种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 身在美国社会生存的艰辛。由于美国社会本身的进步，唐先生 们虽已不至于受到早先的华人所经历的那种虐待，但以一个异 质文化中生长的人要在美国生存，仍然是大为不易的。再说，唐 先生是在4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剧变后赴美的，而这也正是华人 潮水般涌入美国之时，那么多华人一下子踏上美国土地，要混口 饭吃当然有些艰难。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也说到，许多原本 属文史科的华人青年，到美国后只得改弦易辙，学习在美更有用 处的专业，这样衣食饱暖也就有保证些，而唐先生却执拗地坚持 着文史不放，自然就要为生存而品尝更多的屈辱，付出更大的代 价了。从这种个人在美国的不良的生存体验出发，唐先生对美 国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都不予认可。而胡适对美国的政治价

5当知识遇上信念

值和文化价值的赞赏，自然也就要受到唐先生的调侃、非议了。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有所谓“民工潮”，大量农民从农村 涌向城市，成为城市里的所谓“农民工”。我多次与这类“农民 工”交谈过。我觉得，“农民工”中有一部分人面对城市的心态， 与唐德刚先生这类人面对美国的心态不无相似之处。作为一个 所谓的“农民工”，要在城市生存，当然也是艰难的。何况，他们 离乡背井来到城市，目的是要挣点钱，回去讨老婆、盖房子、缴纳 各种苛费杂税，这样，自己的生活支出就要最大限度地压缩，也 就令他们更感到在城市生活的辛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这 种生存体验中，滋生出对城市的仇视，他们把城市说得一无是 处，他们认为城市人是自私的、冷漠的、残酷的，他们也拒绝城市 的那套价值观念，更有甚者，把对城市的仇视化为现实的行动， 对城市的公共设施进行破坏，对城市人进行偷、抢、杀。唐先生 这类学者，虽提起华人在美的处境时往往切齿之声可闻，却不会 轻易地化仇视为行动。但我也注意到，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 对那些“跟在洋人屁股之后把我们自己‘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骂翻袓宗八代”的“留美归国学人”，大有非议。在唐先生看来， “义和团”的大杀洋人，是值得歌颂的。如果说，唐先生在史料中 读到华人早年在美所受的虐待而“每为之掩卷流涕”，那他在史 料中读到当年“义和团”大杀洋人的记述时，一定欣喜不已，感到 痛快，觉得解气。由此也可见出，唐先生这类人对美国的仇恨有 多么深了。而怀着这样一种外来者的深仇大恨评判美国的政治 价值和文化价值，其偏颇有何等严重，也就不言而喻了。

53当知识遇上信念

前面我说过，唐德刚先生在评价胡适时没有以感情代替理 智，现在也许应该对这话有所修正。唐先生不因与胡适交情深 厚便放弃对胡适的批评，这是不以感情代替理智的一种表现;但 另一方面，他以一己的生存体验来代替对美国社会和美国价值

的客观理智的分析研究，又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化倾向，并最终在 对胡适的评价中带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不过，唐德刚先生确 实是由衷地敬重胡适的。在《胡适杂忆》中，他一方面指出胡适 崇尚美国价值的“谬误”，另一方面又时时淡化胡适与美国的精 神联系，淡化美国对胡适的思想影响。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是, 胡适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谦和宽容的处世方式，主要因为美国 文化的陶冶,也是他毕生信奉的自由主义理念在立身处世方面 的表现。然而，唐德刚先生对此却大声说“不”。他极力强调中 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胡适人格的塑造：“胡适之先生可爱，就是 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 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胡适“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 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 ”胡适是拒绝宗教的，对一切宗 教都不认可。他虽钟情于西洋文明，但却并不接受基督教，而唐 先生以此为由，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 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 些什么东西呢？”所谓“全盘西化”是胡适的名言，人们的毁之誉 之，都往往与这句话相连。而唐先生却要塑造一个“全盘反西 化”的胡适形象。唐先生的逻辑是，既然西洋文明便是基督教文 明，那不认可基督教的胡适，也就可说是在整体上拒绝西洋文明 的。唐先生在这里大胆地偷换了概念。西洋文明虽在一定意义 上可称为基督教文明，但“基督教”与“基督教文明”却并不是一 回事，这正像种子与果实不是一回事一样。胡适不认可作为一 种宗教的基督教却崇尚基督教文明，也就像一个人不吃西瓜子 却大啖西瓜一样，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唐先生淡化西洋文明 对胡适的影响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对胡适的作用，本意该是为 胡适辩冤白谤，但却不知不觉间构成了对胡适价值的整体否定。 试想，一个全盘反西洋文明的胡适，一个“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

5当知识遇上信念

高标准”的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还有什么价值？还怎么能 同时又是唐先生所谓的“开文化新运”的大师？

说起来，唐先生这类人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很“尴尬”的。 说他的肯定“义和团”和憎恶美国及美国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的 表现吧，他的“国”又分明是美国。如果说爱国主义是值得称道 的，那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唐先生，应该爱的是这个他已列 籍其中的国家。当然，我们可以说，唐先生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 爱国主义，但唐先生这种人对袓国文化的爱，正像他对西洋文化 的恨一样，都是不足国人介意的。读唐先生那些对美国切齿痛 恨的文字，我每每不解：一个人如何能够怀着对一个国家的如 此仇恨而在这个国家长期生活呢？如果你生于斯长于斯，并且 也无由离去，那你当然只能咬紧牙关忍受。但唐先生这类人的 情形显然并不如此。大陆、台湾、香港，他都有可能选择作为自 己的安身之地。如果他实在不愿回到祖国，生活在同胞中间，他 也可以谋求到美国以外的国家立足，他唐先生终于哪儿也不去， 就这样怀着对美国的仇恨，在美国年复一年地生活下来，并且还 要加入美国籍，让子子孙孙都成为美国人，这是否意味着，在唐 先生心目中，美国虽不好，但毕竟是最不坏的选择呢？

5当知识遇上信念

唐先生的政治心态和文化心态也是有代表性的，它在新一 代的留美人士身上也有遗传。朱学勤先生把这类人称为“出国 爱国者”。他们的特征是：挣美国的钱，享受美国的牛奶面包和 自由民主，再用汉语向袓国同胞发泄对美国的仇恨。

[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01年9月30曰

也说“动物上阵”

今年《书屋》第二期上有邵建先生的长文《动物上阵》，对鲁 迅的“骂人”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具体地说，是对鲁迅把人“骂” 成动物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忧虑。王乾荣先生读了邵文后，在 《南方周末》5月27日的“众议”里，发表了《以骂制“骂”》一文， 指出邵文也骂了鲁迅，不过是在骂“骂”而已。于是，在《南方周 末》7月1日的“众议”里，就读到邵建先生《就〈动物上阵〉的一 点说明》，强调是由于《书屋》编者的妄自增删，才使得他的文章 里有了鲁迅“动物似的上阵”这样的句子，也才有了王乾荣先生 的“误解”。邵建先生并且说：“如果认为这是在骂鲁迅，过不在 我。”这里的“如果认为”四字颇耐寻味。这意味着邵建先生认 为，即便说鲁迅“动物似的上阵”，也不一定就是在“骂”鲁迅。在 这篇“说明”里，邵建先生再次强调：“我素不赞成在公共领域内 骂人，且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那是一种游民或游民文化人的 习气。”

5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些年，骂鲁迅真成了一种时髦。在骂鲁迅的同时，一 些人极力表示对胡适的崇敬，抑鲁扬胡，成了他们做文的基 本程式。这些人，有的算是我的朋友。说实话，我常常感到 他们在这样做时的滑稽、浅薄和无聊。至于邵建先生，应该 算是我很熟的朋友了。我知道，他对于胡适是十二分地敬仰 的，在抑鲁扬胡的阵营中，他的旗帜极其鲜明。但恕我直言， 他近年的那一系列“清算”鲁迅的文章，实在不能令我佩服。 就说邵建先生所谓的“动物上阵”吧，是非姑且不论，这却并 非是鲁迅的独家手段。我记得，为邵建以及其他一些朋友所 崇敬的胡适，也会驱遣动物上阵的。为写这篇文章，我随手 翻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很容易地就找到了 下面这些例证。

《双十节的鬼歌》:“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尝试集》)邵建先生从鲁迅 文章中归纳出了“狗系列”和“鸟系列”。您看，这里，“狗”虽未 来，但“狼”来了，“鸟”也来了，而且，这是在写诗！

5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一周》:“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 年的工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 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一 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 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长！大家生在这个猪仔世界 之中，久而不闻猪臊气味，也就以为‘猪仔’是人生本分，而卖身 拜寿真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先要人不肯做猪 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政治。”（《胡适文存二集》）您瞧，这 里，“狗”虽未来，但比狗更不济的猪，可满世界乱跑了。坦率地 说，胡适先生这些文字，特别令我喜爱。他并不像一些谬托知己 者所描绘的那样，永远那么温文尔雅。他也有冲冠一怒和破口大骂的时候，这让人觉得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是那种可以做 朋友的人。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我们的传统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 思去想……说得粗浅一点，叫做f印琴年。”(《胡适时论集》}您 瞅，这里，把咱们中国人都“骂”成“蛇”了，而且是“死蛇”，而且， 在“懒如死蛇”四字下面，胡适加上了着重号。

《国民参政会应该如何组织》:“我们要郑重的忠告国民党与 政府：只有能捣乱也能监督政府的参政代表的赞助是有力量 的。御用走狗的赞助是不值得要的。”（《胡适时论集》）您看清 了，这回，“狗”也终于摇尾登场了。

5当知识遇上信念

要举例的话，还可举出不少，但我想已经够了。若说胡适文 章中动物毕竟不如鲁迅文章中常见，那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 差。——杀一人与杀三人，不都是杀人犯么？

若说在“公共领域内”不能让“动物上阵”，还迎面碰上这样 的问题：汉语中有大量词语、成语、谚语、诗词，是由“动物上阵” 的，例如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狐假虎威”、 “蛇蝎心肠”、“欢呼雀跃”、“虎头蛇尾”、“虎头虎脑”、“虎背熊 腰”、“犬儒主义”、“黄鼠狼给鸡拜年”、“夜猫子进宅”、“喜鹊登 枝”、“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猪鼻子里插葱”、“屎壳 郎打喷嚏”、“老牛拉破车”、“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 蹄”、“我爱你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可真是举不胜举，若 说在“公开领域”内这些话可以说，那就要制定一些细则，规定 “公共领域”什么时候对动物开放什么时候则拒之门外；若说这 些话都不能说，那汉语还叫“汉语”吗？再说，这是否有了一点 “专制主义”的气息，难道从“自由主义”到“专制主义”是如此便 捷的么？

我爱鲁迅，也爱胡适。若是读鲁迅(还有胡适），只看见一些或死或活的动物，那真让人无话可说——因为说出来的，只能是 一句骂人话。但我想说，不但胡适会骂人，孔老夫子也会骂人， 他不是有一句著名的骂人话么：“乡愿，德之贼也!”

2004年7月11曰

5当知识遇上信念

骂鲁界里无高手

好像是太原的韩石山先生吧，写过一篇《鲁研界里无高手》， 对鲁迅研究界睥睨了一番。按理，骂鲁也应属鲁研之一种。我 知道，有些以骂鲁为业者，是希望别人把自己的骂鲁看成“做学 问”的。例如南京的邵建先生，就声称自己在“做鲁迅”。我们当 然不应认为邵先生要去把死了六七十年的鲁迅“做掉”，只应认 为他是在“做”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但看韩先生的意思，骂鲁 是不算鲁研的。既然骂鲁不算鲁研，就令朱大可、葛红兵、邵建 辈有点为难了 ：要么您不是“高手”,要么您不算“做鲁迅”。

6当知识遇上信念

既然韩先生没有把骂鲁者归入鲁研界，我也就可以说一句: 骂鲁界里无高手。

鲁迅当年曾打算把各种骂自己的文章编成一集，印刷出版， 让世人知道这些作者有怎样古怪的心思，有怎样离奇的手段。 我以前为鲁迅终于未做成此事而遗憾。这些年，读时贤们的骂 鲁文章，我不再有这种遗憾了。因为今日的骂鲁文章，也同样能够让人们见识心思的离奇和手段的古怪。朱大可、葛红兵辈，眼 光总离不开人的“脐下三寸”。他们的“做鲁迅”，就是手持放大 镜对着鲁迅穿过的那条棉裤念念有词。朱安呀，许广平呀，羽太 信子呀，叽里咕噜而又慷慨激昂。更有甚者，连刘和珍也能扯 上，让我惊叹人的心思可以卑劣和无聊到何种程度。看他们的 “做鲁迅”，我时常想到他们中有些人所崇拜的胡适所说过的一 句话:“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们自己如果真的信奉这“旧道 德”，也还罢了。但只怕仅仅是把这僵尸当作击鲁的坚棍而已。

无中生有、诬陷栽賍，是他们惯用的手段。还可以韩石山先 生为例。这两年，韩先生在与一位姓陈的鲁迅研究者笔战。韩 先生所说的陈先生的种种言行，如属实，那确实是令人齿冷的。 但韩先生却总不忘把陈先生的言行与鲁迅挂上钩，说陈先生是 “把自己研究成鲁迅”。鲁迅什么时候有过曲学媚权的行为？什 么时候给人寄过一叠白纸，又什么时候欺人以政治之“势”？（他 也从不曾在政治上得过“势”）……韩先生不是在恶意地诬陷，就 是在无知地栽赃。把研究者身上的毛病归咎于研究对象，这是 什么逻辑？看韩先生对胡适的崇拜，大概也在研究胡适。但如 果说韩先生对鲁迅的诬栽是“把自己研究成胡适”，那韩先生能 认可吗？胡适先生教导我们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以负 责任的态度说负责任的话”。诸位如此崇拜胡适，不能只停留在 嘴上。——天知道，我有多么希望你们“把自己研究成胡适”。

6当知识遇上信念

稗贩挦扯、罗织锻炼，也是他们的常用手段。这不妨举邵建 先生为例。邵先生这几年孜孜不倦地抄着那些人所共知的资 料。当然他不是“为抄书而抄书”，而是以先入之见对这些资料 进行剪裁取舍。鲁迅说中国人往往是“决计问罪在先，搜集罪状 在后”。每当看到邵先生骂鲁新作发表，我总想到鲁迅这句话。 有人说，邵先生某篇文章曾得到某位德高望重者的赞赏。我想，

倘这德高望重者只是国际问题或仅仅是美国问题专家，他对鲁 迅和胡适的言论，便完全可视作门外汉的谬论。邵先生虽不过 是以剪刀和糨糊在“做鲁迅”，但“韧”的精神，却是值得佩服的。 偶尔骂骂鲁迅并不难，难的是几年间持之以恒、翻箱倒柜地骂^ 更难的是骂上一辈子;最难的，则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 孙骂下去。

6当知识遇上信念

尼采曾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对一条蛇说:“你几时见过一条 龙被一条蛇毒死呢？”一条蛇毒不死一条龙，十条百条、千条万 条，也毒不死。——再多再毒的蛇，蛇而已矣。

2004年10月29曰

胡适、鲁迅与陈德征

胡适、鲁迅，大家都知道。但陈德征是谁，知道的人就要少 些了。本来，除了在冷僻的史料上有可能看到他的名字外，这个 人基本上应该“身与名倶灭'但因为他与胡适和鲁迅都有过一 点瓜葛，我们在读胡适和鲁迅的书、在研究胡适和鲁迅时，还会 碰上他。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吧，他就像寄生在参天大树上的 一根细藤，大树不死，他也就活着。

6当知识遇上信念

陈德征,浙江浦江人。1923年与胡山源、钱春江创办“弥洒 社”并出版《弥洒》月刊。1926年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 1927年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等 职。据说，在陈某执掌《民国日报》时，曾忽发奇想，在报上搞了 一次“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是陈德 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某押到南京，关 了几个月。但蒋对他的惩罚仅此而已。陈某回到上海滩后，照 样做他的官。

1929年，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颇 具声势的“人权运动”，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而点燃导火线 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陈德征。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 登出专电，说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 上提交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基本意思是谴责 其时的法院审理“政治犯”时太拘泥于证据，往往使“反革命分 子”漏网。陈德征提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 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 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 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陈的宏论令胡适怒火 中烧。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刺激，胡适终于拍案而起，写了 《人权与约法》一文，在《新月》杂志发表。胡适在文章中呼吁: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 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 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 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随后，胡 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 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 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文章。在胡适的影响下，罗隆基写了 《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等文章;梁实秋也写 了《论思想统一》。

这些文章，直指国民党执政后的恣意妄为、倒行逆施，自然 引来了国民党党徒的围剿，而陈德征就是跳得最起劲者之一。 陈德征在题为《胡说》的文章中这样斥责胡适：“不懂得党，不要 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 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不容胡说 博士来胡说。”据胡适日记，他在陈某文章边上批道：“可怜陈德

6当知识遇上信念

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终以 为党是制法的机关”。顺便指出，在50年代大陆批胡适运动中， 虽也有名公巨卿式的人物称胡适言论为“胡说”，但发明权实在 不属于他。

在鲁迅文章中，至少有两次提到这个陈德征。第一次是在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中，第二次是在《〈中国 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在写于 1934年1月31日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说：“四五 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 长陈德征氐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 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予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 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 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 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6当知识遇上信念

鲁迅所说的“要求自由的团体”，即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发起 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中 回忆道:“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的发起人，派人来告诉我，要我先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去和 鲁迅先生谈了，记得他当时的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 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 人之一。以后是先由我介绍，党又派人（我记得是潘汉年）和他 直接谈过几次。”《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印成传单时，鲁迅 名列发起人第二，而第一则是郁达夫，这都是鲁迅始料未及的。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以这样的话开始:“自由是人类的第 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接着写道：“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 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 言论不能自由。……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 奋斗！”这样的宣言，自然刺痛了陈德征辈的神经，于是有了“连 现在所给予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的怒吼。

其实，陈德征也曾是一个“文学青年”，而且是一个“为文学 而文学”的“文学青年”。1923年3月，有一份小小的文学月刊 《弥洒》在上海出现，1923年8月出至第六期停刊。刊物的编辑 者便是胡山源、钱春江和陈德征。鲁迅在写于1935年的《〈中国 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样说到《弥洒》和陈德征：“但上 海……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 洒社。……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到四月出版的第 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 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 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 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 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 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 坛’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 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陈某从一个反对文学的“商品 化”、主张“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青年”，到一个杀气腾腾、流氓 气十足的国民党党棍，中间只有几年的时间，用“摇身一变”来形 容，一点也不夸张。

66当知识遇上信念

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指 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 «化，而陈德征便是典型代表。余英时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迅速恶化，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胡适在 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 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 市党部的重要角色……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 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 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

其实，要说国民党党棍的流氓地痞化，陈德征未必算得上最 典型的。因为与胡适有过纠葛，才被余英时当作了例子。

2006年7月20曰

6当知识遇上信念

鲁迅亲属与鲁迅

鲁迅亲属与鲁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谈的， 只是在鲁迅身后，鲁迅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而之所以要谈 这个问题，则是因为读了《南方周末》上《鲁迅长孙周令飞：为鲁 迅之名奔忙》(2006年8月24日）一文而有所感矣。这篇占据 近半个版面的文章，介绍了周令飞先生正在怎样“为鲁迅之名奔 忙”。这一“为”字，使得语意有些暧昧。我想，把“为”字换成 “借”字，就明白多了。从这篇文章里，我们知道周令飞先生正在 从事各种各样以“鲁迅”命名或与鲁迅有关的活动。拍名为《鲁 迅》的电影，拍名为《中国文豪鲁迅》的电视剧，也就罢了，连“南 京咸亨酒店珠江路分店举办的‘绍兴三日游’ ”也参加，就让我颇 有些惊讶了。

68当知识遇上信念

周令飞先生为自己的“奔忙”给出的理由，当然是从亲属的 立场宣传鲁迅、研究鲁迅了。

说到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应该先说到周令飞先生的袓母许广平先生。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先生即搜集有关资料、出版 鲁迅著作、撰写回忆文章。许广平先生关于鲁迅的著作，有《欣 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应该说，这些著 作，对宣传和研究鲁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毋庸讳言的是， 也造成了不少混乱。在回忆、描述和塑造鲁迅形象时，许广平先 生有着许多有意无意的错ift和歪曲。“文革”开始后，许广平先 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谈鲁迅的文章，其中对鲁迅的 描绘和阐释，是严重违反实际的。例如，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照耀着鲁迅》中，说“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 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正 先生1979年出版过《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对许广平“回忆”中 的多处差错进行了纠正。数年前，我也曾发表题为《许广平在改 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的论文，研究了许广平先生在“改写”鲁 迅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更研究了她这样做的“苦衷”。

许广平之后，就该说到鲁迅二弟周作人了。20世纪50年 代初，周作人在报纸上写了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后汇成《鲁迅 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书。周作人 在那时候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为稻粱谋，赚稿费养家糊口。他只 写他所认为的客观事实，尽量避免主观介入。这些文章对研究 鲁迅自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6当知识遇上信念

鲁迅三弟周建人先生，在鲁迅逝世后的十多年间，也写了十 来篇回忆鲁迅的文章，50年代初结集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出版。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时，还口述了《鲁迅故家的败落》，这 些，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鲁迅。但“文革”期间，周建人 先生也出版了《回忆鲁迅》一书，那就完全是把鲁迅往“文革”的 战车上绑，让鲁迅为“文革”服务了。

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2001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也应视作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1957 年一则有关鲁迅史料的披露。

在1949年后，许广平先生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 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周建 人先生则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 席等职，是中共九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这些，无疑都是鲁迅对 亲属的现实影响。仅此一点，也就说明，在1949年后，鲁迅的确 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肖像权、著作权一类问题上，不能与一般 人等量齐观。所以，每当周海婴先生在此类事情上兴讼，我都是 颇有腹诽的。

70当知识遇上信念

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周海婴，他们对鲁迅的回忆，有着 不言自明的理由和价值。但周令飞先生如今忽然“为鲁迅之名 奔忙”，就不免令人疑心他的“醉翁之意”到底为何了。鲁迅曾长 期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这造成了不少人对鲁迅的误解甚至反 感。鲁迅如果又被绑在经济的战车上，让鲁迅搭台而经济唱戏， 那后果是什么呢？

临末，我忽然记起鲁迅留下的这样一条“遗嘱”：“孩子长大， 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 术家。”

2006年9月10日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走了，去往了另一个世界。——这天， 是2006年7月1日。

7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些天里，陆续读到一些悼念潘老师的文章。我知道，还有 一些悼念潘老师的文章即将发表;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正在写或 将要写类似的文章。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公开发表一点悼念潘 老师的文字。但这些天来，大脑时而如冰结的湖面，挤不出半句 话;进而又似杂草丛生、百物喧闹的池塘，理不出一点头绪。于 是便想，等心情平静后再慢慢写吧。然而，《随笔》的麦婵女士来 电话，说《随笔》想在第五期发表一篇纪念潘先生的文章，已留好 版面，并命我来写。又说，潘先生是《随笔》多年作者，读者也期 待着尽快在《随笔》上看到悼念潘先生的文字。《随笔》是潘老师 生前极推重的杂志，多次对我说过，要重视《随笔》，并希望我也 成为《随笔》经常性的作者。潘老师病逝，《随笔》送了很大的花 篮，还发来了唁电。在众多唁电中，《随笔》的唁电因既朴实无华又情真意切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随笔》命我赶写一 篇纪念潘老师的文章，我哪里有推辞的余地。

中国有一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在我看来，这应该是 父子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这必须是父子关系在多年间一点 一滴、不知不觉地变为兄弟般的关系的。这样的关系，意味着两 代人之间没有代沟，没有价值观念上的重大分歧；意味着两代人 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意味着两代人之间有着那 种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和心照不宣。但在中国，这样终 于成了“兄弟”的父子，历来是不多的。虽说中国还有一句老话: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潘老师与我，毕竟不是血缘意义上的 父子。所以，我虽然极想用“多年父子成兄弟”作为这篇文章的 标题，但终于觉得不妥。我又想用“多年师生成兄弟”来表达心 中的感受。如果真这样，我觉得潘老师未必会怎样见怪，极有可 能是在略显惊讶之余，以淡淡的苦笑来默认这种放肆。但这对 许多活着的人，是大不敬了，终于不敢。人的一生，会与许多人 相遇、认识、交往。但真正重要的人却并不多，无非就那么屈指 可数的几个。这样的人一旦离去，你生命中的某一部分也就被 他带走了。潘老师离\*后，我几次想对老师的女儿潘向黎说，我 失去的，也许并不比你少。——但也终于没有说出口。

7当知识遇上信念

成为潘老师的学生，有着很大的偶然性。1978年，我以农 村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我记得，那年填志愿可 填十所院校，五所重点院校五所普通院校。我第一志愿填的就 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此外一项就是“是否服从分配”。那时的 人，能被任何一所学校录取，都是天大的幸事，当然填“服从”。 何况，如果“不服从分配”，此后几年内就“不准报考”。但后来， 所有的志愿都被忽略不计，只有“服从”二字起了作用：先期介 入录取的部队院校洛阳外语学院(那时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现在叫什么，我不清楚），在安徽录取十名文 科学生，我竟被他们看中。少年时的我，也曾有过一些梦想吧， 但我即便是发高烧时，也没敢想过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 员。入学的同时穿上了军装，我从未感到过威武，只觉得别扭。 在校期间，虽然外语学得很刻苦，但常常是“瞻望前程,不寒而 栗”。我“栗”得并不多余：1982年7月，我被一辆解放牌大卡车 接进了大别山中。那时我虽然尚不满二十岁，却常做被活埋的 梦。幸好，不到一年，单位就搬到了南京市。南京当然比山沟要 好些，但心情仍然是极为苦闷的。那几年，我年年打报告要求报 考地方院校研究生，但年年被驳回，且屡遭主其事者的嘲讽、挖 苦。19S5年12月（或者1986年1月）的一天，《解放军报》上登 出了总政治部关于现役军人报考研究生的规定，其中一条是“现 役军人可以报考地方院校和研究所的研究生”。我平生第一次 体验到了什么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低头把这句话看一 遍，抬头想一想;低头看一遍，又抬头想一想。这样地看了三遍 想了三遍后，一转身去了干部科。这回他们无话可说，同意我报 考地方院校了，并且说好，一旦被录取，即办理转业手续。报名 时，我未多考虑，就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潘旭澜老师。当时， 一些善意的同事，曾劝我报考差一些的院校。我明白他们的意 思。好不容易等来了这样一个机会，应该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更 大的院校。但我自己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后来我一直觉得，这是相当冒险的。因为报名刚结束，总政治部 新的规定就下来了。大意是，本年度已经报考地方研究生者，允 许他们参加考试，但考取后不得转业，毕业后仍回部队工作；以 后现役军人则仍不得报考地方院校。新的规定，又让我体验到 了什么叫“背水一战”。

但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意识到命运出现了转机，

7当知'识遇上信念

虽然不能转业将高兴大大地打了折扣。1986年9月，我正式成 为潘老师的学生。入学后，潘老师几次对我说，是否录取我，他 “考虑了一星期”，原因在于我的试卷字迹太潦草。我在后怕之 余，又有些不解。我平时写字，的确是非常潦草的，而且潦草得 毫无章法，完全是一套自创的“文功”。如果是写文章，那草稿就 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过些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看不懂。我知道 自己有这毛病，在答卷时是有意识地克服了的。在时间允许的 前提下，我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将字写得工整了。饶是如此，还 是差点因字迹潦草而折戟沉沙。后来，当我较多地体味到潘老 师做人做事的认真后，我就不以他那“考虑一星期”为怪了。就 说写字吧，他除了偶尔有一些笔画十分合乎章法地带点行书的 写法，基本上是一笔一画地写。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是这样。就是写一张最无妨随便的便条，也是那么清清楚楚、 一丝不苟。我从没见过第二个人如此认真地对待写字。我有时 想，如果他正在那里写一张便条，你告诉他房子快要倒了，他也 仍会横是横、竖是竖地把字写完。当然不只是对待写字才如此 认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写篇文章不容易。”所谓“不容 易”，也就是认真得近乎不近人情。他从不会有了一点想法就 写，总是要反复考虑、反复掂量。他的文章，几乎没有那种灵机 一动之作，总是在脑子里放了很久，少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 几十年。写完后看看、改改，改改、看看，是自不待言的了。写完 后整体性地不满意，觉得没有把想表达的意思说清楚而推倒重 来，也决非罕见。几番重写后仍不满意，他就会把这题目暂时放 下。从潘老师那里，我悟到一个道理，即人们对待自己的文章, 是有着两种心态的。一种把读者的反应放在第一位，能博得读 者叫好，就好。至于文章是否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则在其 次;更有甚者，为了换取读者的喝彩，不惜说些连自己也不相信

74当知识遇上信念

的话。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见。只要看看有些人今天这样说、 明天那样说，就知道他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玩笑而已。另一种 当然也考虑读者的反应，但是否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是否 把想说的话说清楚了，则永远被置于首位。潘老师是后一类的 典型代表。浮而不实、哗众取宠，从来与他无缘。

潘老师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辞典》，以其全面和准确、以其尊 重事实的勇气、以其考察“新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而受到广泛 称誉。潘老师去世后，我曾在他书房里随便翻书。一位研究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寄赠的专著，扉页上写着“您主编的 《新中国文学辞典》为我写作此书提供了巨大帮助”。我知道，这 位学者与潘老师平素并无来往，他也实在没有必要对潘老师曲 意奉承，所以这决非客套。这部《新中国文学辞典》之所以成为 精品，就因为潘老师异乎寻常地认真。在那个漫长的编写过程 中，他不知道生过多少气，发过多少脾气。他多次对我说，为编 这部辞典，“至少少活五年' 应该说，当年参加编写的人，谁都 不曾马虎过。但你的“不马虎”与他的“认真”之间，实在往往有 一段距离，这就难免“挨骂”，难免返工。——有许多词条，是经 过多次返工的。在他写作《太平杂说》的日子里，书房里连地板 上都堆满了各种史料，每一本里都或多或少地夹着纸条。《太平 杂说》采取的是学术随笔的方式，一般不做注释，却无一句无来 历。他是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应对史实方面的质疑的。“太平杂 说”大多数千字一篇。但每写一篇这样的“杂说”，他都要查阅大 量的资料。正因为他在论述史实时的严谨，后来的质疑倒并不

7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史料方面。 位中文系的教授写出这样一本书，竟然没

有哪位史学专家在史料上提出疑问，即便恨得牙痒痒，也只能在 “观念”上说一些业已说了一辈子的话，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潘老师认真，却并不迂腐、呆板和固执。写字工整易认，是他长期对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当电脑开始流行，有人开始用 电脑写作时，有一天他颇为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可以用电脑写 作了，写字不再成为问题。我以后对别人的写字没有要求。”我 明白，这是在写字一事上为我“松绑”。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不少人认为潘老师脾气倔，容易生气。 应该说，潘老师性情中狷介的一面确实比较突出。刚投到潘老 师门下那几年，见到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制怒”二字。这是 在仿效他颇为钦佩的乡前辈林则徐。这也说明他在有意识地克 服自己这方面的性格缺陷。我以为，潘老师性情的这一方面，与 他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是刚成年便陷入物质和精神上的 双重苦难的。从家乡闽南到上海，与其说是求学，毋宁说是求 生。虽然留校任教，也仍然因为“家庭问题”受到歧视，被固定在 “助教”的职位22年之久。“文革”十年，更是饱受摧残，完全可 以说是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婚后多年分居，他只身在上海打 熬，师母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苦撑。“文革”结束，他也人到中年 了。直到这时，师母和孩子才到了上海，他才结束了几十年的单 身生活。我刚到复旦那几年，在与我交谈时，他多次说到，自己 是没有青年的。他的意思是说，从未体会过青舂的健康、浪漫、 欢乐，从未有过青年时期的无忧无虑、轻松愉快。每当说到这 些，语气里总充满遗憾。正因为自己的人生如此残缺，他特别希 望我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固然常常告诫我们不要虚度时光， 但也常常强调，即便是一个学者，也不应该“成为读书写文章的 机器”。我在读博士期间，是一个人住一间屋子，晚上总是睡得 很晚。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便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年轻时不可太 熬夜，身体上的透支是要加倍付出代价的。——他不知道，我每 天上午的懒觉也睡到很晚，睡眠时间只比别人多绝不比别人少。 晚睡只是一种习惯，决非刻意透支身体。他大概觉得我是很用

7当知识遇上信念

功的吧，后来就常常对我说，不要总在那里读书写东西，有时也 和同学出去喝喝酒。——他不知道，我不但常常和同学出去喝 酒，更常常一个人在宿舍喝酒，地上胡乱放着的酒瓶总令来访者 一进门便一声惊呼。

半生苦难，使潘老师性情中有了较为易怒的一面。身心上 的苦难，倒还在其次。学术生命的长期中断和不可弥补,是令他 常常烦躁的主要原因。潘老师留校任教后，便显示出强劲的学 术势头，是那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才俊。“文革”使 他起步未久的学术生涯中断，更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健康，使得后 来想“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也缺乏身体上的本钱。他曾对我 说，“文革”前他已完成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稿。“文革” 开始后，他将书稿藏在一亲友处。“文革”结束后，他想取回，却 得知书稿已在“文革”中丢失。他说，这件事令他“好几年不痛 快”。而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分明感到他并未完全释然。这件 事我只听他说过一次，此后再未言及。这分明是他心上的一道 伤口，他不愿多碰。大概是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天在他家 中，他对我发了火，火势并不大。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他 的火发完，两人便无言地僵坐着。过了一会，师母招呼吃饭。于 是留下来吃饭。我那时能吃且贪吃。在餐桌上坐下，便毫不客 气地饕餮起来。桌上的一只鸭子有一半入了我的腹中。几天 后,在一个路口与他相遇。他走过来，站住，板着脸，说:“那天因 为心情不好，你不要介意。”说完扭头就走，把我扔在那里发呆。 后来我知道，那天在我走后，师母责怪了他。他显然接受了师母 的批评，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向一个学生道歉。

77当知识遇上信念

但这种发火的事却并不多。从硕士到博士六年间，我所遭 遇的也只有那么一两次。从他那里，我更多地体会到的，是宽 容。我觉得，他实在比许多貌似平和温厚者，要宽容得多。像我

这样一个不拘小节、毛病多多的人，能为他所喜爱，前提是他宽 容了我身上那些他并不喜爱的东西。——而这是那些貌似平和 温厚者往往难以做到的。与其说他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毋宁说 他是一个有性情的人。回首复旦的六年，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他 对我的宽容。现在的研究生，要上许多课，已经本科化了。那时 在复旦读研究生，是非常自由自在的。从硕士到博士的六年间， 我几乎没有进过教室。潘老师在这些方面并不做什么要求。不 但在上课上不对我有任何要求，在读书做学问上也从未有任何 具体的要求。他采取的是任我自由发展的方式。而他的“指 导”，都是在他的书房里进行的。在那一次次漫长的聊天中，他 以甚至不让我觉察的方式，实现着对我的指导。当然，他自己也 未必总意识到是在对一个学生进行指导。他只是在谈着他的人 生经验，谈着他治学上的各种感悟，谈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 的事、各种各样的书。复旦的一些老先生，是他常谈的话题。在 他的书房里，我一次次领略到周谷城、刘大杰、朱东润等先生的 风采。谈的最多的，则是他最为感激的鲍正鹄先生。1996年， 潘老师发表了《若对青山谈世事——怀念朱东润先生》一文，这 真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散文。文中所写到的事，我不止一次听潘 老师讲过，但我仍然被文章所感动。当然，潘老师对我讲述的朱 先生，比他所写的要更丰富。有些事他并没有写。对这些老先 生，潘老师在聊天中当然更多的是赞赏，但也偶有非议。他多次 对鲍正鹄先生的博雅精深赞不绝口。鲍先生前几年辞世，潘老 师写了《漫天飞雪——送鲍正鹄老师》一文，其中说到“一位上世 纪80年代至今极有声名而且绝不随和的学者，送书给鲍先生， 总称之为通人、方家。”这位学者，就是钱锺书先生。然而，他也 多次对我分析鲍正鹄先生在个人著述上成就甚少的原因。除了 一生为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缠身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眼界

7当知识遇上信念

太高。因为自己太有学问，鲍先生对同时代的学者大都不太恭 维;对自己写的东西，也总不满意。因为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东 西，就干脆不写。对这一点，潘老师显然是并不苟同的。他说， 对人对己，都不应该求全责备。对人求全责备，世间便无可读之 文;对己求全责备,就会终身一事无成。

这样的谈话，让我深切地体验到什么叫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这样的谈话也很快让我上瘾。那时电话不像现在这样方 便，我总是在晚饭后并无预约的情况下敲开老师的家门。我那 时的想法是，如果老师有急着要做的事，我稍坐片刻便告辞。但 稍坐片刻的事一次也不曾有过。总是从晚上七点来钟谈到午 夜。总是在谈兴正浓时忽觉夜已很深才戛然而止。现在想来， 当然不是他从不曾有过急着要做的事，而是有再急的事，他都放 下了。“无知者无畏”这说法是有几分道理的。那时的我比现在 更加无知，因而也更加放言无忌。在与潘老师的交谈中，我不知 道说过多少无理的话、荒谬的话，不知道多少次口出狂言、妄下 雌黄，但都他被视作一个年轻人可以原谅的毛病，或被视作一个 人可以原谅的个性而予以宽容了。那时复旦有硕士生可提前一 学期攻博的制度，手续极简单。硕士读到两年半时，有一天潘老 师把我找去，说准备让我提前攻博，问我是否愿意。我不假思索 地说:“当然愿意！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潘老师带着我到了贾植 芳先生家，贾先生问了我几个专业方面的问题，就算是通过了面 试。新学期一开始，我就把铺盖书籍搬到了条件好得多的博士 生楼。与潘老师的交谈，也更具有深度和广度了。开始的几年， 谈的主要是学术问题和一般性的人生问题，后来则向政治方面 拓展，谈起了“莫谈国事”的“国事”。一些如果不是对一个人彻 底信任便决不会说的话，也开始从嘴里缓缓地流出了。我本来 应该是在1991年底毕业的，其时复旦中文系已决定我留校，无

7当知识遇上信念

奈军籍在身。要获得军方的同意，难如上青天。为争取时间与 部队交涉，我以论文未完成为由，延长了一学期。拖到了 1992 年夏季，军方的绿灯仍然没有亮起，我只得离开复旦，回到了 南京。

离开上海后，与潘老师的交谈仍然继续。每次到上海，无论 有别的什么事，我都是先直奔复旦，在招待所登记好房间，立即 去他那里报到。聊天总是从下午二三点钟开始，到吃晚饭时分， 他必定到附近饭馆请吃饭，且必定喝酒。吃完饭回到书房继续 聊。到夜间十时左右，他必定拿出好几种点心和好几种酒。就 这样喝着、吃着、聊着。谈的虽然也无非是家事、国事、天下事， 无非是文学、文化、学术，但说的往往是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 话，常常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夜深时分，如果潘老师的小 女儿潘向蓁在家，必定推开门，问是否需要烧点东西吃吃。晚饭 已经酒足饭饱，且又在不停地喝着、吃着，实在不需要。所以我 开始总是辞谢。再过一会，她又推开了门，把刚才的话又问一 遍，我仍然辞谢。她带上门时，脸色已有些不好看了。几分钟 后，门又被她推开，这回语气和问话都不同了 ：“我再问你一次: 到底吃，还是不吃？”再要辞谢，那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于 是连声说:“吃！吃！吃！”不一会儿就会有两小碗热气腾腾的夜 宵端进来，精美而可口。离开上海后，与潘老师的聊天，更多地 是通过电话。就像当年过一段时间就想去敲开他的门一样，离 开上海后，过一段时间就想拨通他书房的电话。他也常常打过 来。通常，他总是在夜间喝得微醺时，拿起电话找我聊天。无论 是我打过去还是他打过来，都跟见面时一样，要聊到深夜。我从 去年春到今年春，在日本一年，即便这期间，这种电话中的长谈 也没有中断。电话交谈与书房里的促膝谈心毕竟不同。在谈到 “莫谈国事”的“国事”时，其中的“关键词”常用代号，双方并没有

8当知识遇上信念

任何约定，却一说就懂。对“国事”，潘老师有着深切的关注，也 常有精彩的分析。他闲谈中对“国事”的议论，常让我想到当年 《大公报》上的社评和“星期论文”，让我想到张季鸾的《南征北伐 可以已矣》、想到胡适的《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想到王芸生 的《看重庆，念中原》……只是如今没有《大公报》，他的这些看 法，只能作为“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对我这个学生发表。

去年3月中旬，我赴日本前去了一趟上海，算是去向他辞 行。仍然是从下午谈到深夜，仍然是他迈着因喝酒稍多而略显 踉跄的脚步把我送出小区，仍然是希望我多住几天。第二天吃 过早饭，我在招待所房间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开，他忽然推门 进来了。我稍稍有些惊讶。因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在 沙发上坐下，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说：“抽支烟再走。”我于是 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两人隔着茶几，抽了一支烟，又抽了一支 烟，他站起身，说:“走吧，晚了赶不上车。”于是一同出门，站在路 边等出租车。直到把我送上车，他才转身回去。今年3月底，我 从日本回来。一回来便杂事缠身，只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原想 暑假去上海，也准备了一肚子的日本观感要对他说。然而，5月 初便得到他住院的消息。再见他时是在病房里。当医生表示回 天无力时，我才悟到，去年\_3月我去上海，其实是最后一次与他 促膝长谈。而他莫非冥冥中有什么预感，才有那多少有些反常 的行为？ 20年间，与潘老师的交谈，是我生活中一份特别的快 乐，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因为这种交谈从学生时代一直继 续下来，我便始终没有找到“毕业”的感觉。现在他走了，也把我 的这份快乐和享受带走了。而我，也真的“毕业”了。

8当知识遇上信念

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越不知如何说他。关于潘老师，我可 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我觉得，最不应该忘记说的，是他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个老年知

识分子的群体，构成思想文化界的一道金色的风景。这群老人， 人生经历各各不同，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也曾差别甚大。但在 步入老年时，他们却在精神上走到了一起。促使他们站到同一 精神立场的，首先是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这 种“人间情怀”又使他们坚信人类的共同价值。他们从不同的侧 面，以不同的文字方式，呼吁着、抗争着，执著地表达对自由、民 主和科学的追求。在别人含饴弄孙的时候，他们艰难地担当起 启蒙者的使命。他们与知识文化界那类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领 头羊”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知识文化界那类“过于聪明”的人形 同水火。某种意义上，不妨说这是一群过于呆傻的人。但这群 老人,是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宝贵财富。潘旭澜老师是这群 老人中的一员。步入老年后，潘老师在精神上给人以强烈的越 活越年轻的感觉。退休后，他本来有许多写作计划。有些题目 已准备得很充分。例如，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对《儒林外史》情 有独钟，早想写一部《吴敬梓评传》，这方面的资料他搜寻了几十 年，早就不成问题了。再例如，他对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 有许多自己的看法，早想写一本《中国当代文学通论》，主编《新 中国文学辞典》，某种意义上是为撰写通论作准备。但他让心爱 的吴敬梓靠后，也让《中国当代文学通论》靠边，先写起了《太平 杂说》，这完全是因为关于“太平军”的“杂说”更具有现实意义, 更能表达他对现实的关怀，或者说，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忍人之 心”。当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现代教育家被普遍肯定时，他 觉得不应该忘记罗家伦的贡献。因为罗家伦当过近十年中央大 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南大百年校庆时，他多次来电话，询问 我在校庆中是否提到了罗家伦，怎样评价了罗家伦，并嘱我代为 搜集校庆中出现的有关罗家伦的资料。后来，他写了《〈玉门出 塞〉及其他》一文，对罗家伦给予了公允的评价。这篇文章在广

8当知识遇上信念

东的一家刊物发表后，罗家伦的女公子从美国来信，表示了由衷 的感激，并因大陆开始公正地评价罗家伦而改变了对大陆的看 法。当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映后，潘老师颇为义愤。他不能 容忍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歌颂一个臭名昭 著的暴君;他不能容忍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如此肆无忌惮 地蔑视人类的共同价值。于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写了《什么 〈英雄>》一文，对电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他住院期间，在他 辞世前的那段日子里，他对自己的病不谈、不问。谈的、问的，仍 是关乎袓国前途、民族命运的问题。在这期间，他的学生们从全 国各地，一次又一次地赶到病床边。日本的小林二男教授(他曾 在复旦进修)和安本实教授(他曾在大阪听过潘老师的课）闻讯 也赶来了。他们并未约定，但都在6月16日这天下午来到了病 床边。其时潘老师谈吐已很吃力了，说话断断续续，口齿也很不 清楚，有人来看他，都要家人“翻译”。然而，这天，他对着日本的 两位教授，字字清晰地问道:“现在日本有一种‘中国威胁论’，你 们这二位知华派怎么看？”我惊异于他忽然说话如此“正常”，更 惊异于这位清楚地知道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的老人还在关心这种 问题。有一天，他正处于昏睡状态，鼾声大作。我与陪护的潘向 黎的先生刘运辉坐在床边闲聊。为怕惊醒他，我们的声音并不 高。闲谈中，刘运辉说:“现在各地大学的‘百年校庆’，闹得太过 分了。”我说.•“是呵，完全是劳民伤财，也是今天的‘怪现状’之 一，这时他忽然大声说道：“这个‘百年校庆’，是应该狠狠地 批! ”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仍然闭着，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 动作,只是鼾声骤停。话音一落，鼾声又接着响起。——这一 刻，我感到了骄傲。我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选择了这样一位导师 和被这样一位导师所选择而骄傲。

潘老师所置身其中的这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是这个时代

8当知识遇上信念

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精英。这些年，这群老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离 去，像金色的叶片在一片接一片地凋零。在老中青三代知识分 子都普遍在庸人化、犬儒化的今天，这些老人的离去，是真正意 义上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份“人间情怀”，使潘老师在活得充实的同时，也活得痛 苦。“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不容易活得开心。他曾对 我说:“从世俗的角度看，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但要换个角度，也 可以说如同生活在地狱里。”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这一辈 子都是苦多乐少的。七十几年，不算怎样的高寿，却已经大大超 过他年轻时的预期了。在准备潘老师的追悼会时，大厅正中的 挽联，师母命我来做。我凑成这样一副：

8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里苦着呢！熬到今天真不易，总在盼盛世；

那边好些吗？遇见故人且尽欢，毋须说太平。

潘老师走了。一双深切地关注着我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在读书做学问上，没有谁比他更对我知根知底，也就没有谁的关 注比他更到位。这么些年，他每读到我什么文章，每收到我寄去 的书，总要打个电话，谈谈他的看法。当然不只是我。他对所有 的学生都深切地关注着。平时通电话时，他常常要介绍师兄弟 们的情况。谁发表了什么文章，谁出了本新书，谁的职称解决 了，谁住进了新房……我知道，这些，都足以令他喜形于色。从 电话里就能听出，他一定又多喝了几杯。他还有一癖。每当有 学生与他同一期刊物发表文章，他便分外高兴，称之为“同台表 演”。如果学生文章的位置比他更显著更重要，他的高兴就成几 何级数增长。有时在电话里说起这种事，我感觉到，他在电话的 那一头差一点就要手舞足蹈了。陈思和先生在《告别潘旭澜先 生》一文中，说他“心地其实很天真”，这大概可做一种注脚。这么些年，如果说我还不至于过于怠惰，原因之一就是不愿意令他 过于失望。现在，我就是发表了再令他满意的文章，出版了再令 他满意的书，也等不来他的一个电话了。想到这一点，心里空了 许多。感谢杨苡老人在得知我的导师去世后打来安慰的电话。 她老人家说:“既然是老师嘛，那就应该多写点东西。”我明白，她 老人家是在提醒我，对老师最好的纪念，是做出尽可能多的成 绩。这也让我意识到，潘老师仍然在深切地关注着我，只不过换 了一个地方。

我仍然找不到偷懒的理由。

2006年8月4曰

8当知识遇上信念

写出的与未写出的

《潘旭澜文选》编后

此刻，潘先生正躺在上海新华医院的病床上，与病魔抗争 着。众多潘先生的学生，闻讯从天南海北赶到了上海。本来就 痩得令人心酸的潘先生，现在更痩得令人心痛了。看着病骨支 离的老师，除了祈求之外，我们都想为他的康复做点什么。然 而，我们这些医学的门外汉又能做什么呢？

8当知识遇上信念

而对着我们这些病床边的学生，潘先生以断续的、听起来已 颇有些吃力的声音，仍然谈的是学问。我们都知道，学术文化在 他心目中有多么重。于是，我们想到，从潘先生公开出版的著作 和发表的文章中，精选一部分，汇集出版，或许可以让他稍稍高 兴一下。——我们之所以是想到出选集而不是那种多卷本的全 集式的文集，是因为潘先生曾多次表示过对此种做法的非议;并 多次表示，自己只希望出版一种选集。

在师母和潘先生女公子潘向黎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快速完

成了编选工作。不过，重读潘先生的一些文章，我们感慨良多。 其实，与病魔周旋，与死神对峙，在他，这远不是第一次。可以 说，从刚成人时始，潘先生就长时期生活在从生到死的临界点 上,只是“文革”落幕后，生存状态才渐有改善。收入本书中的 《剪不断理还乱》《无声弦》等散文，多少透露出个中消息。

这是离开故乡到上海上大学时的潘先生:“逢站便停的慢车 上，有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像茎弯曲而枯黄的野草。他一两年来 时常十二指肠出血，大口大口地吐腥味‘柏油’。那是灵魂被辗 压、撕咬的结果，可他自己一直误以为经常饥饿得了胃病。穿着 临走前母亲给补好，显然太短的黄卡其衫。母亲不识字也不曾 出远门，但母爱的神经使她察觉那些盯住儿子的绿眼睛，感受到 能将儿子压成肉泥的空气。”

8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是“文革”期间的潘先生:“‘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楸出来， 有人说是抛出来……有一天，在听一个‘革委会’头目作报告时， 胸腹疼痛不断加剧，连那头目说‘革命的吹吹拍拍有什么不 好？！’也没心思暗笑了。擅自离场去找医生，连个值班的也没 有。只好独自回寝室。痛得冷汗淋漓，内衫全湿。随后连挪动、 呻吟也不能了，呼吸时胸腹乃至背部都像火烧、刀剜。三小时后 被同事发现，急送医院。很快诊断出来：十二指肠穿孔，引发腹 膜炎。‘腹肌呈木板样强直’。于是抬上手术台，六位医生、护 士，操作了五小时。随后得知，倘再延误两小时到医院，就没法 治了，得进‘铁板新村’。”

这还是“文革”时期的潘先生：“严重的肝癌嫌疑，使我得以 离开‘干校’。没有生的欢乐的人，对死也就无所畏惧。但不愿 这么早死去。当我愈是相信江青们必将被历史送到他们应该去 的地方时，便愈渴望亲眼看到这一天。‘要活下去！’这简单而执 勘的意念，支持我拒绝去阎王爷那里报到，摇摇晃晃地继续着生

命的旅程。”

既然相信当年是凭着“要活下去! ”的执拗意念令死神却步, 潘先生就会再试一次。躺在病床上的潘先生，虽然躯体已瘦弱 不堪，但精神仍一如既往地强悍。我们知道，这位倔强的老人， 又一次向死神扔出了挑战的白手套。如果说，当年，“要活下 去！”的动力，是想亲眼看见江青们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么， 现在，“要活下去!”的动力，则是想写出那些早就想写的东西，完 成那些酝酿了很久很久的计划。

应该说，潘先生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很不算少了。但以他的 勤奋，本来应该写出更多。潘先生决非率尔操觚的人，他的写作 态度甚至是过于认真了。这是他不能更多产的原因之一。从青 少年时代健康即被摧毁，是不能更多产的另一种原因。但更重 要的原因，则是思虑过度。越是那些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越是 那些他最渴望写也认为最应该写的东西，他越是迟迟不能提笔^ 潘先生写出了决不能算少的东西，但那些他最想写的东西却始 终没有写。这些东西甚至在他心中存放了数十年，在他心中被 翻来覆去地掂量了数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思虑过 度，其实是一种“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表现。从青少年时期开始 的长久的磨难，严重损伤了他的身体，也在他的精神上留下了终 生未能愈合的创伤。熟悉潘先生的人都知道，潘先生的语速特 别慢，好像每一个字都要在脑子里转几圈才肯吐出。如果以为 这是潘先生与生倶来的习性，那就错了。恰恰相反，潘先生生来 的语速是极快的，远比常人快。如果你听过潘向黎说话，你就能 想象出潘先生曾经的语速有多么快。然而，一言不慎即大祸临 头的时代，使潘先生养成了字斟句酌的说话习惯，而且这习惯一 经养成，就不可逆了。明白了潘先生为何说话那样慢，也就明白 了他那些最想写的东西为何一直没有写。

8当知识遇上信今 ^

不过，潘先生毕竟留下了不能算少的文字，毕竟留下了这部 选集。我们想说，这部《潘旭澜文选》，对得起任何一位有质量的 读者。

2006年6月11日

89当知识遇上信念

学者之怒与诗人之忧

说说何满子与邵燕祥

把何满子与邵燕祥两位先生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刚刚连着 读了他们的最新杂文集。何满子先生的杂文集起名《零年零 墨》，收入的是作者写于2000年的文字;邵燕祥先生的杂文集叫 做《无权者说》，也是作者2000年文章的结集。虽说把两位先生 的书放在一起读纯属偶然，但读过之后，却自然对二者做了一点 比较。

9当知识遇上信念

何邵两位先生都是当代有大影响的杂文家。在文章的取材 立意、布局谋篇上，各自有着鲜明的特色，差异很大。但读了他 们的最新著作后，我首先感到并为之感动的，是他们都有着一颗 赤子之心。杂文的别名是“批判”。在对荒谬、丑恶的现象，在对 有违现代文明的言行的批判中，杂文显示出了自己的价值。杂 文式的批判是一种日常性的批判。这种批判，首先要求作者对 种种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高度的敏感，而这种敏感的产生和保持，则需要作者始终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所以，一个好的 杂文家，尽管需要有文化修养、人生阅历等方面的条件，但有一 颗赤子之心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而在现今的社会文化生活 中，要每日每时地保持这种赤子之心，是很难的。这不是因为值 得批判的东西太少，而是因为值得批判的东西太多。“入鲍鱼之 肆，久而不闻其臭。”当令人愤怒、忧虑的东西太多时，当值得谴 责、批判的现象触目皆是时，人容易变得灰心、麻木、冷漠，并不 知不觉间随波逐流、和光同尘起来。这不妨称之为“鲍鱼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鲍鱼效应”在文化界的不少人身上 都有表现。但毕竟也有些人虽久处鲍鱼之肆却始终恶闻其臭， 并执著地把对鲍鱼之臭的感受和批判表达出来。何满子和邵燕 祥，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在《零年零墨》的“前记”中，何 满子写道:“如果真能换个脑袋,那我宁愿能换上个狗头也好，以 便对那些专找阴骘残忍的清朝皇帝如雍正、乾隆之类讴仁颂圣 的畅销小说和影视片也一律汪汪叫好;对那些诱导人心向往于 专制时代锢(除)暴安良的奇人的武侠小说摇尾献谀;对那些以 紫夺朱地散播庸俗趣味而夸称‘艺术’的玩艺举前爪鼓掌……总 之，以便追随那些识时务、善浮泅于‘新潮’的学者教授，善赶卖 点热点的报刊编辑们和电视主持们，共襄促进文化快速滑落的 盛举。”所谓“宁愿能换上个狗头”，也就是宁愿能把那颗赤子之 心换掉。这当然是愤激之言。但也说明，正是这颗不能换掉的 赤子之心，使得何满子不能在种种荒谬丑恶的现象面前闭上眼 睛，背过身去，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何满子是这样，邵燕祥也 是这样。

何满子原是治文史的学者，有多种学术专著问世。他的杂 文也处处显出学者的底子，学者的眼光。在取材上，何满子更多 地关注文化问题，对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评说较多，更多地具有

9当知识遇上信念

文艺和文化批评家的色彩。在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表达观点的方 式上，何满子具有更强的学术性，在批评一些文化现象时，他习 惯于以古观今，即联系历史上类似的现象及其结局展开论述，这 使得他的文章往往具有一种学理上的说服力。但在表达自己的 观点时，何满子却显得更为尖锐、泼辣，对批判对象更不留情面。 读何满子的文章，常常感到那种抑制不住的愤怒。邵燕祥原是 诗人，有多种诗集问世。把诗歌引进杂文，似乎是他自觉的追 求。这使得他的杂文具有一种难得的诗意诗性，或者说，具有一 种灵性。这种特色，从具体的遣词造句到整体的布局谋篇，每每 有所体现。读邵燕祥的杂文，在明白某种道理的同时，往往还能 感到一种艺术性的享受。作为诗人，邵燕祥有着强烈的社会关 怀，他的诗情诗思总是被某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所引发。 他的杂文仍然保持着这种特性。在杂文的取材上，邵燕祥更 多地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更多地具有社会批评家的色彩。与 何满子的尖锐、泼辣相比，邵燕祥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显得 锋芒更为内敛，更多的是绵里藏针而不是剑拔弩张。读邵燕 祥的文章，常常感到的是那种对于国计民生的殷忧。我还想 说，邵燕祥的杂文，常常具有一种既让我钦佩又令我悲哀的 “机智'他时常并不把自己的观点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通 过对比等手法，绕着弯子，曲折地、隐晦地说着自己想说的话。 《无权者说》中的那篇《面对历史的尴尬》，便是一个例子。读 邵燕祥这类“机智”的文章，我总有着会心的苦笑。我觉得，这 种“机智”，并不仅仅是“文贵曲”的观念使然，并不仅仅是一般 意义上的为文之道的表现，而是有着明显的病蚌成珠的意味。 换句话说，这种“机智”，与其说表现的是诗人的匠心，毋宁说 表现的是文人的无奈。

邵燕祥为自己最新的杂文集起名“无权者说”，言外之意，应

9当知识遇上信念

该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表现的是邵燕祥、何满子这 类杂文家内心的更大的无奈。读何满子、邵燕祥的两本新著，我 时时想到两句古诗:“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心中万古刀。”

2001年8月6日

(何满子：《零年零墨》和邵燕祥：《无权者说》均为 福建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瞻顾文丛”之一种。)

93当知识遇上信念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头颅早悔平生贱”

9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与其有过诗词唱和者，只有郭沫若、柳 亚子与周世钊三人。在民国时期，柳亚子就是活跃于政界和文 界的大名人。但民国时期的名人，许多人在1949年后都遁迹销 声，而柳亚子却知名度更高了，这要归功于与毛泽东的诗词唱 和。毛泽东的《垸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 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所有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有个 柳亚子。在使得柳亚子具有广泛知名度上，毛泽东的另一首诗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粵海未能忘”）也同样功不可没。 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圣经”，柳亚 子也就跟着家喻户晓了。毛泽东诗词中的有些句子，更成为众 口传诵的“名句”，与毛泽东的那些著名语录一样，频频被人们在

谈恋爱、写情书、发言、谈话、辩论、写文章等各种公私场合引用。 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和《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中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便都 是这样的“名句”。尤其是后者，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 风雷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毛泽东的其他“名句”一起，被出版社作 为对联印刷出版，在各地“新华书店”销售，从而被贴在各种可以 贴对联的地方。

知道“牢骚太盛防肠断”这“名句”出自毛泽东之手的人，大 概都知道这句诗本是针对柳亚子的“牢骚”而作。既然被毛泽东 称为“太盛”，可见柳亚子的“牢骚”颇有力度。但这“牢骚”的具 体内容为何，却始终是悬案。少数知情者的闪烁其词，更让这 “牟骚”带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9当知识遇上信念

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从香港辗转来到北平。其时， 大批在国共相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人士”，在中共号 召和安排下，云集于此。他们是被中共邀请来协商召开新政 协的。以柳亚子此前的政治表现和社会声望，以柳亚子与毛 泽东“老朋友”的关系，当然在被邀请之列。柳亚子与黄炎培、 章乃器、钱伟长等数十人，同住六国饭店。1〇天后的3月28 日夜，柳亚子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见柳亚子《磨剑室诗 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所引柳诗，均见该 书）。全诗如下：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惮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首诗，第一句意思很明白，是在称颂毛泽东“开天辟地”的 壮举。第二句便开始发“牢骚”了。“说项”即称誉他人之意，这 里应指自己长期对共产党的拥护和襄助。“依刘”则指投靠他 人。典出三国时期王粲依附刘表却又不受礼遇不被重用的故 事。“说项依刘我大难”，意思就是说：我长期站在共产党一边， 为共产党尽心尽力，如今却像依附刘表的王粲一样受冷落，我实 在受不了。第三句用了两个典故。“夺席”指夺取他人的席位。 《后汉书•戴凭传》:“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光武)帝令群臣能说 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 余席。”五鹿为复姓，这里指西汉的五鹿充宗。《汉书•朱云传》 说：五鹿充宗深得汉元帝的宠信，占据着谈经的席位。元帝令 五鹿充宗与其他人辩论，但其他人慑于元帝对充宗的宠信而“莫 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后来充宗终于败在朱云口下。柳亚子 将这两个典故同用，意在说明自己是像戴凭一样有真才实学而 非像五鹿充宗那样不堪一击。第四句用的是《史记•孟尝君传》 中冯驩慨叹“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熟 典。第五句“头颅早悔平生贱”，是“早悔平生头颅贱”的倒装句， 意思是说：我后悔平生为了你这个朋友、为了共产党人的事业 而不计生死，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牢骚”就发得有点咄 咄逼人、不知轻重了。柳亚子也知道这一句算是把话说兜底了, 只能退不能再进了，于是有了第六句的语意转折。“肝胆宁忘一 寸丹”是“宁忘一寸肝胆丹”的倒装句，意思是说：我对你这个朋 友、对共产党，仍是一片赤胆忠心。第五句和第六句意思多少有 些矛盾，或者说，第六句的转折有些突兀，但其实正可以看出柳 亚子写此诗时的真实心态。柳亚子此时心中有着巨大的委屈， 有着严重的不平衡。他给毛泽东写此诗，要表达这种委屈和不 平，但表达委屈和不平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引起毛泽东

9当知识遇上信令心

的注意和同情，从而做出对他有利的干预。要引起毛泽东的注 意，就要把话说得狠些；要让毛泽东同情并干预，又不能只说狠 话，还要表示“此心未改这样，就有了第五句的“悔”和第六句 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最后两句是说：什么时候共产党的军队 占领了我的家乡，我就要回到那里，像严子陵那样隐居了。分 湖，是柳亚子家乡吴江县的一座湖。为怕毛泽东不懂，柳亚子在 诗后特意做了说明。这等于是在让毛泽东做出选择：要么满足 我的愿望，要么让我撂挑子走人。当时，毛泽东正忙着建立新的 政权，是很需要柳亚子这样的著名“民主人士”合作的。柳亚子 如果真的拂袖而去，那负面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当然 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就要满足柳亚子的实质 性要求。既要稳住柳亚子，让他继续为新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发 挥作用，又不让柳亚子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这是其时的毛泽 东必须做到也不难做到的。

柳亚子诗的最后两句，有着明显的撒娇意味。其实，这整首 诗，与其说是在发牢骚，毋宁说是在撒娇。正因为是在撒娇，所 以“分湖便是子陵滩”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毛泽东当然体味 到了这种撒娇之意，所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并不需要实质性地 满足柳亚子的要求，就能稳住他。

9当知识遇上信念

“倘遣名园长属我”

毛泽东3月25日到达北平，柳亚子28日便写了这首诗。 那时的毛泽东，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所以并没有 马上理会柳亚子的牢骚。查柳亚子日记，可知这期间，柳亚子 火气越来越大。例如，4月7日日记写道:“以后当决心请假一 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4月25日，柳亚子从六国饭店搬到了颐和园 内的益寿堂，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搬出六国饭店而移到更好 住处的，并非柳亚子一人。柳亚子4月25日日记写道：“寰老 (引按•.即俞澄寰)言明日亦将他迁，圣陶、墨林、云彬、彬然来辞 行，言今天上午即走，从此六国饭店，将成云散风流之局面 了，®可见当时有许多人都被重新安排了住处，并非因为柳亚 子发了“牢骚”而对其特别照顾。但柳亚子能入住条件特别好的 颐和园，却又不能不说因发“牢骚”而受到了特别的安抚。4月 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并派秘书田家英送 给柳亚子。全诗如下：

饮荼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9当知识遇上信念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的和诗，比柳亚子的原诗要好懂得多。1926年四五月 间，毛柳相识于广州，第一句说的即是此事。柳亚子在1941年 《寄毛润之延安》诗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之 句，故毛泽东有“饮茶”之语。第二句说的是1945年“重庆谈判” 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事。在重庆（旧称渝州），柳亚子曾向 毛泽东索诗，后来毛泽东手书了园舂•雪》寄柳亚子。这两句 以忆旧的方式表明自己并没有忘记老朋友，表明自己还记得二人 间的交情。第三、四两句，说的是眼前的事。毛泽东于1918年初 次到北京，1949年回来，相隔31年。“读华章”则指读到了柳亚子

1. 柳亚子：《北行日记》X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同上。

发“牢骚”的诗。只是“落花时节”有点费解。柳亚子发“牢骚”的 诗，写于公历的3月，相当于中国旧历的“早舂二月”，正是百花初 发之时，不知毛泽东何以称之为“落花时节”。第五、六两句，语浅 意明，不用解释。第七句的昆明池即柳亚子正居住的颐和园中的 昆明湖，富春江是严子陵垂钓之地。因柳亚子发“牢骚”的诗中有 学严子陵归隐之语，故毛泽东说昆明湖“胜过”富舂江。

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只是说了些气话，看不出他具体的诉 求。但知情者的回忆，却让人觉得柳亚子不仅仅只给毛泽东写 了这首诗，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曾彦修在《关于柳诗“牢骚”问 题致编者》一文中说：

9当知识遇上信念

对于此事（引按：柳诗“牢骚”事），我也有一个比 较可靠的资料来源，这便是田家英同志（毛主席的秘 书，当时常在毛柳之间传送书信、诗稿等），当时即对我 闲谈过这件事。1949年3至6、7月，进城后我住在北 京西郊香山上。当时每饭都要在大食堂遇见田家英同 志，因系老熟人，他有时也偶把一些无关党和国家机密 的艺文琐事对我闲吹之。有一天，他好像是下山去送 毛主席答柳亚子先生的诗回来，晚饭后同我一起散了 一会步，他极力称道毛主席最近做了一首好诗，并把这 诗念给我听了，这就不能不顺便解释一下“牢骚”所指

何事了 但田已不在人世，我无权公开私人间的闲

谈；同时我更无权径谈此事。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只能 对读者表示歉意。现在知道此事内容的人固然不会太 多了，但我估计也不会太少。现在把田家英同志对我 谈的事情，抽象地、原则地谈谈，我想还是可以的…… 据田告诉我，诗里谈的完全是有关柳亚老任职的

事。柳要求解放江南后，到江南某地方任职。当时中 央领导诚心挽留他，认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以柳老 之身份、名望，自然以留在中枢任职为好。这一点，我 们只要认真反复细读柳、毛之间的赠答诗，也可以多少 体味出来。赠答诗的关键，都是末联二句，这里已明显 地反映出柳毛二人谈的是柳亚老的出处问题。柳诗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是说的气话（全诗 都是说的气话），是说解放江南后，他就想回老家江苏 吴江县（分湖在吴江县境）去归隱了。柳在这首诗中语 气都是很重的，当然是有大不快的事存于心中……①

柳诗“牢骚”一事，既然已成学术问题，知情者实在应该知无 不言，不必顾忌的。不过，从曾文的欲说还休中，我们至少可以 肯定：柳亚子当初向毛泽东提出了到江南“某地方”任职的要 求。这“某地”，就是柳亚子的故乡江苏。以柳亚子罕见的狂傲 和自负，这职务的要求，决不会很低，应该是江苏省的主要领导 吧。用老话说，就是“封疆大吏”了。

20当知识遇上信念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满足柳亚子的要求，但自己愤言相逼，毛 泽东却温言相劝，还是一时间令柳亚子很兴奋和激动。柳亚子 当即又写了《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毛泽东诗最后两句，说昆明湖比富舂江 好,意在劝柳亚子打消归隐吴江的念头。归隐、云云，本就是“气 话”，毛泽东一挽留，柳亚子便表示欣然从命，实在可说是就坡下 驴。但他似乎又抓住了毛泽东诗的最后两句不放,《次韵奉和毛 主席惠诗》最后两句是：“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颐

①曾彦修：《关于柳诗“牢骚”问题致编者》，《随笔》1994年第6期。

和园是暂住之地，这是十分明确的。但柳亚子却大有在此安居 之意。如果说这两句还不足以说明想要长住下去，那《叠韵寄呈 毛主席一首》的最后两句，却把这意思表达得很充分了 ：“倘遣名 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怎样解释这两句，也存在着争议。一种解释是：柳亚子要求 毛泽东把颐和园送给他。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是很自然的。所 谓“长属我”，当然就是“从此属于我”的意思。把这两句诗翻译成 白话，那就是：“如果这颐和园从此属于我，我就不想归隐吴江 了。”如果柳亚子真有此意，那就不仅是就坡下驴，同时又在顺竿 上爬了——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但柳亚子的一些亲友 却不同意这种解释。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三人共撰的《我们的 父亲柳亚子》一书中就说：柳亚子这样写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 之意。‘文化大革命’时听说有人用以上诗句批评我父亲，说他向 毛主席‘索取’颐和园，可谓奇谈、趣闻”®。说柳亚子这些诗句的 意思仅仅表示要定居北京，是不能服人的。也许柳亚子的确没 有独占颐和园之心，但长住此园之意，却是肯定有的。

⑴当知识遇上信念

即便柳亚子想要独占一座颐和园，也决非不可思议的“奇 谈、趣闻”。下面我们将看到，比起柳亚子的其他一些奇思妙想， 一座颐和园，真不过小菜一碟。

“诗人毕竟是英雄”

柳亚子生于1887年，长郭沫若5岁，长毛泽东6岁。从少 年时期起，柳亚子就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反清的

①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9 年版，第132页。宣传活动。1903年，在上海参加由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爱国 学社”；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1909年，与高 天梅、陈去病等共同创立了“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 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 长，也算是一省的政要。柳亚子是国民党内强硬的左派，在国共 相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

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柳亚子却自少年时代起，就有着异常 强烈的“英雄情结”。在柳亚子诗中，“英雄”二字，出现的频率是 很高的。金石家曹立庵在回忆柳亚子时，说起过这样一件事：

亚子先生对共产党人充满了信任和热爱，而对国 民党的达官贵人则深恶痛绝。记得是在1945年秋的 一天，亚子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带我一同上街溜达，走到 重庆一座著名的酒楼前，只见出入酒楼的，都是些达官 权贵。亚子先生十分气愤，有意拉我们坐在酒楼对面 一处卖牛尾汤的小摊前喝黄酒。当时，亚子先生和郭 老早已是海内知名诗人和社会贤达，他们的这一举动， 无疑是对那些达官权贵的无声嘲弄和谴责。亚子先生 数十年攻诗，出口成章。那天，当他边喝黄酒边抨击时 政，并颇为自己敢于同那些丑类斗争而感到自豪时，不 觉脱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对亚子的道德文 章历来推崇，赞应曰：“诗人毕竟是英雄！”我在一旁，深 为两位长者的斗争精神所鼓舞，许诺说，我要为这副 “联句”治枚印章，明天交卷。第二天上午，柳、郭二老 便来我处看印章。走前，亚子先生书赠我一首诗，郭老 为我作了一幅指画。此后，这枚“联句”印章便常见于 亚子先生的手书诗文条幅。如1945年冬，他书赠给本

?0当知识遇上信念

村的诗条幅首端，就盖有这枚“联句”印章。①

“诗人毕竟是英雄”虽出自郭沫若之口，却极为柳亚子所欣 赏，不但常钤于手书条幅，还数次用于自己的诗中。从这一点也 可看出，柳亚子一向是以“英雄”自命的。郭沫若脱口而出的“诗 人毕竟是英雄”之所以令柳亚子喜爱不已，还因为它与柳亚子家 传的另一句恰成对照。柳亚子曾写过《“英雄末路作诗人”两 首》，诗前有序云：“余家旧藏石印，文曰：‘英雄末路作诗人’，盖 乡前辈杨龙石先生为高袓粥粥翁所治也。”原来，柳亚子高袓就 有怀才不遇的牢骚。这两首诗的第二首，是以这样两句开头: “英雄末路作诗人，青兕前生旧姓辛。”“青兕”是辛弃疾的别号， 也是柳亚子的笔名。这分明在表示，即便不能在安邦治国上建 功立业，最终只能以作诗遣怀，那也是时运不济，而自己终究是 如辛弃疾一般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豪。不过， 对这种“英雄末路”的“认命”，在柳亚子那里只是偶尔出现的。 更多的时候,他愿意相信自己在叱咤风云、降龙伏虎。“诗人毕 竟是英雄”这句话之所以令他如此喜爱，就因为说出的是他的心 声。抗战期间，郭沬若曾把柳亚子比作屈原，而柳亚子却并不认 可:“‘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 作怀沙抱石看。”(《苏联费德林博士乞诗，奉赠两绝，十月二十八 日作》)柳亚子认为把他比作怀沙抱石、自沉汩罗的屈原，是辱没 了他。他觉得冤枉，他感到委屈。他认为自己在拔山盖世;他认 为自己在匡时济世;他认为自己在回天救世。

20当知识遇上信念

自认为力能回天的柳亚子，以“英雄”自命的柳亚子，性格中 最突出的特征，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狂。读柳亚子诗文，

①曹立庵：《“诗人毕竟是英雄”——忆柳亚子先生二三事》，原载《书法》1979 年第2期，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最大的感受就是狂气冲天。例如柳亚子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诗: “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 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尽管 中国的柳亚子与德国的尼采风马牛不相及，但柳亚子在诗文上 的这样一种自负和狂傲，还是让我想到了尼采。这样评价自己 的诗文，也许真只有尼釆可与之相比。

但尼采的狂仅仅表现在对自我文章的评价上，而柳亚子则 在政治层面上也狂气逼人，认为自己是时代最前驱，在安邦治国 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才华，这就令尼采相形见绌了。 “若论时代前驱者，亚子先生第一人。”(《改邓煜诗两首》)不仅在 写诗上是第一，在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上，也是“第一”的。1940 年，柳亚子写过一首《纪梦》诗。诗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 夜梦在莫斯科谒斯大林同志，劝其乘德英龙战之际，先定远东。 其策以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四省，代中国 收复失地，则中苏邦交自然巩固矣。国际局势自有其中心政策， 友邦领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岂外人所宜越俎代谋？存此聊 以志书生之狂呓尔。”居然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告 诫斯大林、教诲斯大林，也真4谓狂人自有狂梦。俗日有所 思，夜有所梦。柳亚子能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梦，也足见其平时 内心的狂态。实际上，柳亚子是真的这样想过。他后来回忆写 这首诗的背景时说:“这时候，实际上还远在德苏开战以前，我很 想自己去莫斯科一次，亲谒斯大林元帅，凭三寸不烂之舌，扮一 出哭秦庭申仓胥呢。” ©这也可谓狂人自有狂想。值得一说的 是，柳亚子是自知其狂，并且也常常自知其谬的。但这种“自知

20当知识遇上信念

1. 柳亚子：《我的诗和字》，《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柳亚子：《八年回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兆6年版。

之明”却又并不足以阻拦他那些气冲霄汉的狂语。读柳亚子诗， 你会觉得他时时有一种说豪语、放狂话的冲动。这回，梦醒之 后，他虽也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但仍要写下这样的诗：“轰炸千机 毁日京，红军百万定辽宁。男儿愧负仪秦舌，寰宇何年见太平。” 他自以为有张仪、苏秦之才，为不能真的去面谏斯大林而遗憾， 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柳亚子在1949年3月到北平，此后的一段时间，几次自称 “狂奴”。“狂奴故态今犹昔，国策方针定岂摇。”(《三月二十一曰 夜听罗迈部长报告时事问题有作，君即渝沪时代之李维汉也》）; “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赠邓子平》）；“自笑狂奴 藐馀子，天生名德护微功”(《叠韵和徐冰两首》）。“狂奴故态”云 云，也是典出严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本是同学，他敢于对当了 皇帝的刘秀不敬，被刘秀称作“狂奴故态”。而严光之所以能做 到并不因为刘秀当了皇帝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他决不想 在刘秀一朝走上仕途，甚至刘秀再三邀请，也不改初衷。这可谓 是“无欲则狂”。而柳亚子却对从政无比热心，对官位有很高的 期待，所以以严光自况，其实是拟于不伦。既想仕途得意，又不 改“狂奴故态”，就只能走向“末路”了。

?0当知识遇上信念

“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

柳亚子的狂态，当然在与毛泽东的应对中，表现得最醒目。

柳亚子与毛泽东于1926年四五月间，相识于广州。其时，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身 份出席大会。在这期间，他对蒋介石的反感达到极点。在与共 产党人恽代英会面时，他力劝共产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 石。恽代英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需要留着他打仗呢r®其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 柳亚子与毛泽东在珠江畔一座茶楼相见。虽与毛泽东是初相 识，柳亚子也向他同样提出了刺蒋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与浑 代英如出一辙可见，借助蒋介石之手，清除军阀势力，是其 时中共中央的一种决策。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党派要当共 产党的“尾巴”，柳亚子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 起》的长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义”。在这篇文章 中，他对1926年的刺蒋谋略十分自傲：

……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我是四十年来 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对苏是另一问题，现在不谈。对 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 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

?06当知识遇上信念

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 子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 州……去看亡友恽代英烈士，陈说了 一番奇谋秘计，代 英笑而不答，最后追问他，他说：“你的计划，我们不能 贊同。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 ‘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激烈呢！”我听了他这样 油腔滑调的话，很不高兴……要是当时听了我小区区 的话，‘曰中必慧，操刀必割，，又何致于弄成十年内战， 十年抗战的局面呢？当然，当时中共的领导者是亡友 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 账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

1. 柳亚子：《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奋勇前进》，《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2. 陈迩冬：《一代风骚》，《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

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 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 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罢 了。但，举此两例来证明，可见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 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小区区高明吧？所以，郭先生 的尾巴论，老实讲，我是不赞成的。①

从柳亚子此番呓语般的言论，我们庶几可以作出这样的 判断：

一、 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 就不入流。他据以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高明的，是 共产党有过两次可杀蒋介石之机而未杀。广州那次共产党方面 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令他耿耿于怀。其实，在1926年的广州， 要共产党以暗杀蒋介石的方式来“搞定”大局，无异于天方夜谭。 对此，恽代英们除了“油腔滑调”，还能说什么呢？而把“西安事 变”终于未杀蒋介石归咎于毛泽东的“忠厚”，那就真是“一部廿 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了。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 人之智。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 思维。

20当知识遇上信念

二、 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 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 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 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 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不甘于像郭沫若那样当 “尾巴”，是柳亚子后来不能如郭那般春风得意而只能牢骚满腹

①柳亚子：《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的一个原因，•而不甘于当“尾巴”，并非因为别有怀抱，而仅仅因 为目无余子的“狂”，又是他后来终究还受到相当礼遇的原因。

但《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也的确有些“过分”了，突破 了某种“界限”。不知道柳亚子写此文时是否喝了不止二两，反 正此文在柳亚子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轻视 与鄙夷，他人并不知晓。否则，柳亚子后来的牢骚，会更“盛” 的吧。

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柳亚子其他的一些言行，也足以 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柳亚子与毛泽东在广州别后，天各一方，音信隔绝。1937 年6月，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何香凝寄赠的画集和廖仲恺的《双清 词草》等物品后，致信何香凝,其中这样提及柳亚子：“看了柳亚 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 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讲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 时的政治意见如何?”®1937年6月，对于中共来说，是十分关键 的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极其必要的策略。当毛 泽东从何香凝寄赠的画集上看到柳亚子题诗时，一定想起了十 一年前在广州的见面，想起了柳亚子那时的必欲除蒋而后快。 这样的人，现在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团结的，所以毛泽东不惜以 “人中麟凤”来赞美他。不过，毕竟已过十一年，柳亚子还像当初 那样反蒋吗？毛泽东也需要探询一下。当弄明白了柳亚子狂态 依旧、反蒋依旧、亲苏亲共依旧时，毛泽东当然就要尽可能地发 挥他的作用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亲苏亲共又狂傲不羁的人， 毫无疑问是大有用的^

?0当知识遇上信念

1940年11月，柳亚子从香港写了《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其中有“云天倘许 同忧国，粵海难忘共饮茶”两句，回忆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此 后，林、徐、董均有诗作应和。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 在重庆的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 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 ‘云天倘许同忧国，粵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 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 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这 口气之亲切，或许今天还令一些人感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柳亚子第二次相 聚。其时，柳亚子正与画家尹瘦石筹备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 提议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像，自己题诗，在诗画联展展出。毛泽 东欣然应从。诗写成后，柳亚子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4 日复信柳亚子。其时，柳亚子夫人恰好因盲肠炎住院，毛泽东信 中首先便对柳夫人的病表示关心。

20当知识遇上信念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 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 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 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

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 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 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 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

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 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 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 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①

“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M当知识遇上信念

毛泽东到重庆，是为了与蒋介石谈判。从毛泽东的复信看， 柳亚子去信中，问了有关“谈判”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问非该 问，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以实情相告，只能以“前途”、“道路”之语 漫应之。虽然毛泽东并未正面回答“时局”方面的问题，但对柳 亚子诗的赞美，还是令柳亚子大为兴奋，于是又写诗赠毛：“润之 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 云，赋赠一首。”诗以这样两句开头：

瑜亮同时君与我，

几时煮酒论英雄？

第一句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周瑜与诸葛亮的 关系；第二句则又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曹操与刘备 的关系。“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虽未发出，但“今天下英 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明显。诗则以这样两 句结束：

冠裳玉帛葵丘会，

骥尾追随倘许从。

第一句是把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比作齐桓公葵丘大会诸侯， 第二句有跟随毛泽东参与谈判之意。其实，在此之前，柳亚子在 《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就有 句曰：“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这是把自己比作管 仲，如果能被齐桓公这样的人所用，就能把天下平定。在《十月 六日得润之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 中，则有句曰：“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这是说自己 沉寂多时，现在要与毛泽东一同大显一番神通。读这期间柳亚 子的这些诗句，再联系到致毛泽东信中对谈判一事的询问，不难 看出，自以为有第一流政治才能的柳亚子，在这期间是十分技痒 的，非常渴望能与毛泽东一起参与谈判，对谈判深度介入。

21当知识遇上信念

柳亚子虽多方暗示，欲介入谈判，而毛泽东当然只能装作听 不懂。但我想，在这期间，毛泽东就不但感到了柳亚子的可用， 也感到了他的难用。

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还向毛泽东索诗，于是毛泽东手 书“旧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交 柳。柳亚子写了《泌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见大雪之 作，不能尽如原意也。》这首词以这样的句子结束：

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屡作这样的豪语，一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早以诗歌颂毛泽东者，恐怕是柳亚子。1929年，柳亚子写了《存 殁口号五首》，第一首是:“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橫。人 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这首诗就是将孙中山和毛泽东 同时歌颂，称为中国的“两列宁”。在后来，柳亚子更写了许多歌颂毛泽东的诗。但柳亚子在歌颂毛泽东时，往往与别人不同。他 常常忍不住地把自己与毛泽东同时歌颂，并且是把自己放在与毛 泽东同等的位置加以歌颂。这就像是在墙上并排挂上同样大小 的两幅画像，一幅是毛泽东，一幅是自己，然后再朝着两幅像跪 拜。换句话说，他在歌颂毛泽东时，总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惺 惺相惜，总要挟带大量私货。这种很不“得体”的惺惺相惜，这种 挟带私货的歌颂，就不但会功过相抵，甚至还可能过大于功。

在歌颂毛泽东时，柳亚子有时称“毛公”，有时则称“毛郎”。 例如，1945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柳亚子应《大公晚 报》之约，赋诗二首(《十月十二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 前七日，〈大公晚报〉罗承勋索诗有作》)。其中有句曰：

?1当知识遇上信念

论定延京尊后圣，

毛郎一语奠群哗。

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在延安对鲁迅的高度评价。1945年，柳 亚子写了《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十一月廿六日》，诗中有句曰： “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 智兼神勇”。称毛泽东为“毛郎”，多少给人以倚老卖老之感，这 恐怕不仅令毛泽东，也令那时所有共产党人觉得别扭。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 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 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两枚印章，都自有出典。第 一枚，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斯大林，像 对待弟辈一样对待毛泽东。 倚老卖老的意思，在这里就表

①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原载 1981年11月1日《长江日报》，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现得很明显了。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汉末的祢衡。祢衡以狂 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 杨德袓，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柳亚子这是在仿效祢衡，但比称 衡更有气魄。上面所说的《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就是因为曹立 厂(即曹立庵)为其刻了两枚印章而赋赠曹的，其中之一，就是刻 有“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的那枚。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 “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袓。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 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 “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语，连柳亚子 自己也认为，比祢衡还狂。毫无疑问，柳亚子是在表达对“斯毛” 的欣赏和赞美，但这样一种夸人的方式，或许比骂人还令人难受。

这两枚印章，在柳亚子生前并未给他带来直接的麻烦，恐怕 在他生前知道此事者也并不太多。柳亚子再狂，在1949年后大 概也不会轻意以此示人。柳亚子于1958年辞世。为了在1%6 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〇〇周年，1963年，周恩来指示中国革 命博物馆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 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周恩来又派专人到柳家，动员家人捐赠 遗物。柳亚子家人于是将大量柳亚子遗物捐献出来，其中就包 括这两枚印章。“兄”与“弟”、“大儿”与“小儿”，在博物馆静静地 躺了三年，倒也无事。1966年7月，它们被康生发现。这样的 “敌情”当然令整人老手康生兴奋不已。他连下三道批示，称印 章“反动之极”，勒令将两印彻底砸碎，一切照片和底版销毁，并 责问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 命文化部对此事彻底追查。柳亚子本人则被作为“老反革命分 子”而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也被 打成残疾。这就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反动印章案”。幸亏柳亚 子在八年前便寿终正寝，否则，以老迈之躯而在“文革”期间死于

21当知识遇上信念

“红卫兵”的拳脚之下，岂不太惨。不过，“文革”结束后，这事也 没有一笔勾销。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时，大会 主席团决定在会上宣读一份《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 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 107人的 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0)。

以上是柳亚子的身后事，不说也罢。我们还是回到他生前。 1946年初，柳亚子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各种场合为共产党“说 项”，为共产党辩护，为共产党造舆论。1946年初，上海左翼人 士为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中遇害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召开追 悼会，柳亚子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1月28日，毛泽 东在延安致信柳亚子：

21当知识遇上信念

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 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 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词及孙女士（引按：即谭平 山夫人孙荪莶）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

归来絮语告山妻”（引按：此为柳1945年秋所写《润之 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的 两句），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 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敬颂 道安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曰②

1. 王晶垚：《纪念南社和柳亚子>,《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
2.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Q

“未必牢骚便断肠”

1949年2月下旬，柳亚子应毛泽东之邀,从香港北上。这 时的柳亚子，心情可以说是无比兴奋的。这是在途中写的《二月 二十八日有作》：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柳亚子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庄子•逍遥 游》中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柳亚 子觉得自己就是那鲲鹏，只不过庄子笔下的鲲鹏是由北向 南，柳亚子则是由南向北而已。顾盼自雄、踌躇满志之态，溢 于言表。

M当知识遇上信念

柳亚子后来的头衔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 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54年，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以“常理”度之，理论上的政治地位并不低，柳亚子似乎没有 理由不满意。但柳亚子的心态，是不能度之以“常理”的。在起 身赴北平时，柳亚子对在新政府中的地位，是怀着很高的期待 的。他后来是否满意，取决于他这种期待得以实现的程度。如 果他期待得到的与实际得到的，落差很大，他就有“理由”很不 满意。

22日，在致上海的毛啸岑信中，他写道:“弟此次押货内渡， 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其 时上海尚在国民党手中，柳亚子便使用了此种语言。“有利可

赚”云云，其实正表明了他的待价而沽。

柳亚子于1949年3月18日抵北平。北平市长叶剑英率人 在车站迎接。翌日晚，叶剑英又设宴，为柳亚子一行洗尘。柳亚 子写了《叶剑英市长来迓，賦呈一首》，最后两句是“授餐适馆何 由报，饮马长江待细论”。意思是说，怎样报答共产党的盛情呢， 只能在打过长江一事上献计献策。——他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 有共产党人所不及的奇谋良策。在共产党人中，他认为唯一能 与自己相提并论的是毛泽东，其他人都颇不足道。抵北平后，这 样的狂语，不但仍在继续，甚至要刻意如此强调。在《为韦江凡 题〈故都缘法〉册子二首》中，有句曰：

?1当知识遇上信念

除却毛公便柳公，

纷纷徐子虎龙从。

这意思是说，毛泽东与柳亚子，是一虎一龙，其他人都只配 跟在后面。那么其他人是什么呢？

在这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

一代文豪今属我，

千秋历史定称翁。

这意思是说，在文的方面，我柳亚子天下第一；在治国平天 下上，毛泽东第一。这又似乎要一文一武地与毛泽东平分秋色 了。在《次韵和平江四首》中，又有这样的句子：

留得故人遗句在，

北毛南柳两英雄。

自1935年到达陕北，毛泽东就一直在北方活动，柳亚子则 一直在南方，故柳亚子有“北毛南柳”之语。

当时的北平，各路人马云集，可谓人才济济。但柳亚子只把毛泽东一人放在眼里。在这种时刻，一再强调只有毛泽东才配 与自己比美，恐怕不仅仅表现的是性格上的狂，还表现了对未来 政治权位的期待和暗示。既然自己与毛泽东是一个档次，那在 分割蛋糕时，自己应该能得到怎样的一块呢？

但柳亚子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失望。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 香港成立，柳亚子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民革”的筹建过 程中，柳亚子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民革”在决定出席新政 协的代表时，柳亚子最初却被排除在外。一开始，“民革”可有六 人出席新政协。这名额当然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由哪六人出席， 不用说，也是由中共中央确定。后来“民革”的名额增加到十六 人，柳亚子才得以出席C。虽然最终是出席了，但柳亚子心里的 不痛快，可想而知。

?1当知识遇上信念

以柳亚子的自我估价，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应该单独召见 他，向他请教种种政治大计。但实际上，毛泽东迟迟没有与他单 独晤面。这段时间，毛泽东要一表一里地准备两件事。筹划与 国民党的“和谈”，这是“表”；积极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这是“里”。尽管柳亚子认为，这两件事他都能够和应该“掺 和”，但实际上两件事都与他无关。军事行动固然不容他置喙; 与国民党的和谈，毛泽东要找的也是李济深、黄炎培、傅作义、章 士钊这些人，不可能与柳亚子这样的人商量。看着同住六国饭 店的一些柳亚子本不放在眼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毛泽东召 见，柳亚子心里的悲凉和酸楚，可想而知。

柳亚子一到北平，就急着往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和 衣冠冢。他要求派车，却迟迟不见答复。而当时同住六国饭店

者，有人是配有专车的®。在4月1日日记中，柳亚子写道: “夜，餐时与任老（引按：即黄炎培)夫妇及寰老夫人同席，谈得 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 从这里可知，黄炎培是配有专车的。如果大家都没有车，也就算 了。可有一部分人是有车的，而柳亚子却不属“有车一族”，此事 也应给他以相当刺激。《感事呈毛主席一首》那句“无车弹铗怨 冯驩”就是这种刺激的反应。

1949年3月24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在四十二人的筹备委员中，虽有柳亚子的名字，但在 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中，却没有柳亚子的座席。七月间，文 代会正式召开后，在全国文联的领导层中，自然也没有柳亚子的 名字。虽然柳亚子最自负的是“政治才能”,但也是认为“一代文 豪今属我”的。可现在，不但政治上被冷落，在文艺上也“怀才不 遇”，怎能不让他牢骚满腹呢？这时候，他一定屡屡回忆起在国 共相争中对共产党的支持、拥护，甚至有了悔不当初的心绪。也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柳亚子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也正是在 这样的时候，他发出“头颅早悔平生贱”这样的“牢骚”。

?,当知识遇上信念

柳亚子是怀着满腔春意来到北平的，但很快心态就给人以 由春到冬之感。柳亚子的“牢骚”当然首先指向毛泽东。1949 年2月26日，柳亚子开始记《北行日记》。在这“席卷南溟向北 溟”的日子里，柳亚子在日记里自然免不了时时提及毛泽东。在 开始阶段，柳在日记里提到毛时，都称“毛主席”。但后来，“毛主 席”则常常变成了“老毛”。例如，6月19日日记中写道：“十一 时许，偕赴听鹂馆幵文研会筹备会议，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

1. 金绍先：《关于柳亚子先生——从台湾旧友来信谈起》，《柳亚子纪念文 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2. 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从 “毛主席”到“老毛”,其间心绪、情感的变化自不待言。这天日记 中所说的“文研会”，也颇值得一说。这所谓的“文研会”，全称是 “北平市文献研究会”，是柳亚子自己张罗起来的。在这样的时 候自行张罗这样的组织，似乎有点另起炉灶之意。而在这样一 个自己张罗的组织中被选为主席，竟也颇有几分得意，称为“黄 袍加身”，真让人生哀怜之心。至于要用这“文研会”来延揽“老 毛”“入我彀中”，就让人在哀怜之余,又哭笑不得了。这柳亚子 自行张罗的“文研会”，自成立后便停止了活动。在这种时候的 北平，怎么可能允许柳亚子这样的“民主人士”自行张罗组织? 张罗这样的组织本身，就说明了柳亚子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

1949年6月6日，柳亚子写了好几首诗。在《三赠刘仁同 志女英雄》中，他写道：

?1当知识遇上信念

旭曰中天防食昃，

忠言逆耳费思量。

在《六月六日在韶九胡同有作》中，则写道：

英雄惯作欺人语，

未必牢骚便断肠。

这个最早写诗歌颂毛泽东的人，终于以诗的方式表达对毛 泽东的不满和质疑了。

“不作苏俄叶赛宁”

在1949年春夏时节,毛泽东、周恩来们，对于被召来北平的“民主人士”，自有一番通盘考虑。要人尽其用，又要尽可能做到 人人满意，不在关键时刻添乱。对于柳亚子其人，毛、周自然是 了解的。不可不用、不堪大用，应该是他们对柳的基本认识，他 们也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安置柳亚子的。他们对柳的性格当然也 十分了解。其他人即便有所不满，也只会憋在心里，或充其量在 私下发发牢骚。而柳亚子以“狂奴”自诩，又自以为与毛泽东有 特殊关系，在当时鱼龙混杂、大局未定的北平，完全可能闹出或 大或小的乱子来。这显然是毛、周们所不愿看到的。在人事安 排上，不能迁就柳亚子，但必须以别的方式让他得到安慰。

让柳亚子从众人集中居住的饭店搬进条件特别好的颐和 园，是安慰方式之一。毛泽东和诗叙旧情，也是一种安慰。仅仅 这些当然还不够。1949年5月1日下午，毛泽东携夫人江青和 女儿李讷来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园中散步、划船，至傍晚才 离去。能在这种时候抽出半天时间陪柳亚子闲聊，对毛泽东来 说也委实不容易，说明毛泽东很重视稳定柳亚子的情绪。但携 夫人和女儿同来，显然也是精心考虑的。这在暗示柳亚子，更在 告诉世人：这拜访纯属私人性质，纯粹是老友之间的往来，没有 丝毫政治意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意在让人们明A:对柳亚子 的拜访，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对他的特别信任和重用。在这次 拜访中，江青和李讷起着道具的作用。毛泽东告别时，约定5月 5日派车送柳亚子至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和衣冠冢。 有趣的是，在当天日记中，柳亚子写道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 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这里似乎 有一点言外之意，让人不免疑心柳亚子曾遇上过“开空头支票” 一类事。

-2当知识遇上信念

但这回毛泽东没有“开空头支票”。5月5日，为孙中山就任 广州非常大总统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上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 带警卫、摄影等人，携双车接柳亚子夫妇和友人范志超、余心清等 上碧云寺。在纪念孙中山的日子里，带着摄影师，送国民党元老 柳亚子上碧云寺，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了。这会温暖许多人的心， 有着明显的统战意义。中午，毛泽东又设家宴，款待柳亚子一行。

这期间，柳亚子的心情自然又由冬返春。毛泽东来访后，柳 亚子写了《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其中有句曰：“南阳讵敢劳 三顾，北地犹堪赋百章。”他把毛泽东的来访，比作刘备的三顾茅 庐，那他自己自然就是诸葛亮了。如果仅仅是“为赋新诗强作 狂”，那也还罢了。如果心里真这样想，如果以为毛泽东是要请 他“出山”，委以重任，那毛泽东特意携夫人和女儿的一番苦心， 就都白费了。顺便指出，这首诗最后两句是名园真许长相借， 金粉楼台胜渡江。”这又一次表示了“长借名园”之意。每次说到 想长住“名园”时，都与归隐吴江相连，这也似乎在把“长住名园” 当作不回故里的一个条件。作于5月19日的《呈毛主席一首》， 以这样两句结尾：

2当知识遇上信念

欲借头衔荣父老，

今宵归梦落吴江。

这是在请求毛泽东帮他实现衣锦荣归的愿望。《五月二十 日晨，枕上闻雷声，继以豪雨，知秋收无患矣！起检案头，获病蝶 喜雨呈毛主席两律，即次其韵》中，有自注文曰：“近以碧云寺国 父衣冠冢、江苏省人民政府暨国史馆事，颇于毛公有所献替也。” 这最后一句，让人觉得柳亚子的自我感觉之良好，真到了不可救 药的地步。大概在这期间，柳亚子多次向毛寄信呈诗，并提出了 明确的任职要求。5月21日，毛泽东复信曰：“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 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 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 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从毛的复信看，柳亚子提议设立国 史馆，并希望自己能在其中任职。任何职呢？以柳亚子的狂傲， 总该是馆长吧，后来的文史馆副馆长一职，当非柳亚子初衷。至 于柳亚子想在江苏政坛有一名分，就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乡土 观念在作怪了。“欲借头衔荣父老”，恐怕主要指的还是江苏的 头衔。5月21日日记中，柳亚子写道：“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 皆非之慨。夜，作长笺复之，将于后日送去云。毛泽东的利害 分析，显然并没有说服柳亚子。

毛泽东的来访和派车载往碧云寺，虽然让柳亚子心情由冬 转舂，但这春暖是短暂的。当柳亚子的实质性要求并不能得到 满足时，他的心情则转回更为严寒的冬季。令柳亚子不愉快的 事仍在不断地发生。在这期间，柳亚子写有一首《赠范志超》，其 中有句云：“生死难忘范志超，廿年交谊忍轻抛。”范志超与柳亚 子相识20余年，被柳称为“三传弟子”。范与柳家有着深厚的交 谊。柳亚子何出此语呢？原来，柳亚子到北平时，范在美术学院 任教。到北平后，柳亚子立即要求有关方面以官方名义聘请范 为他的私人秘书，一时无回音。5月5日在毛泽东家宴上，柳又 直接向毛提出这一要求，毛虽未回绝,但仍然迟迟不见落实。柳 亚子一怒之下，自发聘书一张，具款“吴江一品大臣柳亚子”。范 志超当然不能接受。柳亚子可以不懂政治常识，也不妨不顾政 治常识，但范志超却不能不懂更不能不顾。也就在这时，有人告

32当知识遇上信念

1.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2. 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诫范志超，以后少和柳亚子接近。柳亚子心情的悲怆是可想而 知的这样，便有了《赠范志超》一诗。由官方任命秘书一事， 柳亚子或许认为是小事，其实很令毛泽东们为难。这首先关乎 “待遇”问题。如果柳亚子不在享受此种“待遇”者之列，那就不 能为其配备秘书，此事不容含糊。更重要的是，秘书+能由自己 选定，而应由有关部门选派。尤其为柳亚子这类“民主人士”配 秘书，要由有关部门选择组织上信得过的。因为他的使命，实在 不仅仅是“秘书”。从此事也可看出，柳亚子的政治感觉，实在是 很迟钝的。自封“一品大臣”，也颇耐人寻味。如果说这正是柳 亚子的政治期待，不能算很勉强吧。自认为是“开国元勋”的柳 亚子，认为自己在“新朝”中是应该“官居一品”的。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柳当天日记 载:“七时，徐冰以汽车来，迓赴中南海，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晤人甚多……会九时开始，下午十二时半毕，倦极。 陈学昭、艾青留饭(晤丁玲），饭毕，周扬以车送归，二时返园，三 时入睡，四时始醒。闻今夜又无电，惟有日入而息耳!”②查此后 数十日日记，则每天在家弄邮票、抄旧稿、做诗、写字、喝酒、校 书，并无外出开会记载。可见，这全国文代会，柳亚子只参加了 一个开幕式，此后便完全置身事外。甚至这半天的开幕式，说不 定也是被动员参加的。确实，看着那些旧遇新知在会上春风得 意，看着那些柳亚子根本瞧不上的人在会上凫趋雀跃，柳亚子会 有自取其辱之感。

?2当知识遇上信念

1949年7月1日，全国文代会开幕的前一日，柳亚子所写 《次韵和刘仁女士两首》中，有句云:“驴背陈抟应抚掌，瓮头李白

1. 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575页；范 志超：《记柳亚子先生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2. 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剩吟诗。”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年的“英雄末路作诗人”一语。7月 16日，正值文代会开会期间，柳亚子写了《口号答云彬》：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

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

宋云彬是柳亚子多年知交。他大概知道柳亚子心情不好， 有所劝慰，柳亚子于是以此诗作答。我们知道，在重庆时，柳亚 子对郭沫若称其为“今屈原”是觉得很冤屈的，有“匡时自具回天 手，忍作怀沙抱石看”的豪语D时隔数年，他倒自比屈原了。最 后一句更让人心惊。叶赛宁曾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讴歌革命，但 终于因与新时代格格不入而自杀。柳亚子对宋云彬说“不作”叶 赛宁，莫非宋云彬有此担心？莫非柳亚子有学叶赛宁的理由？ 1949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为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 席。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是其中之一。这 “委员”之“级别”虽高,却是惠而不费的“虚衔”。

2当知识遇上信念

对此，柳亚子满意吗？夏衍的一番回忆作了回答：

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 议……在这期间，我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 新朋友。……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 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

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是时局十分艰险的时 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

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喧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 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 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吃一惊， “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 吻说，李任潮（引按：即李济深）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 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引按：李在国民党清 党时曾参与清除共产党人）？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 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垢是 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 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 “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 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 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 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 实在也太天真了。①

夏衍的这番话，虽然让我明白了 1949年10月间柳亚子的精 神状态，但也让我明白：关于柳亚子的“牢骚”，我并没有都说清 楚。周恩来能够知情，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过柳亚子的事; 至于周恩来对夏衍说了些什么，夏衍不肯说，我们也就不知道。

22当知识遇上信念

但我们却知道，柳亚子并没有真的归隐吴江。柳亚子自称 “狂奴”，其实并不能如严子陵那样“无欲则狂”，因此，他的“狂奴 故态”，不过是没有底气的作态。柳亚子一生好以“英雄”自命， 其实，他也只是终身好作英雄语而已。读柳亚子诗文，我觉得他 最悲哀的，是一辈子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2007年1月11日凌晨匆就

①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31—632页。

I第五辑I

今昔中国

朱自清、闻一多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 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 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 南京、主持全国抗曰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撇开 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 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 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 所向。

^2当知识遇上信念

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 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 责、声讨。朱自清、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两人。

查朱自清日记，可知其时朱自清对事变的看法。在事变次 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 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 盟。彼等制造流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 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 多么肮脏的骗局。”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 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 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 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 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 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 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内容如下。

230当知识遇上信念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 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 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 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 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

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 敌人所窃笑。

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 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漸可避 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 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

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 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 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 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

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

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 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 “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 《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 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 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 可以武力劫持！ 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 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 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 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 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 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 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 我可说话了 ！”

23当知识遇上信念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 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 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 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 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 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 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 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 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唯 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 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 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 础的。”

23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6年7月11日

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邓拓，1912年出生，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邓拓到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即任中共晋察冀区 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主任。后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曰 报》，邓拓任社长。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邓拓 起草的《终刊启事》，宣布终刊。从1937年到1948年，在近11 年的时间里，邓拓一直担任着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领 导工作。

23当知识遇上信念

199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写 的《晋察冀日报史》，厚厚的一册，近五十万字。这部书中，最令 我感兴趣的，是这期间邓拓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的热情。1942年的“七一”，邓拓为报纸写了《纪念“七一”，全党 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毛泽东主义”这说法，虽然不一定是 邓拓首创，但在大区党委机关报的社论中，打出这一旗号，仍然 有资格载入史册。邓拓这篇社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这也具有开创性。据说，因为毛泽东本人不主 张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说法，后来才有“毛泽东思想”的流行。

这部《晋察冀日报史》告诉我们，邓拓长期热衷于学习和搜 集毛泽东著作，交代报社资料室，凡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 的毛泽东著作和研究毛泽东的书，都要送他一份。1938年6 月，邓拓决心报社兼办出版社。不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 安的《解放》杂志发表，邓拓便决定将《论持久战》印成单行本，作 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将持久战的光辉思 想传遍了全边区。”“《论持久战》的出版，开创了边区出版马列主 义、毛泽东著作的先例；以后，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 后即时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成为报社的传统和不成文的制度。”

234当知识遇上信念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为配合学习，邓拓组织出版了《毛 泽东言论选集》。书中收入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 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论新 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这五篇著作。严格说来，这才是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

1944年，“整风运动正在深入进行中”。1月10日，中共中 央书记处指示晋察冀分局，要“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 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之 目的。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 集》，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邓拓头上。邓拓选定文章后，报 晋察冀分局审定，分局审定后，再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 准。其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王稼祥为副书 记。这部《毛泽东选集》，共收文章29篇，46万字，分为五卷。 选集中“编者的话”，由邓拓执笔。这是邓拓继1942年《晋察冀 日报》“七一”社论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系统论述和高度 颂扬。1944年出版的这部《毛泽东选集》，被现在的中共党史文

献专家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的几年间，有过两次增订再版。 第一次增订于1945年3月。增订本增收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一 九四五年的任务》和《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这两篇文章。 第二次增订于1945—1947年。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兴 国、长冈乡、才溪乡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和《论联合政府》《答路透 社记者甘贝尔》《为美国对华援助法案的声明》《文教统一战线的 方针》这四篇文章，全书增加到38篇，60万字，分为六卷。增订 工作最终仍由邓拓负责完成，杨献珍、姚依林、萧三、丁玲等参加 了校勘工作。

23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这个增订本之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又根据中央书记处 出版的《六大以来》，补编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续编》，收入毛泽东 此前未公开发表的六篇著作，其中就有《给林彪同志的信h这 本《毛泽东选集续编》发行不久，中共中央便通知停止发售。当 时大家都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那篇《给林彪同志的 信》上。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林彪不愿这种批评被公 开。毛泽东于是对林彪妥协，下令《续编》停止发行。1949年后 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仍收入了这封信，但用了《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标题，林彪的名字也没有出现。

1948年4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阜平 县城南庄，离《晋察冀日报》驻地不远。一天早晨，邓拓被召去参 加一个紧急会议，在这次会上，邓拓与毛泽东见面。“邓拓与毛 泽东主席紧紧握手，毛主席极为高兴，并与邓拓进行了交谈。”这 应该是邓拓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交谈。此时的毛泽东，见到邓 拓而“极为高兴”，也自在情理之中。

1949年秋，邓拓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 1957年春，邓拓因未能准确领会和迅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布置

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训斥，被说成“死人办报”。不久，邓拓成了 没有实权的社长，总编由吴冷西接替。1958年，邓拓离开《人民 日报》，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邓拓成为姚文 元、戚本禹们猛烈批判的对象。5月17日夜，邓拓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迫害致死者。

?3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7年7月14日

张辉瓚的被捉与被杀

1931年舂，毛泽东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上 阙云:“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 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张辉瓒也成了 大名人。

?3当知'识遇上信念

张辉瓒，1885生，长沙人，字石侯。湖南兵目学堂、湖南讲 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赴德国考察军事。1916年在天津 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回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任游击司令。 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师长，后任第2 军副军长、代军长。1928年10月，第2军缩编为第18师，张辉 瓒任副师长。次年入赣，兼任南昌卫戍司令。1930年，任陆军 第18师中将师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12月 27日，在江西吉安龙冈被俘，翌年1月28日，在东固万人公审 大会上被杀

1930年12月27日，张率部孤军深入龙冈地区。而龙冈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又恰逢细雨浓雾。红军凭借天时地 利，又有英明的指挥，遂将张部击溃，张本人也被活捉——这是 关于张辉瓒被俘经过的通常说法。

但著名现代报人和民国史专家陶菊隐在1934年8月出版 的《政海轶闻》中，却有这样的说法：张奉令进剿东固，因后援未 至，不敢深入。但蒋介石督责甚严，并且说因为赣兵顿兵不进， 致使赤势坐大，将成燎原之患。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十分惶 急，一封接一封地给张辉瓒打电报，促其速进。张于是给鲁写了 一封密信，信中说明拟缓进二日，并详述了自己的攻守策略。信 成后，遣一部卒送往南昌。该部卒雇一挑夫，而呈鲁密信亦纳于 挑夫肩上之行囊中。途中遇敌，部卒窜走丛莽间。敌去后，觅挑 夫，已不见踪影。部卒惧罪，仍然赶到南昌，面见鲁涤平，口头报 告了他所能知之情，却绝口不提密信丢失之事。鲁问何时进兵， 部卒不能答。鲁于是再次电令张速进，口气极为严厉。张认为， 缓进理由既已详陈，鲁仍令速进，一定是疑心自己胆怯畏葸了。 不得已，遵令南进。而那在途中失踪的挑夫，却是红军奸细。张 致鲁密信早落入红军指挥员手中。对张的行止思虑，红军方面 了如指掌。这样，张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23当知识遇上信念

陶菊隐说,张辉瓒被捉时，毛泽东忽然出现，“趋握张手曰： ‘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顾谓卒曰：‘此吾旧友，宜 善视之张默然无语”。这样说来，毛与张应是长沙时的故 交了。

张的被捉，在共产党方面是巨大胜利，在国民党方面则是一 个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据说张辉瓒平生不二色，与妻子伉偭 情深。张妻闻讯，找到蒋介石，愿意倾家荡产，救出丈夫。蒋介 石也同意赎救张辉瓒。得到南京方面的认可，鲁涤平于是积极 行动起来。而据说中共高层，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也主张不杀张辉瓒，愿意与鲁涤平做成这笔交易。双方开始谈判。鲁涤 平愿以现洋20万、医药20担、释放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 名共产党政治犯、可装备5 000余人的枪械弹药等为代价，换回 张辉瓒。

双方先在上海谈，后在南昌谈。1931年1月28日，谈判正 在进行时，“苏区政府”在江西吉安县东固召开庆祝反“围剿”胜 利的群众大会^据说，是群众要求在大会上公审张辉瓒。张辉 瓒遂被押到会场，会场上“剥皮”、“抽筋”、“点天灯”之类的口号 此起彼伏。祝捷大会于是变成公审大会，张辉瓒当场被杀，尸体 被挂在树上示众。不久，群众又把他脑袋割下，钉在一块木板 上，放入赣江。在南昌谈判的中共代表，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 大为惊恐，立即化装逃走。

239当知识遇上信念

张辉瓒终于被杀，我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死,能起到 鼓舞士气、增强群众信心的作用，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在 毛泽东那里，“政治账”永远高于“经济账”。

赣江下游的国民党部队从江上捞起了张辉瓒的首级。首级 运到南昌，鲁涤平命令买了几段大楠木做棺材，命南昌最著名的 雕刻专家，按比例做了木身，又给木身套上中将军服，再将头颅 安上入殓。鲁涤平并在南昌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于3 月初举行了公祭活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则发布公告:“陆军 第十八师师长兼湖南省政府委员张辉瓒，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二 十八日，在江西东固殉难。灵枢将于三月九日抵省。议决二十 九日公葬岳麓山。敬希赴省会悼念为荷！”张辉瓒棺椁运抵长沙 后，全城10万人参加了公祭，最后葬于岳麓山腰。陶菊隐说: “湘人开会追悼，其旧部范某诔之曰：‘感公知己十年前，闻道没 全师，天涯欲祭疑公在;受命专征千里外，伤心问忠骨，江波无语 载元归。’一时传为绝唱。”仅从文学角度看，这挽联写得实在

不赖。

当知识遇上信念

蒋介石亲拨巨款，为张辉瓒修建了牌坊、寺庙及圆形水泥 墓。墓前的青石碑正面，刻有蒋介石题写的“魂兮归来”。张辉 瓒的墓，“文革”中理所当然地毁于“红卫兵”之手。不然，今天也 是岳麓山上的一处“景点”，能为长沙市的GDP做点贡献。

我有时想，把一个人的头颅割下，再用铁钉钉在木板上—— 需要怎样一种“心理素质”，才能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弄出了个“满洲国”。到1942 年，是“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同为日本卵翼下的“国”，南京的 “伪中华民国”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5月4日，南京伪国民政 府主席汪精卫，率领代表团访问“伪满洲国”，以示恭贺之意。随 汪访“伪满”的团员有:“外交部长”褚民谊、“参谋本部部长”杨揆 一、“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政务次长”周隆庠、“侨务委员会 委员兼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陈君慧、“航空处长”陈昌袓、“华 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等。自然，以上各人的官职前，都应着 一“伪”字。

M当知识遇上信念

代表团成员中，除周作人外，其他人都在南京做官。汪精卫 一行从南京出发;周作人与“教育总署秘书”黄公献，及日本官员 山田等，从北京出发。双方在大连会合。在大连逗留了一两天， 到旅顺玩了玩，这伙人于5月7日从大连到了“新京”(长春）。

说到汪精卫访溥仪，人们会想到：汪精卫之于溥仪,是差一点就有杀父之仇的。1909年，26岁的热血青年汪精卫，不顾孙 中山、胡汉民等人的劝阻，执意要到北京刺杀清廷大员。他组成 了一个暗杀组，成员有黄树中、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 璧君等。汪精卫此番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行此壮举的。对于 孙、胡等人的劝阻，汪回答曰：“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 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为制造炸药,这期间，汪精卫等几度赴日，又到中国香港。后又 在北京建立机关，并开照相馆做掩护。暗杀组的首选目标是庆 王奕劻。因奕劻戒备十分森严，无法下手。于是又以从欧洲考 察军事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为目标。汪精卫身怀炸弹，亲赴车 站。但因迎接的官员太多，满眼都是红顶花翎，目标无法确立， 只得又作罢。精心准备了许久，当然不肯就此罢休。暗杀组又 将目标定为摄政王载沣，而载沣正是溥仪生父。溥仪1906年出 生，1908年便即位。尚在学习走路说话的小儿，当然不能真管 事，于是便由父亲载沣摄政。暗杀组决定在载沣上朝必经的银 锭桥埋炸弹。为使炸弹发挥尽可能大的威力，汪精卫在骡马市 大街定做了一个可裝填四五十磅炸药的外壳，制成了一个巨型 炸弹。但在埋炸弹、接电线时，被人发觉。汪精卫等被逮捕。在 狱中，汪精卫写了数首《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两三岁的溥仪是大清国的宣统皇帝，二十六七 岁的汪精卫是大清国的一个一心要谋反的子民。这子民甚至因 图谋炸死溥仪生父而被捕，成为大清国的囚徒。三十多年后，两 人都成了日本抉持下的“国家元首”，并以这“元首”的身份相见。 三十多年前，汪精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推翻溥仪正在做 皇帝的清朝。三十多年后，汪精卫在溥仪空出的地方成了“主 席”，又以这“主席”之身跑到长春来见溥仪，而这溥仪又一次成

242当知识遇上信念

了“皇帝”——历史真是最大的“幽默大师”。

5月7日下午，这伙人到了“新京”。晚上，汪伪政府驻“伪 满州国”“大使”廉隅设宴招待。林柏生发表谈话，说汪此次以 “元首”资格访满，足以增进“中、日、满三国友谊”，加强东亚轴心 力量基础。8日上午，汪精卫率众人进宫会见溥仪。俗话说: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他们已不是仇人，而成了一根线上缚 着的两只蚂蚱，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关于此次会见， 周作人日记有这样记载:“5月8日，上午9时50分随主席进宫 谒见，10时10分退出^ 10时45分来营访，10分钟后退去。11 时50分又进宫，在嘉乐殿筵宴，1时半回公馆。”这天上午，从 “中华民国”去的这伙人，两度进宫，真正的会谈只有20分钟。 从周作人日记看，溥仪仍有着“皇帝”的派头，似乎他并没有把这 伙人视作“友邦来宾”，而仍然看成昔日的子民。

M3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宫中的宴会上，汪精卫免不了要发表谈话。谈话中，汪声 称此番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两 国”同心协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在大东亚的“大业”。5月9 日，“满洲国”政府召开大会，欢迎汪精卫一行。汪精卫照例有一 番演讲。10日，这伙人结束了对“满洲国”的“出访”，回到大连。 11日，从大连回到南京。周作人随汪精卫到了南京。因为伪政 府13日要设宴庆祝汪精卫六十大寿，周作人在被邀之列。

汪精卫的这次“外交活动”传出后，有人做了一个灯谜，谜面 是“汪精卫访溥仪”，猜一童话名。谜底是:“木偶奇遇记”。

2008年8月4日凌晨

1949年以前中共的“统战工作

胡乱翻书，我往往惊叹中共在建国前“统战工作”之出神入 化，而周恩来则堪称“统战”方面的大师、巨匠。

?44当知识遇上信念

手头有一册《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 月出版，作者万亚刚。这个万先生，1928年19岁时，即进入国 民党“中统”，又随国民党去台湾，仍在“中统”服务，直到59岁退 休，可谓是“中统”老特务。《国共斗争的见闻》所收文章，大都是 记述作者亲见亲闻之“国共斗争”故实。书中有一篇《“统战”何 足惧》，说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文章说到抗战时期的一件 事：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会画几笔，在重庆开画展。展出的画 中，有一幅“岁朝图”，上面画了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 一瓶茅台酒。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喧哗有客过茅台，酿酒池 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诗所咏者，乃红 军“长征”途中，在茅台酒池中洗脚的笑话。周恩来知有此画，即 着人买下。1945年7月，黄炎培参加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赴延安，走进毛泽东会客室，墙上赫然挂着沈叔羊绘画、黄炎培题 诗的这幅“岁朝图”。万亚刚说，黄炎培“回渝后提起此事，颇为 得意。中共不知购此画付出多少代价，但此一举，却获得沈钧 儒、黄炎培两人的好感”。

若此事属实，它获得的又岂止是沈、黄两人的好感，许多闻 知此事的知识分子都会心生感动。出于好奇，我找出黃炎培的 《八十年来》。此书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书中附 有黄氐之《延安五日记》。7月2日，果有如此记载：“从大会堂 右边绕到后方，走上山坡，便是毛泽东接见我们的一间会客室， 仿佛就是大会堂后身的上层。室是长方形，光线很足，中间安着 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二十人。四壁挂着清清疏疏的几幅 画，中有一幅是沈叔羊画的，一壶酒，上写‘茅台’两字，几个杯 子，我题上一首打油诗。这是某年沈叔羊在重庆开画展，要求我 在这幅画上题字，忽然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间，共产党人在

24当知识遇上信念

茅台酒池里洗脚 桩故事的传说，就提起笔来游戏式地写

上一首七绝……料不到这幅画落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堂里。”黄炎 培当时的心情之“爽”,是可想而知的。

查有关沈钧儒资料，知沈氏第三子沈议，上中学时患过脑膜 炎，病愈后头脑仍常胀疼，且左耳失聪、右耳重听，沈钧儒便力促 其学习绘画，后来在绘事上颇有造诣云。想来这沈议，便是沈叔 羊了。他大概没想到，自己随便画的一幅画，会挂在毛泽东的会 客室，承担耐人寻味的政治功能。

黄炎培《延安五日记》，7月1日还记载了一桩“小事”。这 一天，他们从重庆飞延安。到了延安后:“过了延水，穿过小小的 延安城，眼帘前忽然闪过一块牌子：‘韬奋书店’。”邹韬奋与沈钧 儒、黄炎培等交谊深厚，又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一年前，邹韬奋 在上海逝世;一年后的延安，就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店了。这书店的招牌，未必专为黃炎培们而挂，但无疑是为“统战”而挂。 到过延安的人，会把此事传到重庆、传到上海、传到南京、北 京……一块小小的书店招牌，或许能起到千军万马所难以代替 之作用。

万亚刚说，周恩来“派人去买画时，并未预料到黄炎培会去 延安，这都是他毫无目的的随兴之作，其中并无阴谋诡计。所谓 统战，如此而已，实在用不着恐惧、回避”。这“老特务”的议论， 往往迂阔肤浅。这里也一样。周恩来派人去买画，当然不能说 是“阴谋诡计”，但要说“毫无目的”，却大谬不然。周恩来派人买 画之初，固然没想到黄炎培要去延安，但他凭着一种超凡的直 觉，觉得此画当能派上用场。它可以挂在延安毛泽东的客厅，也 可以挂在重庆周恩来的客厅，还可以挂在任何一个中共要人的 客厅，只要这天沈钧儒或黄炎培来访。当然，如果两人同时来 访，那就是更好了。周恩来这种臻于化境的“统战本领”，这种看 似处处无心实则处处用心的“统战智慧”，对于政治上的敌人，确 实是值得“恐惧”的。

M6当知识遇上信念

因了中共这种极其高超的“统战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站 到了这一边。就说沈钧儒吧，是法学家，是大律师，是社会名流、 贤达。他以如此身份，成了中共的“亲密朋友”，甘当中共的“尾 巴”。闹“救国会”、闹“民盟”，这些大事且不说了。只说由他出 面营救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吧，就不知凡几。由于他特殊 的身份和名望，从狱中救“政治犯”，特别合适，他也总积极地 去做。

1949年后，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又任民盟中央 主席。1957年，他的那些“盟友”们纷纷成为“右派”，他却无法 援手。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沈钧儒传》中说：“这么多民盟成 员被打成右派，沈钧儒在思想上难以接受，他不相信他们都要推

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特别对一些长期为民主 事业奋斗、自己非常了解的老朋友被划为右派，如柳堤、沈志远、

刘尊棋、王斐然等，他既感到痛心，感到不可理解，又无可奈何。”

“又如沈钧儒的侄女婿古念良被划为右派，沈见到他时，把他拉 坐在身旁，默默地握着他的手。这使古念良感觉‘在老人家的慈 祥的脸上隐藏着另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是伤感？是怜悯？还是 漠漠的哀愁？’”®

2008年8月4日夜

247

当知识遇上信念

为1989年版《辞海》送行

《辞海》是今日中国人最常用的工具书，具有非常的权威性。 对于人们的质疑问难，所起作用可谓大矣。

?4当知识遇上信念

《辞海》始编于民国初年，历21年（ 1936年）方出初版^ 1957年，毛泽东釆纳旧《辞海》主编舒新城的建议，指示重新修 订旧版《辞海》。1962年，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再 作修订后，又于1965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文革”开始 后，修订工作陷于停顿。“文革”结束后，修订工作得以继续进 行，并于197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辞海》三卷本，在全 国各地公开发行，1980年又印行了该版的缩印本，1983年出版 了《辞海》(增订本)。1984年，编委会开始对《辞海》进行又一次 修订，并于1989年出版了新修订的《辞海》三卷本。

《辞海》是工具书，顾名思义，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在政治上 是中性的。镰刀，斧头，铁锤，匕首，木棍，长矛，本身没有阶级 性，在哪一种人手里，都可起工具的作用。作为工具书的辞书，也应该做到客观、公允，在评介人物事件时，尽可能地让事实本 身说话。《辞海》对“工具书”的解释是:“专供读者检索查考有关 知识、资料或事实，按一定编排次序加以汇编的书籍。”“知识、资 料或事实”，都具有客观性。工具书只有让读者检索查考到准确 可信的“知识、资料或事实”时，才算真正尽到了“工具”的职责， 才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 益的作用。工具书与宣传品应有严格的区别。它是以知识权威 的身份发言，而倘若提供的“知识、资料或事实”多有不准确不可 信之处，那对读者就是很严重的误导，其不良影响之严重，也就 不言而喻。

不过，编纂辞书，毕竟与制造镰刀、匕首等工具不是一回事。 它很难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摆脱编纂时主流政治观 念的左右。《辞海》1979年版前言中说道:“1971年，周恩来同志 提出，把继续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计划。1972年 起，再次着手修订，并按学科分类先出分册，以供急需。然后在 各分册的基础上整理加工，出版合订本，公开发行。但在修订过 程中，‘四人帮’横加干扰和破坏,妄图使《辞海》为他们篡党夺权 的阴谋服务。”“四人帮”采用了哪些具体的手段以影响《辞海》的 修订，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想见，他们无非是要把自己的政治 观念、价值取向，贯彻到修订过程中。例如，在评介中国历史人 物时，按照儒法两家来分类。对所谓儒家人物，在介绍得简略的 同时，大加贬损;对所谓法家人物，在介绍得详细的同时，则大加 赞颂。目的，无非是影射现实的政治斗争。辞书编纂，基本问题 也就是词目的取舍、释文的详略和怎样评价等几个方面。“四人 帮”要在《辞海》上做文章，也只能从这几个方面打主意。他们之 所以对《辞海》感兴趣，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辞海》作 为工具书所具有的权威性。他们要让《辞海》的工具性能发生变

M当知识遇上信念

异，也即变成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权威工具”，就像把外科 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变成杀人的凶器一样。可见，对辞书的工具 性，“四人帮”这类怀有政治野心的人，有着另一种理解。

我手头有一本1994年9月出版的《辞海》缩印本，版权页上 说明“系《辞海》(1989年版)大16开新缩印本，对第一版在少量 文字上作了修订”。在查阅这部《辞海》，或者说，使用这件工具 的过程中，我不时有所感慨，也弄清了一些本该在“凡例”中予以 说明却未作说明的编纂原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在1984年 开始的对1979年版《辞海》的修订过程中，当时的主流政治观 念、是非标准起着很大的作用，不少地方，已明显与今天人们达 成的共识不相吻合。作为读者，我感到，1989年版《辞海》已明 显落后于时代了。按照国际惯例，大型辞书每十年应修订一次。 也真巧，文章写到这里时，在《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2日） 上读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人员朱志凌纪念该社建社40周 年的《在〈辞海〉的旗帜下……》一文，其中说:“1999年版全彩印 的《辞海》，将是我们对新世纪的献礼。……让《辞海》始终代表 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使上海辞书出版社，成为世界工具书出版的 专业大社，将是我们精诚所至。”即将出版的1999年版《辞海》， 应该对1989年版有所修订。在新《辞海》即将问世之际，我写出 对“代表国家科学文化水平”十年之久的1989年版《辞海》的一 点“用后感”。正如朱志凌文中说的：“一部《辞海》史，某种意义 上，也是中国20世纪文化历史的缩影。”将来的人们，或许仅就 《辞海》出版史，便可写成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大书。而我这篇小 文，也可算作对一个曾影响中国的科学文化十年之久的版本的 一点意见。但愿这篇文章，对新修订的《辞海》，没有针对性。

?5当知识遇上信念

先说插图。不知按国际惯例来说，辞书的插图有哪些功能。 《辞海》对“插图”功能的解释是:“对正文内容起补充说明或艺术

欣赏的作用。”“艺术欣赏的作用”主要指文艺书刊的插图，工具 书中的插图，就是为了对释文起补充说明的作用，以便读者在通 过阅读释文了解某人某事之外，再通过图画对某人某事有感性 的把握。插图有时是很重要的，例如在解释某种国旗时，千言万 语不如一幅图画更能让人明白这国旗是什么模样。辞书中的插 图不应具有政治意义和评价功能。同时，是否配插图，也与某人 某事本身的重要性并无必然的联系。有些词目，也许本身并不 很重要，但必须有图才能让读者明白时，也应该配图。但1989 年版《辞海》中的插图，在涉及社会人文方面的词目时，却具有很 强的政治意义和评价功能，哪些词目该配图，配何种规格(大小) 的图，都颇有政治上的讲究，都意味着一种评价，与词目本身是 否需要配图，也并无必然联系。

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令我对《辞海》中的插图发生兴趣的 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到1989年版新缩印本（以下均指这种版本) 的第78页，发现整整一页都是一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不 免愣了一下。《辞海》包罗万象，涵盖古今中外。那么，究竟有多 少事件享有这种以一整页的插图来“补充说明”的资格呢？我遍 查全书，发现整页的插图，也就独此一幅。这也就意味着，这部 辞海向读者传授这样的“知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 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如果把《辞海》中的插图按所占篇幅概略地 分为特大型、大型、较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几种规格，那占整 页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便是唯一的特大型。属于大型插图 的，则有“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要图”和辽沈、平 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要图”等不多的几幅，约占一页的四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在为数也不多的几幅较大型的插图中，则有“中国 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图”（也属长征图），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 剿”中的“苏家埠战役示意图”，约占一页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

•5当知识遇上信念

一。而“丝绸之路主要路线图”只能算中型图，约占一页的十几 分之一。至于“长城图V‘横贯欧亚地震带”示意图，属小型图, 约占一页的几十分之一。“禹贡九州图”，说明“板块构造说”的 “世界板块分布图”，则属微型图，还占不到一页的五十分之一。

在研究了《辞海》社会人文方面的插图（包括人物头像）后， 我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是否配图，是按照政治上的“是”与 “非”，“好”与“坏”来决定的。社会人文方面所有配图的词目，都 是编纂时的主流政治标准所认定的“好人好事”，而按其时的主 流政治标准属不那么“好”或属“坏人坏事”的，则无论如何著名， 如何重要，在历史上如何有影响，都不配图。这样，马恩列斯、毛 刘周朱，自然配有头像，而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蒋介石、 汪精卫、林彪等则不配头像；洪秀全配有头像，曾国藩则不配头 像。在涉及现当代人物事件时，凡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则多配 图。例如，从早期的共产党人，稍稍知名些的，只要不曾被认为 “变节”、“叛变”，都配有头像;而共产党的创始人，无论在中共党 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有极重要地位的陈独秀，却不 配头像。按我一个外行人的理解，作为工具书，以是否配图来显 示政治上的褒贬，实无必要。工具书是介绍“知识、资料或事实” 的。如果说读者有必要通过头像来认识斯大林、毛泽东，那也同 样有必要通过头像来认识希特勒、蒋介石。由于是否配图是坚 持政治标准，有时就显得很滑稽。例如，“陕甘宁边帀”、“中华苏 维埃银行兑换券”，都不但立有一个词目，而且配有插图，而“袁 头”(俗称“袁大头”）则不配图，尽管“袁头”词目中也有“流通很 广”的介绍。就在历史上的影响来说，前两种与“袁头”不可同日 而语。但“袁头”在政治上显然黯然失色，因此也不配让读者知 道是何种面目。

25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词目的取舍和详略上，《辞海》遵循的也是政治标准。近

代以来，在国际方面，重“无产阶级”而轻“资产阶级”，属“无产阶 级”方面的人和事，不但稍稍重要一点的都立有词目，也介绍得 较为详细;属于“资产阶级”方面的，则有些十分著名的人和事， 也不立词目。例如，在“国际歌”词目下，配有连歌词带乐谱的插 图(配有连词带谱插图的歌曲，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也就只有这四首 歌曲享此殊荣），而我在“马部”却没有查到“马赛曲”。“马赛曲” 的知名度不可谓不高，如果连词目都不立，实在不可思议。

近代以来，在国内方面，《辞海》对共产党方面的人和事，词 目标准放得很宽，一些并不著名和不很重要的人和事都立有词 目，并且介绍得很详细。而属国民党方面的，则有些十分著名和 极为重要的人事都不立词目，即使立有词目者，也介绍得较简 略。例如，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方面所进行的“平型关战斗”、 “百团大战”当然立有词目并且有较详细的说明，就是有些不很 起眼的“战斗”，也有词目介绍。在查“大部”时，我偶然注意到 “大龙华战斗”这个词目，一看，原来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在河北易 县大龙华地区袭击日伪军的一次“战斗”，战果是“共歼日伪军四 百多人”。但国民党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战役，要么介绍得很简 略，要么根本就不立词目。例如，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 在长沙进行过第一、第二、第三次会战，规模都很大，双方每次投 入的兵力都多达数十万，战役持续时间也都很长，中国军队每次 战绩都颇可观。第一次歼灭日军三千六百多人；第二次中方战 报说毙伤日军四万余人，日军则承认伤亡七千人;第三次中方战 报说毙伤日军五万六千余人，日军则承认伤亡五千五百人。对 这三次战役，《辞海》只在“长沙会战”的词目下，做了极为笼统和 简略的介绍，没有各次战役经过，也没有具体战果，总共只用了 一百七十来字，所占篇幅，也就与八路军进行的一次“大龙华战

25当知识遇上信念

斗”差不多。要想对三次“长沙会战”的“知识、资料或事实”有基 本的了解，查《辞海》根本没用。再如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鄂北 战役”(持续十多天、歼灭日军二千七百余人）、“湘西战役”（持续 一个半月，中日共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在《辞海》上根本就查 不到。

在涉及1949年以后的人物时，《辞海》对政治人物词目标准 放得宽，较著名的政治人物都立有词目，通常也配有头像。对文 化人物，词目标准控制得严，介绍得也较简略，一般也不配头像。 这方面的情形，可举同属“陈部”的“陈赓”与“陈寅恪”为例。“陈 赓”词目有四百多字，并且配有头像；“陈寅恪”词目则只有一百 七十来字，没有头像。陈赓乃一代名将，对其生平行状介绍得详 细些，并且配上头像，以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他，当然有道理。 但陈寅恪乃一代学术大师，对其生平业绩作较详细的说明，并且 配上头像，也十分应该。《辞海》如此厚彼“陈”而薄此“陈”，会让 今日和以后的读者感到遗憾。仅此一点，也可见1989年版《辞 海》确实过时了。

?5当知识遇上信念

说1989年版《辞海》已过时，并不意味着否定它曾起过的作 用。自出版以来，这部作为“中国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出 版物”的工具书，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它的不足，它对读者的 某些方面的误导，也是受时代制约的。正因为大型辞书难免受 时代制约，才有每十年修订一次的国际惯例。在1999年版《辞 海》即将问世时，我愿以严肃的姿态为1989年版《辞海》送行。

1998年12月26日于南京

“文革”结束了吗

——与郝铁川先生商榷

有人在浙江的文学刊物《江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沙家 浜》，对当年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进行了全面“消解”。一些 人对此悲愤不已，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坦率地说，我憎恶 作为“样板戏”的《沙家浜》，但也不欣赏作为小说的《沙家浜》。 但我同时认为，小说《沙家浜》即便再拙劣，也是一个文学问题， 对它再严厉的批评也只能是一种“文学批评”，任何在政治上和 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郭建 光、阿庆嫂之流，本就是虚构的“戏剧人物”，对他们的改写，谈不 到侵权、违法一类问题。因此，当我在2003年4月25日的《文 汇报》上读到在醒目位置发表的《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 一文时，颇有些惊诧。而文末注明作者郝铁川为“中国比较法学 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更令我觉得有著文商榷之必要。

25当知识遇上信念

先看郝先生所谓的“不合法”一面。郝先生强调•/‘说其不合

法，是因小说《沙家浜》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 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而“什么是‘公序良俗’？公 序，指公共秩序,是国家、社会生存、发展所必要的一般秩序；良 俗，是指善良风俗，是国家、社会生存、发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 或曰某一特定社会所应尊重的基本伦理要求”。小说《沙家浜》 为何违反了“公序良俗”呢？因为“‘阿庆嫂’、‘郭建光’这两个人 物，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了勇敢和正义的化身，从某种意义上甚 至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也就是说，“阿 庆嫂”、“郭建光”这两个人物已成了中国“公序良俗”的一部分， 已然神圣不可侵犯;对他们的改写、消解，就意味着“犯法”。

“文革”期间是“十亿人民八个戏”，《沙家浜》便是八戏之一。 不仅郭建光、阿庆嫂这两个人物在当时家喻户晓，同样家喻户晓 也同样“光彩夺目”的还有李玉和、李铁梅、少剑波、杨子荣、柯 湘、洪长青、江水英等所有八个戏中的“主要正面人物”。如果郝 先生赋予郭、阿二人的“公序良俗”意义能够成立，那看不出同样 的意义为何不能也赋予李玉和、江水英等其他“样板戏人物”。 而这些人物之所以如此有影响以至于郝先生至今还认为他们代 表着“公序良俗”，就因为当时只允许“十亿人民”看“八个戏”。 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强权使得这些人物妇孺皆知。如果没有 “文革”，就不会“十亿人民八个戏”，也就不会有郭、阿之流的家 喻户晓、妇孺皆知，自然就不会让郝先生认为他们代表着“公序 良俗”。直白地说，郝先生之所以在今天还能从郭、阿身上感受 到“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归根结底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强 权使然。

25当知识遇上信念

包括《沙家浜》在内的“革命样板戏”与“文革”之间是怎样的 关系呢？江青之流是这样解释的:“革命样板戏直接地为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了革命舆论，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

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充分认识革命样板戏的意义和 作用，是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的一个重要 方面。”这是初澜《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 的成就和意义》一文中的一段话D初澜是江青、姚文元们在“文 革”后期亲自缔造的“文艺评论”方面的写作班子，这篇文章发表 于1974年第一期《红旗》杂志，算是对江青苦心经营的“样板戏 运动”所作的一次总体性评价。在“样板戏”与“文革”的关系上， 江青之流这样看，而一些坚决拒绝“样板戏”的人也这样看。或 者说，拒绝“样板戏”的人之所以拒绝“样板戏”，恰恰因为他们认 识到了“样板戏”与“文革”之间的实质性联系。例如，王元化先 生早在1988年的《论样板戏》(收入《谈文短简》，辽宁教育出版 社1998年版)中就指出，“样板戏”在多个方面“蕴含着‘文化大 革命’的精神实质”,表现之一，是江青的“三突出”理论在“样板 戏”中的全面实现。王先生说：“样板戏是三突出理论的实 践。……三突出是突出英雄人物，创造一个‘高大全’的形象。 恐怕至今仍有人对这种‘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神往。”郭建光、阿 庆嫂之流，也正是按照“三突出”理论创造的，而法学家郝铁川先 生则是“至今”仍对这种“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神往”者之一。王 先生又指出，除“三突出”等理论外，“样板戏还在其他方面蕴含 着‘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那就是贯穿在样板戏中的斗争哲 学。‘文化大革命’整整斗了十年。在这十年浩劫中，‘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口 号震天，标语遍地。处于随时随地需要煽起斗争的生活环境，在 意识形态方面，自然只容许为斗争加油，而不准将斗争冲淡。样 板戏是应时应运而生的产物，它在大字报、批斗游街、文攻武卫、 夺权与反夺权所演奏的斗争交响曲中成了一个与之相应的音 符。……样板戏炮制者相信：台上越是把斗争指向日寇、伪军、

25当知识遇上信念

土匪这些真正的敌人，才会通过艺术的魔力，越使台下坚足无疑 地把诬为反革命的无辜者当敌人去斗。江青他们都是艺术功利 主义者，不会无缘无故去演样板戏的。样板戏散布的斗争哲学 有利于造成一种满眼敌情的严峻气氛，从而和‘文化大革命’的 要求是一致的”。其实这也就是初澜文章中所说的，“样板戏”为 “文革”制造了舆论，认识“样板戏”的实质是认识“文革”实质的 重要方面。《沙家浜》作为曾经最走红最有影响的“样板戏”之 一，在剧情编造和人物塑造上，都是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江青们的 “斗争哲学”的“文革精神”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居然至今还被 法学家这样的人认为代表着中国的“公序良俗”、象征着“我们民 族精神”，我们不禁想问一声:“文化大革命”到底结束了没有？ 王元化先生在《论样板戏》中还说：“这八个样板戏就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仅有的八出戏。十亿人在十年中只 准看这八出戏，整整看了十年，还说什么百看不厌。而且是以革 命名义，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叫人去看、去听、去学着唱。看后还 要汇报思想，学得不好就批斗。那时有个说书艺人不懂样板戏 是钦定圣典，一字不可出入，而糊里糊涂按照演唱的需要作了一 些修改，结果被指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拉去枪毙了。只 要还留有那段噩梦般生活记忆的人，都很清楚，样板戏正如评法 批儒、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一样，都是‘文化大革 命’4大破’之后所‘大立’的文化样板。它们作为文化统治的构 成部分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紧紧联在一 起。”被王元化先生认为是“文革”时期“文化统治的构成部分”的 “样板戏”，却被郝铁川先生认为是今日中国“公序良俗”的构成 部分;被王元化先生认为与“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灾难的‘文化大 革命’紧紧联在一起”的“样板戏”，却被郝铁川先生认为“已经成 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孰是孰非，难道还有辩论的必要

-5当知识遇上信念

吗？虽然是法学家，也毕竟不能口含天宪的。在“文革”期间，因 为对“样板戏”稍有“不敬”而丢了脑袋者，并非个别。而时至今 日，居然还有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法学家宣判为“犯法”，我们不 禁还想问一声:“文革”真的结束了吗？

在宣判小说《沙家浜》“不合法”之前，郝铁川先生先强调了 它的“不合理”：“说其不合理，是因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标题， 又要诋毁名著内容。小说的题目并非作者独创，而是搬用原戏 剧《沙家浜》的名称。既然是搬用别人的标题，就要善意地尊重 原标题下的内容，这就如同借别人的东西要爱惜使用一样。你 在别人的树荫下乘凉，就不能不爱护别人的树木。这些都是人 之常情和做人的良知底线。然而，近年来，个别人不负责任地解 构名著，把一些名著‘解构’得面目全非，与原著基本精神大相径 庭。我赞成一些批评者的意见：这种解构名著行为的自身是缺 乏创造力的招供，利用名著并以名著掩盖自己的弱智和无能，更 是文明堕落的表现。名著和经典是任何解构都不能摧毁的，却 把解构者的道德丑恶灵魂暴露无遗。”对“解构”或“改编”“名著” 的行为，我也往往不以为然。然而，“桀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这种行为即便再不好，也没有到郝先生所说的程度。郝先生也 许不知道，包括《沙家浜》在内的“样板戏”，常常就是对已有剧目 (小说)的“解构”和“改编”。《沙家浜》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 对所依据的原著大加贬斥批判以便与之划清界线和显出自己的 高明，是“样板戏”制作者和吹捧者们常做的事，这也正是郝先生 所说的“在别人的树荫下乘凉”却“不爱护别人的树木”。根据 “文革”的政治需要对原著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大做调整，是“改 编”的目的所在。沪剧《芦荡火种》本是以表现“地下斗争”为主 题的，阿庆嫂是主人公,郭建光则是戏份不多的配角。为了突出 “武装斗争”，在“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才成了主角，才成

?5当知识遇上信念

了时时占据舞台中心、处处压过阿庆嫂的核心人物。既然当年 的“样板戏”《沙家浜》可以对原有作品大加改写，那今日的小说 《沙家浜》再对“样板戏”《沙家浜》进行改写就谈不上特别不应 该。要证明小说《沙家浜》对“样板戏”《沙家浜》的改写大逆不 道、违法乱纪，就先要证明“样板戏”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受国 家法律保护的特殊“文艺作品”。

郝铁川先生在文章中还对“创作自由”作出了这样的界定: “作者的创作自由权与公序良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说起 来很简单，那就是：你可以坐在屋子里自由地写+，但绝不能把你 撰写的违反公序良俗的作品去公开发表和四处散发,你自写、自 看、自我欣赏，没有波及社会，没有产生社会危害性，法律、社会 可以不管你;但你若是把违反公序良俗的作品公之于众，那就给 社会带来了危害性，为公序良俗原则所不容，具备了一定的违法 性。”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郝先生援引了许多国家的法律。而 我在这里，愿意援引一下“国际人权公约”第十九条第二项：“人 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 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 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c/’

26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文章结尾，郝先生说:“过去，我曾从文学艺术与现代法律 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性角度，呼吁‘文化人不要成为最后一个法盲 部落今天，我不得不再次‘涛声依旧’。”成为“法盲”当然是不 好的，成为“文盲”也是很可悲的。让我们既不成为“法盲”也不 成为“文盲”吧——我们愿与郝铁川先生共勉。

2003年5月4日

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的英文版序中 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比义和团运动更广为人 知。……义和团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不同寻常地吸引了 国际间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普通中国农民起来把他们所 憎恨的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赶出中国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因 此，它是中国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这位美国学者的书，我多年前买来并且翻过，并不怎样吸引我， 但“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却令我眼睛一亮。民族主义的 内涵丰富而模糊。从秉有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的主体方面来区 分，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 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这三者之间当然没有截然的区分，但比 较起来，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更加没有理性，更加鲜明地表现出蒙 昧和疯狂的特征，也更加具有“祸国殃民”的效力。

6当知识遇上信念

“义和团运动”应该说是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源头。

“义和团”的兴起,固然原因并不简单;他们对当时的“洋人”的憎 恨，也实在不能说事出无因。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野蛮、愚蠢和 残忍，却也实在是无可避讳的。例如，他们把杀戳和打击的人物 分为“十毛”。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洋人，被称为老毛子或大毛子， 那是格杀勿论。其次是信“洋教”的中国教民，被称为“二毛子”。 “二毛子”必须退教，否则亦杀无赦。再往下，用洋货、行洋礼者， 都在杀戮和打击之列。在“义和团运动”盛行之时，民间甚至有 因不知“洋货”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钉”而至于满 门被抄斩者。这里所说的，当然还只是“义和团”的“英雄壮举” 之一部分。“义和团运动”中诞生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并没有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终结而终结。作为“义和团运动”的精神遗 产，“群众性民族主义”从此便存留下来，不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 表现自己。例如，“文革”中“红卫兵”的某些行为，就不妨视作以 “革命”名义出现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宣泄（当然，也可以说是 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义和团精神”的宣泄）。

最近几年间，我常常想到“群众性民族主义”这一说法。日 本人的“珠海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辱华事件”，都 闹得沸反盈天，其间民众的一些言行，都可以用“群众性民族主 义”来概括，尤其是互联网上众多“民族英豪”的言论，真让人感 到“义和团运动”的复活。

26当知识遇上信念

“见义勇为”者之稀少，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现象。各地 以行政手段大力鼓励、表彰所谓“见义勇为”的行为，诸如设立 “见义勇为奖”、中学生有“见义勇为”纪录者高考时可加分，等 等，都说明愿意和敢于“见义勇为”者，实在不多。流氓凌辱少女 而路人袖手、小孩失足落水而众人作壁上观、车匪路霸用一柄真 刀或一把假枪便令满车青壮钳口结舌、悉数奉献……类似的报 道时现报端。凡此种种，都昭示着正义感的普遍淡薄，都意味着

人们心灵中“良知指数”和“义勇指数”的低落和对邪恶的承受力 的过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外国人在中国的言行则十分敏 感、极为计较。只要觉得外国人的言行表示了对中国人的某种 不敬，立即群情激愤、杀声四起。——在“良知指数”和“义勇指 数”低落的同时，是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也告诉我 们:“群众性民族主义”与真正的“良知”和“义勇”无关，甚至与真 正的“良知”和“义勇”是不相容的。对外国人在中国言行的敏感 和计较，说到底，是以极度自尊的面目表现出的自卑，是“义和 团”之精神遗产的鲜明表现。

对“人”的尊严很淡漠，身边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种种践踏 “人”的尊严的现象，他们习焉不察;对有涉“民族尊严”之事则感 觉异常敏锐，随时准备捍卫“民族尊严”——这是“群众性民族主 义”的一种特征。对外国人针对中国的行为，尤其对外国人在中 国的行为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动辄把问题提到“民族尊严” 的高度，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又一种特征。例如，外国人在中 国激起“群众性民族主义”大爆发的某种言行，或许本不过是一 种过分和出格的玩笑。即便要对之提出抗议，抗议的也应该是 其玩笑的过分和出格，不必牵连太广。但“群众性民族主义”却 非常善于“见微知著”，立即省去一切中间环节，把个人的一种玩 笑看成针对国家和民族的严重侮辱和挑衅，并用山呼海啸般的 行为把一种私人的玩笑变成重大的事件。“内外有别”也是“群 众性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英国作家奥威尔说，“不顾现实”是 “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不能看到同 样一组事实之间的共同点。英国的托利党人会在欧洲捍卫自决 权，而在印度，却反对当地人的自决权，并且一点也不觉得有什 么矛盾之处。行为是善是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是谁做 的，所有的暴行——拷打折磨、使用人质、强制劳动、大规模放

^6当知识遇上信念

逐、不经审判就监禁、伪造、暗杀、轰炸平民——假如是我们的人 干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如 此，那“群众性民族主义”就更是如此了。同样一种行为，假如是 “同胞”所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的，但若是外国人所为，那 就十恶不赦。例如，嫖娼现象在中国男同胞中之普遍，已是毋庸 置疑的了。中国的男同胞嫖中国的女同胞，这早已不足挂齿，gp 便是男同胞成群结队、集体性地嫖女同胞，也不会成为令人感兴 趣的新闻。但倘若是外国男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嫖中国女人，那 情况可就大为不同了。这时候，不再是一个男人嫖了一个女人， 而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嫖了一个中国人。一种简单的 嫖娼行为迅速丧失其固有的生理和道德内涵而上升为国家与国 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而如果这个外国人来自那种特别 令“群众性民族主义者”仇视的国家和民族，那性质就更为严重， 引发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怒火也就更其熊熊。“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已是“常”得不能再“常”的“常识”。从法理上说，嫖娼就 是嫖娼，在中国的土地上，嫖娼该当何罪，无关乎嫖客的种族国 籍。但“群众性民族主义”连人类最基本的理性都丧失了，哪里 会理会“法理”。他们不妨刚刚从“洗浴中心”或“洗头房”里提起 裤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 春”表现出满腔怒火。这里的逻辑是：我可以嫖自己的同胞，那 是我们的“家事”;你却不能嫖我们的姐妹，你嫖，便意味着一种 “入侵”。在“群众性民族主义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 出的无比痛恨中，的确可感到他们把女性的身体也视作了“领 土”之一种。外国人在中国嫖妓，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对中国 领土的侵占，它与外国人武装占领中国的城市乡村具有同样的 侵略性质，甚至是一种更可恨的侵略行为。——这里表现出的， 其实是一种非常陈腐肮脏的女性观。

36当知识遇上信念

“群众性民族主义”正因为是“群众性”的，所以有着数量上 的巨大优势，它总是以“民意”的名义强烈地表现自己，而这就难 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各级当政者也许内 心深处并不认同“群众性民族主义”的逻辑，甚至意识到如果满 足“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要求，对国家形象和民族利益都会造成 实际的损害。但是，他们又深知，对一种非理性的民众性思潮和 行为，当政者如果强硬抵制，那是要付出代价的，起码会被扣上 “汉奸”、“媚外”、“卖国”的帽子。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在“必要” 的程度上对“群众性民族主义”让步，从而使既定的内政外交政 策在“必要”的程度上被扭曲。——这是大堪忧虑的。

在衣服上写上或印上一些文字，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前 些年，在夏天常可见年轻女性的前胸后背都赫然写着“别惹我， 烦着呢!”一类字样。这几年，此种时髦已经传染给了汽车。人 们常可在大小汽车的屁股上看到诸如“别吻我! ”“别碰我，我怕 痛! ”一类的请求、提醒、告诫。中国有成语“入乡随俗”。假如一 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有某种意愿想向中国人表达，便也在衣 服上写上一些字，那只不过是“入乡随俗”的表现，理应被中国人 接受。然而，事乃有大谬+然者。去年，一名白种的外国男子， 就因为衣服上的字而在南京一家饮食店消费时遇上了麻烦。这 名男子身穿的T恤衫背部，印着十条对中国人的请求、提醒和 告诫，诸如“不要盯看外国人”、“不要叫外国人老外”、“对外国人 收费与中国同等”、“不要说移民留学或换钱的事”、“不要问你是 否有汽车别墅或挣多少钱”、“不要跟老外讲你晚上没地方睡 觉”，等等。这些文字惹怒了也在就餐的几名中国男子,他们觉 得这是对中国人的公然侮辱和挑衅，于是走上前去，愤然要求这 名外国男子“道歉”，并要求他立即脱下这上衣。此事也马上惊 动了警察。警察将这名外国男子带到派出所，也要求他“认错”。

?6当知识遇上信念

警察对此事的处理很耐人寻味。这名外国男子并没有丝毫违反 中国的法律条例之处，从法理上说，他并没有“错”，因而也无 “错”可认。相反，那几名中国男子倒颇有“违法乱纪”之嫌。粗 暴地干涉他人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已经错了；要求他人在公众 场合脱衣服，就更近乎野蛮。作为执法者，为了维护中国法律的 尊严，这名警察应该要求这几名中国男子“认错”并向那名外国 人“道歉”。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中国民众的要求：在“群 众性民族主义”面前，法律显得如此苍白。如果说这名警察并不 懂得，从法理上讲应该“认错”和“道歉”的是这几名中国人，那说 明他是一个不懂法的执法者。但是，即便他懂得这一点，他又能 怎样呢？他如果不要求外国人“认错”从而平息“民愤”，“民愤” 就会转而指向他；而如果“竟然”要求中国人向外国人“认错”、 “道歉”，那还不被民众啐死？所以，无论这名警察懂不懂法，在 “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怒火面前，他都只能使法律处于被扭曲和 屈从的地位。

我所谋生的南京大学，有不少韩国留学生。我也带着一个 韩国研究生。他此前曾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日语说得极流利，相 形之下，汉语的口头表达则不十分顺畅。一次，他与也留学南人 的一名日本女生在一家餐馆吃饭，两人用日语交谈。突然，一名 喝得有些醉意的中国男子走上前来，打了他一耳光，转身悠然地 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吃喝起来。这名韩国学生和那名日本女 生也立即明白了他挨打的原因：他被当成了日本人。于是，那 名日本女生便不絶声地向他道歉。这名韩国学生把这件事告诉 我后，我半天沉默无语。在中国，随便打人是犯法的。按理，这 名韩国学生可以报警。而警察对此事的处理也可以想象.•即便 他认为打人者应受到应有的处罚，他也决不会真依法对其进行 处罚的。在这种时候，“群众性民族主义”明显左右着一个派出

6当知识遇上信念

所警察的执法。那么，在一些更重大的问题上，“群众性民族主 义”无疑也会左右着更高层人士，甚至是国家决策层的方针策 略，这不是大堪忧虑的么？

在面对日本和日本人时，“群众性民族主义”更容易发作并 且发作得更为猛烈。这当然并非不可理喻。坦率地说，对日本 某些政客的言行、对日本民间那类“右翼分子”的表演，我也深为 痛恶。不过，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因此而对日本民族的一切彻底 否定，不要因此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每一个日本人。我总记 得鲁迅和胡适在日本侵华时表现出的冷静理智和对国人所做的 提醒。“九•一八”之后，国内掀起了一股“日本研究”热。鲁迅 于1931年11月30日发表了《“日本研究”之外》一文，其中说: “怎么会突然生出这许多研究日本的专家来的？看罢，除了《申 报》《自由谈》上的什么‘日本应称为贼邦’，‘日本古名倭奴’，‘闻 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流的低能的谈论以外，凡较有 内容的，那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 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人 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并且说：

?6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 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 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 书，……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 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 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在“排日声中”，鲁迅指出日本人的认真研究自己和认真研究别 人的精神，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胡适与 鲁迅有着相同的冷静和理智。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

北平《晨报》采访时说:“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 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 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 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 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1935年，一位名叫陈英斌的青年留学 日本前写信给胡适，请教留日期间应注意些什么。胡适于7月 24日复信给这名青年时，首先说:“中国文化现在还是事事不如 人，青年人应该努力学外国的长处。……‘和本国文化离开’也 无大害处，因为本国的文化的环境实在太坏了，可以坑死不少的 有用的青年，青年人能脱离这种空气，是福不是祸。”最后，胡适 告诫说：

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 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 各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 二是爱美，偏（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 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好 处，肯拼命模仿人家。

?6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这句话下面，胡适 每个字都加上了着重号。在日本正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时，鲁 迅和胡适能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在值得我们学习；而他们在举 国汹涌的排日和仇日浪潮中，能如此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 勇气也实在令人敬佩。

“群众性民族主义”、“义和团”式的社会情绪、心理、精神，每 每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奸商所利用。当年，慈禧太后大大地 利用过一回“义和团”，但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应了 “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这句告诫。在今日中国，也总有人想利

用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杂文家鄢烈山先 生曾写过《“爱国贼”》一文，声讨的就是这类人。鄢先生这样给 “爱国贼”下定义:“所谓‘爱国贼’，主要指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 幌子，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作爱国秀捞取名和利的家 伙。”此种“爱国贼”，这些年在文化界屡有所见。正如鄢烈山先 生指出的，有资格“卖国”从而称得上“卖国贼”者，“非大人老爷 莫属”，但“爱国贼”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可充 当。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匹妇若宣称自己要“卖 国”，那一定会被目为精神有毛病。但若有丐帮“帮主”一类角 色，在“群众性民族主义”猛烈发作的时候，打出“乞丐救国团”的 旗号，喊出最激烈的口号，那一定会收获可观的捐赠。所以，“爱 国贼”是虽乞儿亦可胜任的。鄢先生文中说:“小的‘爱国贼’这 些年我们见得多了。君记否：19%年几个混混拼凑了一本‘可 以说不’的书，借4爱国’的商标大捞了一把；自己赶着又来了一 本‘还是说不’。他们的暴发惹得不少人眼红，一时间仿制品纷 纷涌上书报摊，都想给中国人獾‘爱国’的迷魂汤,趁机掏人们的 口袋。”“爱国贼”可分出多种类型。鄢烈山文中举了几种，在此 不一一转述。读鄢文，我也想到了较远和较近的两个例子。较 远的例子，是数年前中国驻南使馆遭炸时，一位著名作家发表了 一封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其言辞之拙劣、见识之粗陋和 常识之匮乏，以及心态之卑微，都足以令稍有头脑的中国人脸 红。较近的例子，是去年苏州一家新开张的古董店，在门前竖起 了“日本人禁止入内”的牌子。当我在报上得知此事时，实在很 佩服店主的“精明”。这牌子与其说是针对日本人的禁令，毋宁 说是抛向那些极端排日和仇日者的诱饵。有可能进这家小小古 董店的日本人，能有几个？而可能见到和知晓这块牌子的极端 排日和仇日的同胞则多出无数倍。这些人，一定引这名店主为

26当知识遇上信念

同志，即便本对古董无兴趣或许也会赶来购买一二，他们自以为 这是对店主“爱国热情”的支持，又哪里知道，他们支持的不过是 一种“爱国贼情”。

大学校园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大学生们 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最激烈最典型的体现者，从而也成 为大大小小的“爱国贼”们最主要的利用对象，这是分外让人悲 哀的。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 而跪在市府前请愿，此事令鲁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 静农信中，鲁迅说:“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 羞甚于隅亡。”鲁迅认为大学生的“长跪于府前”，比国土陨亡还 令人羞耻。这当然多少是私人通信中的愤激之辞。但看到今日 大学生中的那种激烈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看到大学校园里“义 和团精神”的涌动，我也真想说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 陨亡。”

27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4年6月27曰

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

公交车上常常出现“道德危机”。具体地说，就是青壮健康 者不肯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甚至与后者抢座。媒体所披露者，以 及我们亲眼所看见者，有时的确令人发指。对此类现象的激烈 谴责时有所闻，也有人对“公交车何以成为公德的滑铁卢”进行 冷静理性的思考。激烈的谴责自然可以理解，冷静理性的思考 则尤为可贵。但我注意到，谴责者和思考者都是在“公德”的范 围内看待此类问题的，都把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不假思索地 视作了一种“公德危机”。而我以为，长期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当作应当遵守的“公德”，或许正是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频频 出现的一种原因。

?7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坐公交车，或大或小的“道德危机”当然 不难遇到。或坐或站时，我不免会想一想。想来想去，我觉得应 该对公交车上的道德行为进行“公德”与“私德”之分。什么是公 交车上的“公德”呢？诸如上车买票、不吸烟、不往地上吐痰、不

扔瓜皮果壳等垃圾、不乱喊乱叫，等等，属于“社会公德”范围。 这种社会性的“公德”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或者说，遵守 这些“社会公德”，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正因为任何人都没有 “权利”不遵守这种“公德”，所以，倘若违反了这种“公德”，就不 但应该受到谴责，有关部门还可以对之进行处罚。什么是公交 车上的“私德”呢？诸如上车时不但让老弱病残孕先上并且还抉 上一把，下车时不但让老弱病残孕先下并且还帮着提东西，在车 上不但不乱扔垃圾并且还把别人乱扔的捡起来……这类行为， 就属“私德”范围。一个公民对“公德”的遵守,是天经地义的，丝 毫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D而一个人的行为放射出“私德”的光 辉，则意味着他并不是在尽应尽的“社会义务”，而意味着他特别 乐于行善、特别具有爱心、特别愿意为社会为他人服务。这样的 人，即使他自己并不夸耀，社会和他人也应该对他报以特别的 敬意。

那么，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属于何种范围呢？我想，应该属 于“私德”的范围。乘车，是一种消费行为，每个人都付出了同样 的代价才上得车来，从法理上说，也就享有了同等的“权利”，不 存在一些人“理应”为另一些人让座、“理应”为另一些人作出牺 牲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是以规定的价格购买了乘车 权，他就有“权利”不给他人让座，他就没有必须给他人让座的 “义务”。而如果他把本来可以坐下去的位置让给了他人，他就 是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小小善事，他就应该得到社会和他 人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和赞美，至少，应该得到被让座者的一声 感谢。

272当知识遇上信念

而长期以来，把本属“个人私德”范围的让座纳入“社会公 德”范围，就使人们普遍有着心理上的别扭和错位。有人之所以 不愿让座，或许是出于一种不服气的心理：我也是花钱乘车的，

我忙了一天也累得快趴下，凭什么说我不把座位让出来就是“缺 德”，就应该受到谴责？在老弱病残孕这一面，固然大多数都会 对让座者或冷或热地道一声谢，但也有视他人的让座为当然者。 有人在别人为其让座后，他连正眼都不瞧人一下就坐下了。就 是你丢的东西别人捡了还你，你也该说声“谢谢”吧，可有人坐上 别人让出的座位，就像是收回被别人借去甚至偷抢去的东西。 还有那种被认为“理应”享有座位者，上得车来见无人让座便发 牢骚、出恶语。——如果把让座视作“社会公德”，他们这样做却 也无可厚非。因为让座了，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当然用不着 感谢;而不让座，则是“缺德”，也理应被埋怨、受责骂。我就见过 一白发老妇，从前门上得车后，见无人让座，便破口大骂起来。 靠后坐着的我，本来打算给她让座的，她一开骂，我倒索性坐着 不动了。我想，您老既然中气十足，看起来颇为壮健，那就站会 儿吧。

所以，要解决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也许应该调整一下宣 传和教育的思路：对不肯为老弱病残孕让座者，变谴责为劝导。 不再声色倶厉地说，你们不肯让座是“缺德”，是不讲“公德”，是 良心让狗吃了；而是对他们说，你们本来可以不让，但如果让了， 就是在行善，虽然是小善，但“勿以善小而不为也”。同时，对老 弱病残孕，也应该提醒他们在别人让座时别忘了报以一个微笑， 一声“谢谢”。这样一来，也许公交车上的状况会好些。至少，不 会变得更糟.•已经糟成这样了，还能“更”到哪里去？

273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4年8月1曰

中国人在曰本

有许多中国人生活在日本。在日本的中国人，比在中国的 日本人，不知要多多少倍。在日本的中国人，当然大多是合法居 留的，而非法居留者，也数量惊人。

^74当知识遇上信念

今年3月，我也从南京到了东京，应邀在东京大学教一年 书。教书之余，我观察日本和日本人，也观察在日本的中国人。 如今，一学期已过去，我有许多话想对国内的同胞说。这里，先 说说我在东京街头的电线杆上见到的一条标语。

5月的一天,我在东京街头闲逛着，突然在一根电线杆上看 见一条用汉语写的标语：“严打入室盗窃!”汉语标语的边上，则 有一行日文。日文的意思，译成汉语应是“严密防范入室盗窃！” 标语张贴者是本市区的警察署。尽管到日本后不久，即知道有 许多中国人在日本作奸犯科，令警方颇为头痛，但这条以汉语出 现的标语，尤其是“严打”这极具中国特色的用语，还是让我驻足 良久。恍惚间，我竟不知自己是身在南京还是身在东京了。不

用说，这行日文是警方自己的手笔，而那句汉语，则是警方请一 位中国人拟定的。这位同胞不肯把警方拟定的日文直译成汉 语，而是用了“严打”这更具威慑力的字眼，也许自以为高明，但 这两个字出现在法治化程度颇高的日本街头，却有些不伦不类， 是可能给警方招来麻烦的。

在日本我认识一位中国同胞，她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在四 处地方教汉语，其中之一便是警视厅。警视厅办起了汉语学习 班，可见中国人在日本是怎样受警方重视了。日本媒体上经常 出现“外国人犯罪”这种说法，而这“外国人”主要就是中国人。 当我从媒体上得知日本的盗窃案有75%是中国人所为时，确实 惊讶了好久。日本人迄今没有防盗门防盗窗的观念，窗户就是 普通的玻璃，有些人家，连大门也是玻璃的，这令我们那些同胞 十分容易得手，入室盗窃比去银行取自家的钱还轻省。一家电 视台曾邀请受害者和有关专家一起商议防范对策。但这些曰本 人想来想去，都无非是在玻璃里层再贴上一层既透明又较为坚 韧的东西，他们还想不到要用钢筋铁骨为门窗加上一层防护。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他们还不能接受把自家住宅变成 囚牢。不过，他们对中国式的防盗门窗的拒绝能坚持多久，实在 难以逆料。中国人既然已把极具中国特色的“严打”带到了那 里，也就会把中国式的防盗措施带过去。

?7当知识遇上信念

盗窃是中国人主要的犯罪方式，但又不限于此。团伙式的 抢劫也时有发生。五六月间，日本警方破获了一起贩卖假证件 案，也是一伙中国人所为。他们把在国内制作好的假证件运到 日本贩卖，已获利数亿日元。前不久，电视上播出了对一家中国 人开的地下诊所的暗访。那开诊所的东北大嫂既为人治感冒， 又为人打胎，似乎没有她不能治的病，没有她不敢做的手术，而 她卖的药，也是从中国带过去的。比较起来，杀人这类凶案，中

国人犯的少些，但也并不罕见。我见过好几张通缉令上有中国 人的照片，他们都是命案在身者，甚至有为了区区数千日元（相 当于几百元人民币）而将日本人一家数口都杀死者。

当然,犯罪的中国人，是中国人中的少数。但这相对的少 数，绝对人数却并不少。他们的行径已经成为日本的一种社会 问题。在这里，我不想对这些同胞有什么指责，只想说说广大的 日本国民对这一现象的反应。据我的观察，日本国民都能以就 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对待中国人的犯罪。一个中 国人，无论犯了什么罪，他们都能仅在法律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接 受它，而并不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犯罪与国家民族间的那些历 史与现实的大问题挂上钩。我想，正是广大日本国民都有着这 样一种理性，才使得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犯罪并没有在日本社会 引发明显的排华浪潮。

276当知识遇上信念

这些年，也偶有日本人在中国犯罪或有一些非礼的言行，而 我们总立即把这与一些重大问题相联系，总习惯于认定这个具 体的日本人就是在代表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向中国示威和挑衅， 并立即报之以山呼海啸般的声讨、谩骂。我们的神经过敏到了 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日本醉汉在深夜的上海街头发酒疯，都 会成为一个事件，这实在有失“泱泱大国”的风度。在国际交往 日益增多的时代，学会理性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对待包括曰 本人在内的外国人在中国的非礼和非法，该是并非不重要的吧。

2005年8月18曰

禁欲时代的情色

——“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以“反特” 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 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其中往往有那种以女特务身份出现的人物形象。这种女特务， 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 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套用一句俗 而又俗的话：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东 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钢铁战士》于1950年上映，贺高英扮演了 其中的国民党女特务,这个女特务一心想以色相引诱被俘的“我 军”张排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应该是中共建政后出 现在银幕上的第一个女特务形象。此后，这类女特务在电影中 频繁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和李月 桂(分别由王晓棠和胡敏英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

?7当知识遇上信念

消失的电波》中的柳尼娜(陆丽珠扮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 摄的《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和梅姨（分别由狄梵和梁明扮演），上 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曲曼丽（姜曼 璞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寂静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白 玫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虎穴追踪》中的资丽萍（叶琳 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铁道卫士》中的王曼丽（叶琳 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假古兰丹 姆(谷毓英扮演），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跟踪追击》中的徐英 (红冰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秘密图纸》中的方丽（师伟 扮演）……这一系列女特务形象，构成了“红色电影”中一种十分 独特的人物画廊。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 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 的初恋情人。

所谓“特务”，本是一个中性词，即“特殊任务”之意。1927 年国民党清党、国共处于尖锐敌对状态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 共中央军委工作，曾在军委成立“特务工作科”（简称“特科”）。 可见，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特务”最初并不单指“敌方”执行特 殊工作的人员，己方负有特殊使命者，也可称“特务”。可是后 来，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特务”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专指“敌 方”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至于自己这一面担负同样性质的工作 者，则称侦察员。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电影”中，有“敌方”的特 务形象，也有“我方”的侦察员形象。“敌方”的特务往往是女性, 乃至女特务能组成一种人物画廊;而“我方”的侦察员，则往往是 男性。说得更直白些，在这些电影中，“敌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 潜入“我方”执行特务任务，而“我方”潜入“敌方”执行特务任务 者，则总是青年男性。其实，不单是电影，在那时期的小说中，情 形也是如此。与其说这有现实生活做依据，毋宁说是某种微妙

27当知识遇上信念

的心理意识使然。不仅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中，有 这种“敌女我男”的模式，“文革”期间属于非法的手抄本小说，也 总是严守这一不成文的规范。有人曾指出过这一现象:“从革命 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地下党，还是和平 时期的公安侦察员(正方的符号代表），为完成艰巨任务，均可凭 借谈恋爱的手段打入敌人心脏(反方的符号代表），但主人翁必 须是男的且不能与反方的女特务或罪犯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 而反方则往往是用放荡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员， 且被诱惑一方都会巧妙躲避或严词拒绝而过美色关，否则，一旦 沾染女色，不是变节投敌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侦察员绝不能 施用美人计这一手段，此症结直到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或文学 作品中概莫能外。”®“红色文艺”表现的当然是“红色道德”。在 这种“红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现这种情况：“敌方”可对“我方” 大施其美女计，但决不可对“我方”施以美男计;“我方”可对“敌 方”施以美男计，但决不可对“敌方”施行美女计D这种“红色道 德”显然并不令人陌生。“敌方”对“我方”施行美女计，其结果当 然是徒劳，从“敌方”的立场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 又折兵，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不但挫败了“敌方”的阴谋诡 计，还多少占了些便宜。“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其结果当 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胜告终的，从“敌方”的立场来说，仍然 是双倍的损失，而从“我方”立场来说，则是双倍的收获。

退一步说，即使“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而未能达到最 终的政治或军事目的，也并不是纯粹的失败，至少“我方”美男在 与“敌方”美女的周旋中不无收获。——这种“红色道德”显然认 为，女性的姿色和身体，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利益之一部分，或

279当知识遇上信念

者说，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一种特殊利益，这种利益或许比阵 地、领土、金钱等更为重要。既如此，在“敌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 上占些便宜，也算是缴获了一种特殊的战利品。既然“我方”女性 的姿色和身体，也是“我方”的一种特殊利益，那就决不能拿这种 利益去冒险。“我方”对“敌方”施行美女计，即便最终达到了政治 和军事上的目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胜利，也付出了特殊的代 价。——当然这里说的是电影等文艺作品中的情形，真实的情况 如何，另当别论。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反映的这种“红色道德”，实 际上不过是某种陈腐的意识、观念披上了红色的外衣而已。

“红色电影”不仅仅写“敌方”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 员，还往往让女特务对“我方”人员“动真情”，这也是很耐人寻味 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风情万种、艳压群芳，却对打入“敌 方”内部的“我方”侦察科长曾泰一往情深。《羊城暗哨》中的八 姑，仪态万方、妖冶妩媚，却对打入“敌方”的“我方”侦察员王炼 情深意浓。“红色电影”不仅让“敌方”女特务爱上“我方”侦察 员，往往还要强调她们是在有众多追求者的情况下对“我方”侦 察员情有独钟。让女特务对“我方”侦察员“动真情”，当然意在 表现“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过女特务的眼光来肯定“我 方”英雄人物的价值。然而，深究起来，“红色电影”中的这种“匠 心”，这种用意，却是与“红色价值观念”相冲突、相背离的。依据 “红色价值观念”，敌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毫无价值的。 只有敌人的恨，能证明“革命者”的价值;“革命者”被敌人恨得越 深，便越有价值。女特务是特别危险特别可恶的敌人，那就更是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无丝毫价值可言。然而，当电影以女特 务的“真情”来证明“革命者”的价值时，却又分明认可了女特务 “真情”本身的价值，因为如果女特务的“真情”本身是毫无价值 的，那就非但无法证明“革命者”的价值，相反，对“革命者”只能

28当知识遇上信念

是一种贬低、一种侮辱、一种否定，只能证明“革命者”的无价值。 人们当然可以说，女特务也是“人”，她的“真情”只是一个女性对 男性的自然情感，本身是超阶级、非政治的，是与她的阶级属性 和政治身份无关的。然而，我们分明记得，“红色价值观念”，是 根本不承认有“抽象的人”，根本不承认有超阶级、非政治的“普 遍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女特务的“真情”来表现“革命者” 的价值，仍然与“红色价值观念”相龃龉。

在“红色电影”中，女特务可以对“我方”人员使出种种引诱 手段，甚至大动真情，但“我方”人员在与女特务周旋时，却必须 严守分寸。那是一个禁欲的时代，那是一个女性全面男性化的 时代。“我方”人员与女特务周旋虽是出于“革命需要”，但也是 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这危险并不在于“我方”人员是深入虎穴， 而在于女特务的美丽迷人，在于女特务作为女性对于男性的性 魅力。在禁欲的时代，在禁欲的道德氛围中，女性的美丽娇媚， 某种意义上是对“革命者”最大的威胁，是瓦解“革命斗志”、破坏 “革命友谊”的最可怕力量。古往今来，女性的美艳，引发过男性 之间无数的拼杀。因为女性而父子兄弟相残、国家民族开战之 事，也屡有所见。中国有俗语云：“英雄难过美人关。”可见“美 人”对男性事业的危害有多么大。当“英雄”过不了“美人关”而 “冲冠一怒为红颜”时，会置集体、党派、国家、民族甚至身家性命 等“红颜”之外的一切于不顾。正因为看到了女性的性魅力对 “革命事业”的可能危害，中国历代的游民阶层和底层革命者，都 把轻女仇女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作为检验“革命者”精神、意志的 一种标准。而轻女仇女的深层原因，则是对女性的恐惧。这种 情形，在中国历代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往往有典型的表现。王学 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三国志平话》《水浒传》 《三国志演义》等古代通俗文学作品“对待妇女的态度”有专门的

28当知识遇上信念

论述。“英雄难过美人关”，固然说明“美人关”之不易过，但也同 时在强调，过不了“美人关”的“英雄”便不是“真英雄”。这样，是 否能过“美人关”，便成为检验“英雄”之真假的试金石中国历 代的通俗文艺，在塑造“真英雄”时，都会极力表现他们的轻女仇 女。“真英雄”在轻女仇女的同时，是对“兄弟”、“同志”、“战友” 的“义”，是为“兄弟”、“同志”、“战友”不惜牺牲自身一切的精神。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是《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名言。关羽 的视美色如粪土，也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其他如诸葛亮、张 飞、赵云等所有作者心仪的人物，无一不具有对美色无动于衷的 精神品质。《三国演义》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更以杀妻飨备的实 际行为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改写为“兄弟如手足，妻子 如鸡豚”。刘备兵败，匹马逃至山中，投宿刘安家：“当下刘安闻 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 德……乃饱食了一顿。天晚就宿，至晓将去，往后院取马，忽见 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都已剜去。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 乃其妻之肉也。”作者显然是以赞赏的态度写了刘安的行为的。 而对女性的轻视，在这种赞赏中，表现得分外鲜明。

王学泰指出了《水浒传》中的这样一种现象:“《水浒传》写了 三十几个女性，作者对于那些具有女人特征和女性追求的妇女 形象都视为水性杨花的淫妇，而且大多数被梁山好汉们以极其 残酷的手段处死。”①《水浒传》第四十六回，杨雄杀美貌妻子潘 巧云的场面，令人恶心，也发人深思：

以当知识遇上信念

……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杨雄

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辨在树上。 杨雄

①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叫那妇人叫不 的。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 明，险些被你瞒过了！ 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 必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 婆娘，心肝五脏怎样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 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

杨雄杀潘巧云，杀得振振有词。潘巧云的“罪过”之一，是挑拨杨 雄与石秀的兄弟情义。原来潘巧云曾以言语撩拨寄居家中的石 秀,石秀不为所动，潘巧云转而在杨雄面前诬称石秀对其图谋不 轨，杨雄一时信以为真，对石秀心生恼怒。所谓“险些……坏了 我兄弟情分”，即指此。杨雄与石秀，其实相识未久。然而，在游 民的价值体系中，刚缔结的“兄弟情”，也远重于多年的“夫妻 情”。美貌女性有可能破坏“兄弟情分”，这足以令人恐惧。而竟 然真的“险些”破坏了“兄弟情分”，当然就死有余辜了，所以应该 死得这样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通俗文艺中表现的这 种游民阶层畏女、轻女、仇女的意识，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 艺”中也改头换面地出现。“红色电影”中，为了“革命工作”的需 要,“我方”侦察员，可对“敌方”女特务虚与委蛇、虚情假意，却丝 毫不能弄假成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绝不能“越 雷池一步”的。在身体上，“我方”侦察员可与女特务做有限的社 交性的肢体接触，如握手、跳舞等，但“占便宜”仅限于此，并不能 与女特务有任何真正私密性和性之意味明显的身体接触。“红 色电影”往往不厌其烦地渲染女特务怎样用身体引诱“我方”侦 察员，怎样百般忸怩、千般作态，但“我方”侦察员总是能巧妙地 摆脱与拒绝，始终严守界线。在表现“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 引诱与拒绝时，还不能让观众觉得他是在用“革命意志”和“革命

M当知识遇上信念

觉悟”强压欲望，而要让观众觉得他对如此的美貌、如此的柔情、 如此具有诱惑力的身体，压根儿就不动心，压根儿就没有生理上 的欲望。相反，“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搔首弄姿、投怀送抱， 只有生理上的厌恶，他需要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所强行 压制的，是这种对女特务的厌恶。要问“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 是否也有欲望，也可以说有，那就是立即消灭她的欲望，他同样 必须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强行压制着这种欲望。《三国 演义》《水浒传》等古代通俗文艺中所颂扬的英雄好汉，是对美色 根本就不产生生理欲望的，是对美色甚至有生理上的厌恶的，是 与女性的美艳生来有仇的。如果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是指“英 雄”难以在“美人”面前克制情感冲动和生理欲望，那这句话对程 咬金、秦叔宝、宋江、李逵、武松、刘备、关羽、张飞等“游民英雄” 就并不适用，对“红色电影”中那些与女特务周旋的“革命者”也 不适用，因为他们面对“美人”根本就不产生情感冲动和生理欲 望，因为“美人”在他们面前根本就不是什么“关”。在这个意义 上，他们不但是“真英雄”，而且是“超英雄”。“万恶淫为首，论迹 不论心，论心世间无完人。”这是中国古代一副名联的下联。这 句话说得很通达。一个人，面对有诱惑力的异性，只要能在行为 上管束住自己，就算是好样的，至于心里有点“邪念”、有些“欲 火”，那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应该原谅的。如果连一点“邪念”、一 些“欲火”也不准有，那世间便没有不淫的“完人”。这表达的，应 该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古代中国游民阶层在性道德上，是 远比主流社会更严酷的。这种严酷的性道德，却在20世纪的“红 色文艺”中得以延续。在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作品如《三国演义》 《水浒传》中，贪恋女色，即便武功再高强，即便拼杀中再勇猛，即 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中再“功勋卓著”，也算不得真的“英雄好 汉”。同样，在“红色电影”中，如果“我方”侦察员在肉体和情感上

284当知识遇上信念

失了分寸，面对女特务时动欲、动情甚至付诸行动，那就意味着变 节、堕落，就是万劫不复的丑类，就是“革命”永远的敌人。在与女 特务的周旋中，在面对女特务的百媚千娇时，“革命者”应该时刻 保持厌恶和仇恨，即便为了工作需要而对女特务甜言蜜语时，内 心也应有着锋利的杀机，他应该能够随时对她手起刀落。

在“红色电影”中，与女特务形成对照的，还有那类“正面”的 女性形象。这类电影所精心塑造的那种女性“英雄”，所极力歌 颂的那种女性“革命者”，在性格、言行上总是非常男性化的，用 通俗的话说，总是没有丁点“女人味”的。这是“红色价值体系” 对女性的要求在文艺中的反映。而这也是其来有自的。古代的 游民之所以畏女轻女仇女，是因为女性的性魅力能够瓦解“兄弟 情”、“战友义”，能够使群体崩毁、能够让大业溃败。但如果虽是 女性却举手投足都与男性无异，因而对男性并无性魅力，如果虽 是女性却照样与男性缔结“兄弟情义”，如果虽是女性却让男性 们根本意识不到性别上的差异，那就没有危害了。王学泰在《游 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曾指出在《水浒传》中，女性只有充 分男性化、表现得与男性没有任何差别时，才能被梁山泊接 纳①。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之所以能跻身一百单八将之 列，就因为她们毫无害羞、胆怯、柔弱、慈悲等通常被认为更多地 属于女性的品格，同李逵、武松等人一样，她们也杀人不眨眼，也 以杀人放火为人生最大乐事。作者赋予她们的绰号“大虫”、“夜 叉”，就已经将她们的品性充分表露了。这同时意味着，女性只有 像猛虎、如恶鬼，才具备了上梁山的资格。当人们说梁山上有“一 百零八条好汉”时，就已经将她们视作“汉”了，或者说，就已经以 游民的价值取向为她们做了“变性手术”。对女性的这样一种价

z8当知识遇上信念

值取向，正是后来“红色文艺”中“正面女性”无不男性化的根源。

“红色文艺”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正是“红色价值”主宰整个 社会生活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普遍男性化，在发型、服 饰上，将“女性味”减少到最小限度，在言行举止上也最大限度地 与男性认同。女性身上的任何一点“女性味”，都被视作“小资产 阶级情调”，都被看成“思想意识”有问题的表现;都意味着政治 上的不可靠、不过硬;都会招致领导的批评、群众的非议;一旦来 了政治运动，还会成为批斗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失去了 “女性味”;在文艺作品里，“正面”的女性形象也没有丝毫“女性 味”。在那个“红色时代”，电影中以直观的形象出现的女特务， 就成了“女性味”最合法的载体。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负面的价 值，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腐朽、堕落甚至邪恶，那当然就要在女 特务身上充分体现。同时，女特务要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也 非有浓郁的“女性味”不可。这样一来，仿佛人世间所有的“女性 味”都集中到女特务身上。这样一来，女特务就成了关于女性知 识的启蒙老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头上，懂得了什 么叫“烫发”;从女特务的唇上，懂得了什么叫“口红”;从女特务 的眉上，懂得了什么叫“画眉”；从女特务的脸上，懂得了什么叫 “涂脂抹粉”;从女特务的衣着上，懂得了什么叫“旗袍”、什么叫 “胸针”、什么叫“高跟鞋”……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 女特务的一起一坐、一顾一盼、一顰一笑、一嗔一喜中，懂得了什 么叫“仪态万方”、“闭月羞花”、“倾城倾国”、“国色天香”……这 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从电影中的女特务身上，体会到 女性的魅力，并体验到什么叫“神魂颠倒”、什么叫“如痴如醉”、 什么叫“心旌摇荡”……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小伙子，竟然是对 着银幕上的女特务情窦初开。

?8当知识遇上信念

在那个“红色时代”，现实生活中没有爱情的位置，文艺作品

里更是不能从正面充分表现爱情。正面人物要么根本没有两性 关系，要么这种两性关系也是高度政治化的。无论在现实生活 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男女间纯粹的两性私情，都是负面的东 西，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的表现，都意味着精神 上的“不健康”。在文艺作品里，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相互吸 引的理由必须首先是政治性的，诸如思想觉悟高、生产劳动强、 “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之类。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谈恋爱” 时，谈的也是国际风云、国内大事和单位里的“阶级斗争”。既然 纯粹的私情是与“革命者”无缘的，那就必然与“反革命者”大有 缘了。“红色电影”中有女特务出现时，往往要让女特务以色相 引诱“我方”人员，甚而至于在不知不觉间对“我方”人员动起真 情，落入自织的情网而难以自拔。无论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情流 露，女特务在与“我方”人员的交往中，都会把两性之间纯粹私情 的一面充分表现。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是从电影上的 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 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 了“海誓山盟”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 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今天我们看那个时代的电影，对那些女特务或许根本没有 什么兴趣。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却被这些女特务 深深吸引，这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释。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 的世界》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禁欲主义的道德风尚 有深刻的剖析。茨威格说，那是一个用尽种种手段“掩盖和隐藏 性爱”的时代，以致一个女子根本不可能把“裤子”这个词说出 口。然而，“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 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 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

28当知识遇上信念

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 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 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 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 多”®。茨威格的剖析，也适用于“红色电影”在中国盛行的时 代。由于“性爱”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都被千方百计地隐 藏，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内心深处，其实远比今天的青年人更为 色情。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电影上的女特务有异常兴 趣的原因。——可怜的他们，只有让电影中的女特务陪伴着自 己性爱方面的幻想与冲动。

在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扮演女特务柳尼娜的演员陆丽 珠，“文革”中惨遭批斗，原因就在于她把女特务这一角色演得太 好。一个演员，因为戏演得太好而受迫害，当然是奇闻。然而，却 又并非不可理喻。“红色电影”中之所以需要女特务出现，本意只 是为宣传和强化“红色价值”服务，然而，女特务们却在客观上构 成了对“红色价值”的挑战，鼓励、导引和启发了“红色价值”所极 力要压制、掩盖和隐藏的东西。当“红色价值”的桿卫者意识到这 一点时，当然要恼羞成怒，而把怨恨发泄到扮演女特务的演员身 上，也在情理之中。“红色电影”的编导们，本意是要让女特务的 各种表现引起观众的厌恶、仇恨，没想到事与愿违，女特务成了 观众最喜爱的人物，至今还有些人像怀念初恋情人般地怀念她 们。不得不说，这是“红色价值”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

?8当知识遇上信念

2008年6月7日

①〔奥〕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译，三联书店1叩1年版，第84页。

后记

将这些长长短短的文早重读一遍，心情兒有几分沉重。

出当知识遇上信念

种田的人，都想种出好庄稼；写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想写出 好文章。而收在这里的文章，离我心目中“好文章”的标准，还差 得远。人到中年了，还写不出几篇能让自己稍稍满意、得意的东 西，心情怎能不沉重？

许多年前，还是在复旦当研究生的时候，间接听到中文系一 位名师的高论:“眼高手低，总比眼低手也低要好！”那意思是说， 眼高手低之人，自己虽写不出好文章，但毕竟知道什么样的文章 算好文章；而眼手倶低之辈，则自己非但写不出好文章，连什么 是好文章亦不知。当然，这句话还包含这样的意思：眼高手低 之人，看不上他人的文章，也往往知道自己的不足；而眼手俱低 之辈，不但会对他人的低劣平庸之作顶礼膜拜，更会把自己手造 的垃圾当作异宝奇珍。

既然对低劣平庸之作顶礼膜拜，既然把垃圾当作异宝奇珍，

也就必然对真正的好文章投以白眼，也就一定会把异宝奇珍当 作垃圾。

“眼高手低，总比眼低手也低要好！”——记得当时听到这句 话，愣了片刻。此后，这句话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我的“座右铭”。 我想，我即便不能成为一个眼高手也高的人，也千万别成为一个 眼手倶低之辈。当我也成为所谓的“导师”，“指导”着一大堆“研 究生”后，我更会对他们说：你们当然要努力成为眼高手也高之 人;退一步说，不能做到眼手倶高，也一定要做到手虽低而眼却 高。我甚至会说：你们知道眼低手也低有多么可怕吗？像老年 痴呆一样可怕！

290当知识遇上信念

然而，仅仅做到“眼高”，也并不容易。我又何尝敢说自己的 “眼”真正是“高”的。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把自己的文章，看成 奇珍异宝。

这些内容杂乱的文章中，如果说也有令我特别爱惜者，那就 是哀悼先师的《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这一篇了。爱惜，并不是 因为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它与我个人的内心联系得最紧密。 这篇文章收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集子中，我知道潘老师 也会高兴。在他的晚年，常常会对复旦的现状表示非议。而我 在他的这种非议中，感受到的是他对复旦的爱。越是非议得激 烈，我就越是感到他对复旦的爱之强烈。他的这种对复旦的爱， 有时甚至让我觉得有些难以理喻。

能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书，对我当然也有一点 特别的意义。我毕竟是在复旦大学开始学着写文章的。因此， 要对复旦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尤其要感谢策划这本书的孙晶 女士和责任编辑卢茗女士。

2010年7月22日于南京

□策划编辑孙晶 □责任编辑陈军卢茗 □封面设计马晓霞

上架建议：畅销•学术随笔

9 787309 073508>

ISBN 978-7-309-07350-8



定价：25.00元